【香港最後一個政治貴族】

羅德丞

政海浮沉錄

高繼標 著

第四版（修訂版）

博益

「夕惕若厲」《周易》

送給摯愛的女兒

荻菲

父於困乏中寫成此書，以此勗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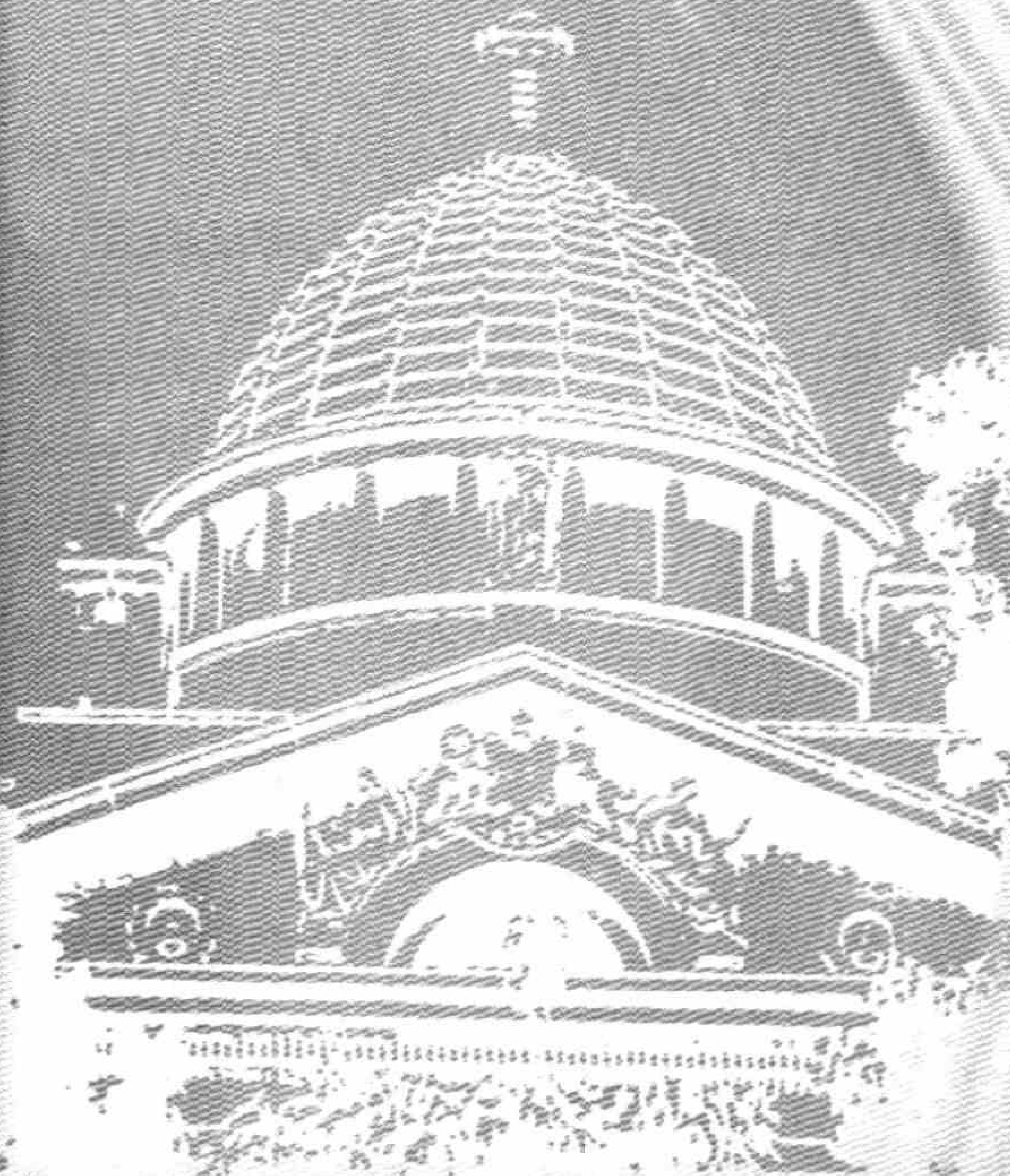


羅德承

【香港最後一個政治貴族】

政海浮沉錄

高繼標 著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博益

代序

一代傳奇人物羅德丞的悄然離世，不禁令人百感交集。

我和羅德丞的交往始自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成立。當時羅德丞剛辭退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脫離政府的管治架構，在回歸前夕與港英劃清界線，威望如日中天，極受各方的重視。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認為如能拉得羅德丞加入諮委會，會對基本法的諮詢工作有好處，所以力邀羅德丞以特邀人士的身份加入諮委會。在基諮會的執委選舉上羅德丞以128票高票當選副主任，當時的選舉是無人拉票的，而羅德丞以高票當選，反映出他如何受到推崇和尊敬。

當時我在基諮會秘書處任副秘書長，毛鈞年說羅德丞見解精闢，叫我多向他請教，於是我和羅德丞的接觸便多起來了，我經常在寫政論文章之前垂詢他的意見，羅德丞不僅知無不言，而且立場清晰，理據贍足，令我眼界大開，相交多年，我和他建立了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

羅德丞令人最難忘的應該是他在基本法諮詢期將要結束之前提出震撼性的「一會兩局」方案，刺中港英政府的神經線，也因此而遭到港英政府和親政府傳媒的打壓和抹黑，摧毀他的聲譽。儘管在「一會兩局」的設計上，我和他的意見不盡相同，但方案的精神我是理解的，所以後來我補充了方案中未克完善之處，得到他的同意，最後也獲得草委會的接納和通過，成為立法會現行的分組投票機制。

羅德丞的確是一個洞悉先機的政治高手，在競走的芸芸百駿

中，以他的政治智慧最高，能力最強，是最適合當行政長官的人選。羅德丞的政治觸覺永遠快人一步，而且行事清楚俐落，絕不含糊。九七前，他有意問鼎行政長官，就作出放棄英國護照的決定，以無國籍人士的身分申請中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這個過程是既必需而又莊嚴的，表明了服務的決心和誠信，不像有些人延至最後一刻才放棄外國護照，予人一種利益交易的心態。可惜，切切實實做準備工作的人反遭中傷，閃閃縮縮持功利心態的人卻備受欣賞，怪不得有人批評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反智的年代。

繼標兄是我的老同學，他在後過渡裡曾經追隨羅德丞工作近十年，直至羅決定退出政壇為止，一直協助羅德丞組織政團、起草建議、撰寫評論，對羅德丞的個性和行事作風有較深的認識，由他為一代政治貴族羅德丞素描畫像，把一些政壇中重要的人和事記錄下來，應該大有可觀之處。正如繼標兄所言，他是以個人觀察和感受下筆，難免滲雜了主觀成分，讀者不必以讀歷史書的眼光去看這本書，能夠從書中多了解羅德丞的真性情，找到某些重要事件的一鱗半爪、書中人物的吉光片羽，也不失為一集消閒的政治小品了。

馬力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

序

正如陶傑在《我所認識的大羅》文中所言：「大羅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人物，是宜興茶壺的一層茶垢。大羅逝世，天星鐘樓拆卸，香港落幕了。」羅德丞辭世標誌著香港一個時代的結束。

毫無疑問，羅德丞是香港政壇的精英，是政界少有的奇才，無論是戰友或政敵，都承認他的政治智慧高深莫測。他來自顯赫的家族，祖輩幾代都是港英的寵兒，港督麥理浩更視他為延續華人世家與港英協作僅有的一燈香火。

背負雄厚的家族背景，並沒有令羅德丞變成不務正業、遊手好閒的紈袴子弟。他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法律系，「系」出名門，英文寫得辭采茂贍，詭黠雋永，最難得的是他兼備國學的修養，精研玄空飛星，窮究天人之術，是一個真正對學問有興趣、有追求的人。他授我沈氏玄空學時曾說：「我很喜歡學習，如果每晚睡前確知當天曾學到了一些東西，是我最快樂的事。」

在政治舞台上，他常以冷傲的面孔示人，閒時卻是一個風趣、溫熱的性情中人。他行事霸道，恃才狂傲，看不起愚蠢的政治對手。他機靈善變，好行險著，是標準的政治賭徒，他不但好賭，而且賭得聰明機智，賭得盡，賭得大。他對我說：「搞政治就如食鴉片，不上癮是不舒服的。我已是個癮君子，這個癮是祖輩傳下來的，一出生血液就流著這個癮，戒不掉的。」

從羅德丞「肺腑之言」和他在港英期間的突出表現，我們相信

他對回歸後參與香港的管治確有興趣。說羅德丞賭得盡，莫過於他的行事永不避忌別人的蜚流。他辭退行政、立法兩局職位，譴責英廷背信棄義出賣港人，並成立「太平門公司」助人移民，倒捻英國人的龍鬚；他勇於在六四後做第一個上京與李鵬握手的香港人；他敢於揭穿港英推銷人權法案和興建新機場的陰謀；他毅然放棄英國護照，主動申請中國國籍，做純正的中國人；他也是第一個獲得中國銀行貸款辦親中雜誌的非共產黨員。這些政治上的本錢假如能夠善用，羅德丞可以在政壇上呼風喚雨，可惜恃才傲物的貴冑性格，令他難以與異己為伍，也難以為大多數人所容受，以致孤芳自賞，含鬱而終。

儘管他在九七年退下火線後，逢人讚董建華做得不錯，說自己很享受退出江湖後閒雲野鶴的生活，言不由衷，「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明眼人都感受到他說話中的酸葡萄味。志屈難伸，就如癮君子辟禁，把血液中流了幾代的毒癖沈沙磨洗，心底裏卻縈繞前事，未盡逍遙，「只可惜一片江山」。倒行經脈，悖性而行，無異於以豨苓引年，自尋死路。

我替羅德丞工作接近十年，的確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十年一覺揚州夢，所見所聞令我感慨良多。我希望可以通過這本小書，近距離記錄一個傳奇人物「打江山」的心路歷程；探討一個殖民地貴族精英，面對香港政局的轉變，如何擺脫親英背景，轉而爭取新宗

主國認同的曲折過程，並記述一些鮮為人知的政壇趣事、醜事、隱事、軼事，以為談佐。

我從沒有寫回憶錄的打算，所以過去的人和事都是憑粗略的記憶，一點一滴地沉澱出來的，所以難免有時間顛倒，人事錯配的誤記，讀者當作「十年來政壇目睹怪現象」般的繡像小說或評彈說書來看就好了。全書以事為經，以人為緯，皆從我個人的觀察和感受下筆，「有我之境」、「一面之辭」當然不能盡信。

書中略去冗長的文件，信筆鈎沈，只想速寫人物的真實性格，勾勒有趣的現象，點染政治的生態，剪影一瞬間的浮光。政海管窺，雖然是一鱗半爪，支離破碎，難成系統，但總不時提醒自己，寸心千古，不可茹昧良知，含血噴人，這是我寫書時案頭的戒尺，如仍有得罪之處，還請包涵見諒。

我於二〇〇六年八月移居加拿大，四個月後忽聞羅德丞逝世噩耗，震驚不已，除了在《信報》發表悼念文章《記兩局制，憶羅德丞》之外，也即時興起懷人憶舊的寫書念頭。然書未及半，突遇血管栓塞，送院留醫十五天，苦不堪言，幸好影響輕微，大腦思維能力未失，惟視力、記憶及辨字系統受損最深，面對打擊仍恆記陸九淵名言：「我雖一字不識，仍要堂堂正正做人」。在大病初癒期間，除勤追前事、惡補之無外，仍下決心在事事尋根、字字推敲的困境下勉力完成此書，算是向一代風雲人物羅德丞先生致以一絲

《戰城南》式的悲鳴和哀號。

臥病撰書期間，得內子及岳父、母徐匡謀伉儷悉心照顧，周志南伉儷及王志強牧師、師母之鼓勵祝福，密市證道浸信會美城堂及聖公會頌主堂兄姊之合禱，不盡感恩。此書付梓，承博益出版社霍詠詩小姐誠意推薦，鼎力玉成，又得老同學馬力兄不吝賜序，感幸殊深，謹此致謝。

高繼標

二〇〇七年五月

作者簡介

高繼標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理工學院高級文憑；香港大學文學碩士。

89年任新香港聯盟總幹事，協助策劃「一會兩局」政制方案。90年，以「新香港聯盟秘書處」名義撰寫一系列評論，質疑港府推出新機場計劃的動機，所提建議日後均被採納入中、英《新機場諒解備忘錄》之中。93年任《WINDOW》英文周刊中文部總編輯及社長羅德丞先生之私人助理。96年協助第一屆特區行政長官參選人李福善先生組織競選工作，為李先生撰寫參選政綱及一系列政策文件。97年，任香港協進聯盟總幹事。

參予促成穩定香港協會、香港華人革新協會、新香港聯盟成立三會聯席會議，任籌備小組召集人。95年獲新華社香港分社委任為香港地區事務顧問。96年統籌大型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歷程圖片展」，任策劃小組召集人。

曾在《香港商報》先後撰寫專欄「起解篇」、「政海觀瀾」、「李議員辦事處」及「雀邊物語」。其餘數百篇政論文章，散見《信報》、《明報》、《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經濟日報》、《天天日報》、《星島日報》等。

在音樂方面，歷任香港樂樂國樂團團長、駐團指揮。88年起應聘為拔萃男書院中樂團指揮。96年率領拔萃男書院中樂團代表香港赴倫敦參加英國節日協會七十五周年紀念音樂會(Festival of Festivals)。05年參加第三屆青少年民樂團北京邀請賽，獲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頒發優秀指揮獎。

目錄

第一章

由認識羅德丞到涉足政圈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香港的政治氣候非常不穩定，每天的新聞都聚焦在北京天安門的大學生反貪污反腐敗運動中，氣氛的沉重簡直令人窒息。作為一個執教十一年的中學教書匠，無論在認知和心理上都無法適應這種政治的氣壓——八年後回歸的祖國竟是這般的不可理喻。

我和學校裡其他的同事一樣，當時心裡出現了一種強烈的感覺，教書這行不可以安身立命，大時代將至，求變是求生求存的先決態度，既然無能力離開香港，我應該嘗試其他工作，擴大個人的視野和見識，強化自己的能力，以應付新的轉變。

大學的老同學馬力知道羅德丞發起組織的政治團體「新香港聯盟」剛剛組成，聯盟的秘書處極需要人手，問我有沒有興趣棄教從政，表示可以引薦。

我和馬力是大學的同學，一起執教鞭的期間也

合作過編寫教科書，假期常相約回國遊歷，尋師訪友，算是志趣相投的好友。他這個建議確如荒漠甘霖，即時燃起了我求變思動的希望。

馬力約我到中環連卡佛大廈位於基本法諮委會秘書處的辦公室，向我詳細介紹了羅德丞的背景，指出這個人有志在千里的政治興趣，他組織的新香港聯盟暫時以論政為主，但是日後準備積極參政，時機成熟就會蛻變為政黨。參加聯盟的都是政商界的知名人士，分量十足，是一個很值得服務的團體。

得馬力推薦任羅德丞政黨秘書

馬力為人爽直，重友情，知道我思動的意願，幾天後就把我向羅德丞引薦了。那晚，羅德丞到諮委會開會完畢，邀馬力晚膳，談起組織政團的進度，馬力就打蛇隨棍上，把我推薦給他。羅支吾以對，似乎手上已有人選，但又不好意思直接推掉馬力。飯後，馬力仍然死纏爛打，拉著羅德丞不放，兩人就在娛樂行的石柱繞了幾個圈，結果為我約好日期，到太古大廈十一樓羅文錦律師

樓去見羅。

那天我下課後便立即趕到諮委會與馬力會合，一同步往近在咫尺的羅文錦律師樓，一邊走，馬力不忘一邊教路，提點一些見面時可以談的話題，和解釋一些政黨秘書處的基本功能和實際運作，好讓我待會兒見到羅的時候，可以應對得更加從容得體。

羅文錦律師樓是香港少數的老牌大行，由羅德丞父親羅文錦與叔父羅文惠共同創辦，律師樓的英文名叫「Lo & Lo」就是指這對羅氏兄弟。羅德丞承繼了父親的律師樓業務，成為律師行最大的合夥人。羅文錦既是香港的望族，又娶了何東爵士的長女何錦姿為妻，匯集兩大家族，風頭一時無兩，羅文錦之後更貴為定例局（立法局前身）華人代表，母親何錦姿擁有貴婦身分並無公職，卻破例獲授CBE勳銜，這都為羅德丞日後進入港英幕府種下善因。

律師樓裝修陳舊，掛滿扁額

羅文錦律師樓雖然坐落中環老牌名廈——太古

大廈十一樓，但裝修卻頗嫌陳舊，襯不上它顯赫的名聲。羅的辦公室在樓層的最盡頭，要走過兩旁堆滿文件櫃和辦公桌的狹小通道，經過一列律師的房間和會議室才能到達。論律師樓的氣派，要比很多二三流的律師行遜色。

羅的辦公室約三百平方呎，裝修簡樸（甚至可以形容為簡陋），與主人公的身分並不相配。花梨木辦公桌和維多利亞式旋柱淺雕柚木十二人會議桌風霜處處，看起來像五十年代的傢具，大概由羅文錦時代就開始用到現在。辦公室有向海的大窗，窗外的維港景色被怡和大廈擋了一半，向東面看，天星碼頭的鐘樓就在眼前。辦公桌旁擺放了一個大金魚缸，養了七條金魚（後來才知道羅篤信玄空學，缸中養的是風水魚，流年行七運，故養七條金魚，不能多也不能少）。

牆上掛了一塊秦事訖送的精雕木刻扁額「善辯善恕」、一對由區麗容送的用紫檀木作框的謝聯「偉論高談片言折獄，排紛前恥肇錫嘉猷」，都是與訟人勝訴後送給羅文錦的。另一面牆掛了曾靖侯為南華會寫的「法界英賢智理尤能週四國，人倫弁冕聲徽不但滿南華」對聯，挾翼著一幅中堂

賀辭。

近窗的牆上另外還有一些相片，包括羅在立法局發言的相片、與港督麥理浩的合照、與行政局議員的合照、在港督府獲授CBE勳銜的相片及羅氏家族位於大潭的度假別墅全景（現址為美國會所）；最有趣的是何東正室麥秀英為何東納平妻張靜蓉（張蓮覺）以延燈火的一封手扎也掛在牆上。羅德丞的母親何錦姿正是何東平妻張靜蓉所出，所以羅視這封手扎為家族文獻，珍而重之。

高級合夥人只管分紅，不理律師樓事務

羅的辦公室門外，掛了一塊約六尺乘四尺的金漆木雕牌匾，上面寫著「華袞榮褒」四個字，出自前清太史江孔殷的手跡，是羅文錦獲授爵士勳銜後，客人請江太史寫來送給羅文錦的。子承父業之後，這一塊匾額就一直掛在羅德丞的辦公室門外。

羅德丞在約好的時間才出現於律師樓。六尺高的巨人客氣而滿有威嚴地和我握了手，並遞上名片。名片上只簡單地印上「羅德丞」和律師樓的

電話地址，甚麼 JP、OBE、CBE 的頭銜都沒有印上。羅很隨和地領我們到他的辦公桌前坐下。

後來我才知道他從不坐鎮律師樓，也甚少處理律師樓的業務，律師樓交由幾個合夥人賈秉華、李志華、宋衍禮等打理。羅平日視律師樓為見客的地方，所有事務都在家中處理。

他由出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之後，已經全心全意從政，在律師樓他是招攬大客的高級合夥人，不做法律文件，不管日常運作。在羅德丞政治行情看漲的日子，其他合夥人也無大意見，但當九七後全港律師樓生意不景，連未嘗虧本的羅文錦律師樓，業務上也出現赤字，加上羅德丞的政治行情看淡，其他合夥人對羅坐地分肥的合夥方式大有意見，羅一怒之下提出以億元計的盤口退股羅文錦律師，令其他合夥人不得不知難而退。

風趣幽默中不忘談辭職原因

羅甫一坐下，秘書小姐已把香氣四溢的蒸餾咖啡奉上。馬力談不到兩句話便託辭諮委會還有事要辦，故意先行離去，讓我可以與羅德丞單獨詳

談。

我端正襟坐，準備迎接一場疾風厲雨式的「拷問」。出乎意料之外，羅先生並沒有嚴肅地問我如何去管理一個秘書處？如何協助成員參政參選？對當前的政治有何看法？對新香港聯盟有何認識？只輕鬆隨便地問了一些香港教育工作的苦樂，自白對中國文化接觸不深，但很有興趣；並開玩笑地說自己腦袋想的比口裡說的要快，表達的能力太弱了，如果當教師，不是把學生悶死就是被自己氣死。

話匣子打開才知道這位昂藏六尺，被譽為港督麥理浩身旁的金童子的政治高人，竟然是這般風趣幽默，談笑風生，我平生未遇過如此重量級的大人物，果真有聞名不如見面的感覺。往後的日子，我在許多場合之中，都發現羅先生在說話方面的「特異功能」，幾句說話就能把場面氣氛搞得輕鬆活潑，賓主共歡。

羅先生風趣的語調把我之前忐忑不安的焦慮心情一掃而光。我是有備而來的，我把話題轉到他辭職的事，說他在關鍵時刻辭去兩局議員職位，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事件備受香港人的注目云

云。羅對這個話題立時表現得很有興趣，他以授課的口吻很仔細地解釋中、英兩個主權不能同時效忠的理論，辭職的決定是政治現實下的必然選擇，英國政府自從決定把香港交還中國的一刻開始，已經說明她不再對香港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這番理論其實並不難明，羅不厭其煩地向我灌輸，是要通過向我的循循善誘，再次鞏固他為何辭去兩局的「標準答案」，還是要在入幕前先替我洗腦呢？我不得而知。我當下不表意見，也不追問辭職決定的合理性和真正因由，只以一副未經世面的表情靜觀他的「授課」。

辭職的決定直接誘發羅去組織新政治團體的動機，羅先生興致勃勃地大談組黨的過程，又逐一向我介紹黨內成員，並謂黨內不乏政、商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能一爐共冶並不容易。羅特別提及的有利榮康、韋基舜、沙理士、梁振英、梁愛詩、李國章、黃宜弘、簡福飴、曹宏威、王敏超等，似乎是羅當時認為可信的朋友。羅又拿了一些聯盟的立場及章程稿本和成員的一些有關資料讓我回去細讀，然後看一看腕表，說要趕赴晚宴，我可以隨便留在他的辦公室看資料。話音未落已經

從小門離開律師樓。

打手文章博得羅德丞的青睞

離開羅文錦律師樓，一路上心裡盤旋著許多問題。究竟這次「面試」是成還是敗？算是第一輪面試還是已經談合攏了？為甚麼不談職銜、薪津、假期、福利、工時……？具體細節不談是否意味著落選，免傷感情，大家好下台？抑或羅心目中已有人選，見面只是擺擺姿態，算是向馬力交代呢？

心想，既然把聯盟的資料交給我看，就已經是一種姿態了，我深知自己在政治的歷練上非常有限，要羅先生聘用我，我必須有些實際的表現，向他證明一下自己的才能和意願。

我把面談的情況告訴馬力，他建議我先寫些政論，他可以介紹到報館的副刊刊登。於是，我一口氣寫了幾篇文章，第一篇是《不認真的羅德丞》，以陳莽為筆名（取誤落塵網之意以自謔），回應某些批羅的評論，登在《明報・自由論壇》，一篇評論民主拒共派的譁眾言論，登在《信報》副

刊，一篇論立法機關議席開放的進程，登《文匯報》「眾聲」版，刊出後傳真給羅參考，並請示意見。翌日，羅先生叫秘書和我約時間再上律師樓見面，心想這幾篇文章似乎已如預期般奏效了。

見面時，羅先生沒有圍繞我寫的文章拉扯話題，反而開門見山直問我要價多少，何時可以上班。當時正值六月底，我表示學校的工作未完，考試期間下午不用上學，可以到聯盟做半天工作，七月中可以全職投入，至於待遇，我說教師薪酬現時是一萬七，羅先生不待我再說便趕著說：「那就一萬七好了。」邊說邊把這個數目寫在案頭的日記簿上。

羅德丞要馬力欠他一個人情

我大學畢業後只做過教師一份工作，沒有討價的經驗，也不認識私人機構的薪津結構，所以有關假期、補時津貼、年終雙薪、約滿酬金、應酬津貼等重要條件都不懂得去問，甚至連職稱也不著意去釐清便答允受聘了，幸好羅先生是個衡工量值、重視人才的老闆，只要合情合理，用得其

所，一切開銷羅先生都會照准。碰上羅先生外匯投資得手之時，還會有意外的犒賞。

我當時只懂得問上班時間和下班時間，羅先生呷一口咖啡，冷冷地說：「我不管你何時上班下班，我要你的時候能找到你就是了。」我唯唯諾諾，心裡總覺得這樣的要求不大合理，後來才知道政治團體的工作是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進行的，有事則任何時候都要出動，無事也不表示你可以逍遙自在，秘書處後勤工作絕不容許鬆懈，政團工作的特質就是這樣。

羅先生告訴我，聯盟的會址在麥當奴道42號地下，這段時間我可以在律師樓上班，也可以到會址上班。於是，我便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開始以兼職的方式瞞著學校（俗稱秘撈，因教師合約要到八月底才完結）每天下午跑到香港島協助羅先生處理「新香港聯盟」的事務。

我在翻閱聯盟資料時無意中發現，應徵我這個位置的有來頭不小的人物，主要是資深記者，他們的閱歷都比我深，依稀記得無線名記者張志剛也在名單之列，而且要求薪金比我低。

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夠有機會為羅德丞工作，不

光是靠幾筆書生翰墨，而是因為馬力的原故。羅先生是個政治精算師，我是馬力介紹的，聘用了我，馬力就欠他一個人情，請我就等如變相拉到馬力相助，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至於資深記者，背景複雜，政界恩怨是非纏身，而且也認識羅的過往，難言忠心，一旦變節，倒戈相向，則後患無窮。論人際網絡，我怎比得上記者，但我優勝的地方是個人背景單純，無潛伏性的政治連繫，可塑性比資深記者要強。羅先生的確是一個機關算盡的聰明人。

第二章
羅棄英投中的轉捩點

羅德丞是標準的政治貴族，在港英統治的年代，由外祖父何東、父親羅文錦以至羅德丞自己，三代人都是港英政府積極培育的華人代表。何東由洋行買辦晉身政壇，是家族參與香港政治的緣起；一九一五年羅文錦在英國倫敦以全英法律課程試首名之卓越成績畢業，回港後與弟羅文惠共同創辦羅文錦律師樓，羅文錦亦以華人代表的身分被收納入港英的管治架構中，一九三五年被委任為定例局（前立法局）議員，後晉升為行政局議員，與港英統治結下不解之緣。在五十年代，CBE（最優秀不列顛帝國司令勳章）是封爵以外殖民地政府授勳的最高榮譽，羅文錦與夫人何錦姿（何東長女）先後獲得英國政府頒授CBE勳銜，羅文錦在戰後還獲授爵士勳銜，可見港英對這個家族的重視。

麥理浩身旁的金童子

麥理浩任港督的那幾年是羅德丞最得意的時刻，由市政局議員晉身立法局，繼而獲委為行政局議員，正式接掌家族參與港英管治的「世襲」位置，羅當時剛四十出頭，被政界譽為麥理浩身邊的金童子。這樣的厚待，除了突顯出羅家如何受港英的重視外，更助長了少年得志的羅德丞囤養政治貴冑的性格。

羅德丞很喜歡談起父親羅文錦的輝煌歷史。有一次與記者飯局，羅德丞談起父親在日治時代被逼出任定例局傀儡議員，但父親堅守原則，由日軍載去參加會議，卻甚麼事情都不做，實行無聲的抗議。羅德丞繼續說經常有不明身分的陌生人到府小住，與父會面，離去時父親總會密封一些信函交給他們，飯局記者都投其所好，說這些陌生人有可能是抗日義士，羅德丞卻說：「我唔知啊！」

名單外洩，鍾士元要踢走羅德丞

如果沒有一九八四年的噩夢，羅德丞大概不會轉投中方的懷抱。

政界流傳這樣的傳言：八四年五月，羅德丞隨鍾士元為首的兩局赴英游說團訪英碰了一鼻子灰，再計劃組團訪京。根據行政局的決定，訪京團的人選為鍾士元、羅保、利國偉和鄧蓮如四人，但人選安排引起部分局內人士不滿，鍾士元為怕名單外洩，特意在行政、立法兩局內務會議上公佈訪京名單時，鄭重叮囑所有與會者保密，免中方有提早防範的機會。但名單偏偏外洩，果然，北京發出的邀請中剔除了立法局首席議員羅保，影響了整個訪京團的代表性，港英政府導演的三腳櫈把戲——以「港人代表訪京」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了，矛頭指向羅德丞。

據《許家屯回憶錄》上的記載，許曾經與羅德丞會晤，談過一些事情，羅說他身為行政局議員，不便透露內部決定，但在情急之下又說漏了嘴，許家屯雖然沒說羅透露了甚麼，但觀其語氣，似乎不太欣賞羅德丞的作風。

名單外洩風波鬧大了，鍾士元要求當時的港督尤德把洩密者踢出行政局。八四年十月便傳出羅德丞辭去兩局席位的消息。當時，羅獲委任為新一屆立法局議員才剛三個月。

羅德丞的請辭，港府延至八五年二月才公佈接納，據說是不想在中、英正式簽署《聯合聲明》前夕打擊港人信心。事實上，羅德丞在尤德正式批准辭職前，已沒有出席行政局會議，在立法局會議中，即使出席也不發言。

八五年一月，他下定決心作別港英之後首次以私人名義訪京，認識了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奠定兩人日後深厚的交情。八六年十二月得機會見趙紫陽身邊的紅人胡啟立，開始了一生中另一段燦爛的政治旅程。

羅德丞重申對英國失望的立場不變

政界不斷渲染名單外洩事件，然而羅先生在報章和電台專訪中，仍反覆申明立場，解釋自己棄英投中的原因是不滿英國修訂國籍法，把港人拒諸英國門外，於是憤而辭職。而自聯合聲明簽署

後，香港前途已定，英國不再是香港主權國，所以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家族的長遠願景，棄英投中是理智的選擇。

他的政敵指他自說自話，模仿希特拉把謊話說上一千遍便成真話。當時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也公開埋怨港督尤德不公開真相，以正視聽。以意逆志，英國修訂國籍法是在一九八一年，但羅德丞憤而辭職是在八四年，三年後才憤而辭職，在時間上欠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羅德丞棄英投中的真正原因的確是撲朔迷離。如果羅德丞說不願看見「三腳櫈」的情況出現，確保中、英談判的健康發展，那該是多麼充分的理由。張學良式的大義滅親，中共第一個要感謝他。羅先生選擇了一個疑點重重的理由去解釋辭職的原因，反而留給人更多的疑問。

第三章

新香港聯盟亂世突圍

新香港聯盟的會址在半山麥當奴道42號地下，與羅先生住所（36號惠苑）只一箭之遙。物業本來是恒基名下的一口釘（收購有重建價值的舊樓其中一些單位備用），由於羅先生是恒基的董事，所以羅先生可以象徵式一元租用上址為聯盟會址。

這個物業面積約1200平方呎，是一個戰後落成的住宅樓宇，夾在一組舊樓群中，大廈外牆多處剝落，大廈入口的通道被一個固定車位佔去一半的地方，而且大廈沒有訪客車位，會員不能泊車於會址，無論怎樣看，這單位也不像是正正經經辦公的地方。

聯盟室內也沒有裝修佈置，仍然是兩房一廳的住宅間隔，只漆過牆壁，搬來一張十二人圓形餐枱作會議用，座椅也是拉雜的，新的、舊的，圓的、方的，有轆的、無轆的，式式俱全。

秘書處編制混亂，分工不清

上任後才知道我並非第一位受聘聯盟的職員，羅先生已經聘用了一位叫黃兆熊（港大文學院黃兆漢兄長）的退休人士，專責會議事務。他是黃宜弘的親信，由新加坡回港。黃的人品不錯，國學基礎好，英文也好，月薪也是一萬七，但只半天工作，早上回來看看報紙，下午三時準時離開，除了開會時做大綱式的英文會議紀錄，秘書處的其他工作他不會參與。黃也表明這是一份兼職，沒有準備全身投入。當時請一個英文系畢業的大學生月薪不到八千，而且年青力壯，任憑差遣，好使好用，聯盟是否需要用全職薪酬請一個專責寫英文會議通知和做記錄的兼職退休人士呢？這是我當時心裡浮現的問題。

秘書處另外還有一位小姐叫區彩蓮，是羅夫人張慧瑜介紹來的，對政團運作並無經驗，但工作勤快，盡忠職守，負責會計和聯絡等事務。

我則主力負責團務發展、起草文件及傳媒工作。初時，「三個和尚」都不知道彼此的職稱和分工，也不知道有沒有從屬關係，只知道聽從羅先生的

指示，各適其事。遇有重要和趕急事務，三個人惟有協調默契，互諒互讓，幸而大家都是明理的人，分工合作上才少有困難。因為我負責的工作範圍，分量較重，久而久之，其他兩位同事都以我為中心，幾個月後我才敢問准羅先生在名片上印上「新香港聯盟秘書處總幹事」的職銜。

岳母坐鎮，家庭式經營

羅先生為聯盟延聘職員的手法的確有點特別，其背後有甚麼玄機實在難以猜透。秘書處三個職員都不知道自己的職稱，要通過自行協商才醞釀出總負責人，三個人名義上是聯盟的秘書，實際上只是羅先生的私人秘書，秘書處沒有工作架構可言，三個人各自向羅先生負責，可以「老死不相往來」。

數月後，羅先生的私人秘書 Carmen 因移民而辭職，羅太把區彩蓮調到律師樓出替 Carmen 的位置，區在聯盟的職位由我舉薦一位頭腦靈活、聰明能幹的朋友陳小梅取代。秘書處仍維持「三人行」的局面。工作趕急，羅太會調動司機阿浩和

菲傭到聯盟協助，初期還派菲傭到42號為我們弄午膳，搞衛生，頗有家族式經營的意味。

談到聯盟秘書處的後勤工作，除了我們三人之外，不得不提張崔秀英女士。張太是羅太（張慧瑜）的母親，是一位心地善良，能幹而有教養的佛教徒。她是張玉麒（張祝珊之子）的遺孀，孤兒寡婦曾經有一段被張家欺壓的慘事，女婿羅德丞曾夥拍表哥烈顯倫大律師替其興訟，向張家追討逾億元的家產，在各方估計勝算在握之時，法官柏嘉（後在佳寧案中受賄被逮）竟判張家勝訴。

張崔秀英雖受打擊，但堅強、樂觀的性格不改，仍然天天唸佛，自度度人。聯盟的秘書處經常看到她的蹤跡，張太雖然是皈依佛門、看破塵俗的居士，但卻非常緊張羅德丞的政治事業，特別是當聯盟決定參與地區事務，積極備戰九一直選，而羅德丞亦顯示出有意問鼎首屆行政長官之後，張太便開始「加盟」秘書處，在幕後擔負了非常龐大的實務和溝通工作。

從正式上任的第一天開始，我深切體會到這個以羅先生為首的政治團體，秘書處的結構並不健康，受職者權責不清，從屬關係混亂，半日安心

態瀰漫，人手不足，編制不全，秘書處職員主要服務羅先生，對其他會員的關照不足。這種先天性的缺陷，令聯盟予人一種寡頭會社的感覺，自是難以凝聚一班政治智慧不高卻是有頭有面的各界精英。

出爾反爾提政制，違反內部默契

我雖然看到這種種的現象，但也不敢貿然進諫。我雖然不曾涉足政界，但深懂政治是講實力的，一個政黨能夠取得權力，比一切外在包裝都重要；何況，羅先生是政壇的老手，又是一個被傳為聰明絕頂的人，我只是個半途出家、誤落塵網的政治小學生，連服務機構的英文名「Alliance」一字的發音也讀不清，又怎夠膽班門弄斧，以膚淺的常理去提點羅先生如何團結內部、籠絡各界及包裝形象。

熟識過渡期香港政壇動態的人都知道，新香港聯盟脫胎自「八十九人」工商諮委，當時「八十九人」由羅康瑞任發言人，而「八十九人」當中有積極進取的成員希望另組政團，部署參政，不

甘心留在一個書生議政式的組織，所以有另起爐灶的動向。

當時，以郭志權和陳永棋組黨的興趣最大，小羅（羅康瑞）戀棧「八十九人」，無意改變；大羅（羅德丞）作別港英，靜極思動，所以郭、陳力邀大羅加盟新政團，相約於八九年二月中的一天，假環球大廈的「太平洋會」商談籌組新政團的事，席上還請來「四料」議員譚惠珠提供勵進會的籌組經驗。譚惠珠是大羅的後輩，也是勵進會主席，行事過分審慎，她不會加入新的政團當領導，只是郭、陳興趣最大，有開天闢地的野心。組織的名稱有了，叫「新香港聯盟」。

幾天後，郭志權把會章交羅德丞，刻意把政制討論留給「八十九人」，「新香港聯盟」只關注教育、經濟、勞工、交通、居住等事務。羅德丞一向不重視這些文件，他認為文件是死的，政治是活的，所以也沒有表示意見。但大部分人都意識到新港盟是不談政制，只談民生的，所以「一會兩局」出現，才有「出爾反爾」，又談政制，不守信諾的指摘。

創會之初，偏遇六四賜良機

八九年三月，三十八位創會會員其中二十位來自「八十九人」，齊集富麗華酒店舉行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討論聯盟的架構和運作模式。與會成員都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熱的資本家，顆顆天皇巨星，但多半欠缺組黨經驗，又不甘心居於人下，所以新政團不設主席，羅德丞請纓當義務秘書長，黃宜弘自薦當義務司庫，所有會員都是理事，實行共產黨式的集體領導。

當聯盟正招兵買馬，醞釀成立之際，香港正受北京六四事件的衝擊，政治氣壓極低，人心惶惶。六四事件對中國、對香港而言，都是極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我們當下的反應是驚惶失措。聯盟剛剛組成，原意是在仰仗中國政府的誠信下開拓香港的參政活動，現在卻面對嚴峻的政治氣候，於是「如何在政治上立足」就成為聯盟最現實和迫切的問題。

羅先生和幾個核心成員（韋基舜、梁振英、簡福飴、黃宜弘、曹宏威、阮北耀等）經常聚會，大家都聽羅先生分析北京局勢（今天是第二十六

軍打三十七軍，明天是大學生如何被外國勢力利用為反華力量……，其實都是書生論政，道聽塗說，不盡不實。）不過大家都了解羅先生作為聯盟的核心，他很自覺地在此刻要承擔在聯盟中的任務，努力地尋求政治上的舉措，要為聯盟找立足點。

我們決定向外宣佈，由會內幾位律師（李志華律師、賈秉華律師、宋衍禮律師、烈顯倫大律師等）組成小組，研究如何在法律上向英國施壓，為港人爭取英國國籍，以安港人之心。但大家都知道這只是擺擺姿態而已，聰明的律師們當然知道花費巨額的訴訟費與英廷對簿，是徒費氣力的。所以這方面的工作根本不曾認真過。

另一方面，我們從實實際際的角度考慮：在民主拒共主流下，如何建立一套立法會運作機制，以釋中方疑慮，保證一國兩制可以落實執行，中方不會干預香港政治。

邵善波鋪路，羅德丞披甲成闖將

羅先生認為這是以曲線救港的方法，既符合當

前形勢的需要，又可以趁機建立個人在北京政府心目中的地位，故此為尋善法而覃思精慮、搜索枯腸。

適逢基本法諮委會秘書處副秘書長邵善波私下向北京推銷「兩局制」，把未來立法會分成兩局，以分組投票的機制箝制會內獨大的勢力，獲得北京的祝福，於是邵回到香港後，找羅德丞作為香港的炮手，推出「兩局制」（後來正名為「一會兩局」方案）。

羅德丞知道方案已獲中方祝福，而且方案的精神也與他的想法脗合，當然不會失諸交臂，所以儘管新港盟創立時，由郭志權草擬的會章宗旨中故意剔出政制，有意把政制留給「八十九人」工商諮委分道揚鑣。但肉當虎口，揚威立萬的機會羅德丞豈會輕易放過。

政情的瞬間萬變，均以政治上的實際利益作依歸。

例行公事，游說譚惠珠支持

有一天，譚惠珠上羅文錦律師樓見羅先生，大

家閉門會議，談了一個小時，相信是羅先生想說服譚惠珠支持「一會兩局」政制方案。

譚惠珠是個相當審慎的人，對形勢也看不透，譚是老牌政團勵進會的主席，要她支持一個初生政黨所提出的方案，未免尷尬。何況她是現職的立法局議員，不便與叛逆港英的羅德丞走得太近，加上譚惠珠本身傾向支持「八十九人」方案和兩局共識方案，所以對羅的游說無動於衷。

離去時我送她乘升降機，她一邊走一邊說恭維的說話：「TS的腦袋轉得真快，怪不得頭這麼大」。羅德丞游說譚惠珠也不見得積極，大概也明知譚不會支持，見她只是例行公事，有個交代罷了。

為免外洩，記者會前方睹兩局制文本

聯盟在八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借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中環連卡佛大廈8樓的會議室召開記者招待會，把構思好的「一會兩局」政制方案正式向外公佈。選擇在基諮會召開記者招待會是相當合適的，它可以為方案的背景平添了一種「不平凡」的色彩——這當然也是羅先生的構思。

為避免方案過早外洩，在記者會召開前的個多小時，我們利用基諮會的另一個會議室召開聯盟的理事會議，把「一會兩局」方案拿到會議桌上徵詢盟員的意見，雖然事前羅先生曾以電話向成員力薦「一會兩局」方案如何有效箝制議會獨大的勢力，會議上仍有成員對方案懷有不少疑問（這些疑問卻反映了他們對政制的認識不深），例如「一會兩局」是否一個過渡性方案，兩局制和兩院制有何不同，方案未能銜接「八十九人」對取消地區間選和增加大選舉團議席的原則……

瞞天過海，兩局制暗渡陳倉

羅德丞除一一解釋，分陳利害外，還向成員強調自己剛從北京回來，暗示方案已獲北京的默許。當日的會議主席是簡福飴，看來他與羅德丞早有默契，表示方案只是骨架，提議「拋出來討論」，再吸納四方意見，不斷修訂完善。這說話有效地轉移視線，部分成員雖不支持方案，但同意把方案「拋出來討論」，於是會議正式通過新港盟提議特區立法會採用「一會兩局」方案。

羅德丞一招暗渡陳倉，不但化解了會內的一次嚴重分裂，也讓兩局制可以順產出台。不明白「推出方案討論」即等如支持方案之理，反對派的被騙也是活該。

原定派出七至八位盟員召開記者會，結果，大部分與會者（除了梁振英、梁愛詩）都願意坐在鏡頭前會見傳媒，營造團結氣氛，把長桌都坐得密密的，記憶中，有：烈顯倫、黃震、岑才生、黃宜弘、韋基舜、宋衍禮、曹宏威、鄔維庸、郭志權、阮北耀、徐是雄、王敏超、何鍾泰、黃匡源、簡福飴、楊孝華。翌日報章刊出新聞圖片，陣容之盛，蔚為壯觀。

本來，羅先生的個人魅力為聯盟的啟步注滿發展動力和契機，可惜的是，羅先生思考問題，慣從大原則、大綱領著眼，不拘小節，少爺仔性格令他不重視溝通技巧，不主動凝聚盟員。創會盟員之中其實不乏有影響力的各界精英，是過渡期湧現出來的一班政壇新秀、明日之星，這班人雖然政治智慧遠遠不及羅德丞，卻自視甚高，而且承受不了壓力，對時局觀察力又弱，一有外力拉扯，便如草隨風，甚或倒戈相向。

梁振英幕後供彈藥

「一會兩局」記者會後，反對的聲音此起彼落，羅康瑞為首的「八十九人」工商諮委陣中更炮聲不絕。為了迎接各方面的攻擊，聯盟秘書處組織了寫作小組，為盟員撰寫論壇講稿，又撰文登報反駁、辯析。在基本法諮詢期的最後階段，政團之間的爭論無可避免愈趨白熱化，大家都為了保住自己的本錢，所以互揭瘡疤，黨同伐異的手段層出不窮。

「八十九人」工商諮委是專攻政制方案的「大戶」，當然不甘心在最後階段眼巴巴地看著新港盟後來居上把桂冠奪走，所以對「一會兩局」方案恨之入骨，攻擊至力。事實上，新港盟要插旗揭竿，首先要撼除的就是「八十九人」，取代它在中方既有的地位。

八九年十二月，草委會政制小組在廣州會議通過政制方案的前夕，一天晚上羅德丞打電話給我，要我當晚見梁振英（新港盟理事），說他會提供一些資料給我撰寫政制評論文章。大約晚上九時，梁振英的平治房車開到我干德道適雅大廈的住所，

把我接去中環怡和大廈仲量行他的辦公室，一邊翻閱當天的《南華早報》，一邊吩咐要我做的工作。他早預備了一些資料，是過往「八十九人」對政制立場的文本，最重要的是兩週前他們剛完成的一份問卷，調查會內對政制方案的支持程度，結果顯示成員對分組投票機制的立場並不一致，但羅康瑞和鄔維庸卻在廣州記者會上，聲稱香港工商界並不贊成「一會兩局」，有歪曲事實、瞞天過海之嫌，所以著我寫一篇文章揭發羅、鄔有欠磊落的手法。

在梁的辦公室大概留了一個小時，他便用車送我返家。梁振英算是隨和的人，但對我認識不深，說話非常謹慎，他在車上和我聊天，說他婚後買的第一間房子便是適雅大廈，當時還是全海景的單位，但幾年後海景只剩一線，後來搬到赤柱獨立洋房，地方寬敞多了。梁雖有官款，但也有他隨和的一面。

我連晚起草文章，翌日早上傳真給他和羅先生審閱，等了半天不見回覆，本來這篇文章早一天見報晚一天見報，關係不大，但羅先生對發炮文稿最緊張，多番來電，我又不便狂催梁振英，只

有空著急。大約下午一時，梁從機場回電，說正準備上機去北京，文章沒有問題，可以發稿，說如有其他選擇，最好不要發給《文滙報》和《大公報》。於是，我找《信報》登出（見九〇年一月三十日《信報》《工商諮委對政制立場搖擺不定》一文），羅先生看了很高興。

梁振英任隱形顧問

梁振英是羅德丞的入幕之賓，是羅的重要智囊，但人還比羅德丞聰明，而且處事圓滑小心，交際手段八面玲瓏，很懂得觀察形勢，不愛公開表態，熱衷在背後做工作。

梁是新港盟的理事，新港盟成員紛紛中箭墮馬，但梁依然屹立不倒，且接鍾士元之棒，位至行政會議召集人，可見梁的政治手腕高深莫測。他說永不選特首，羅德丞對他更沒戒心。

林行止飯局之前先放冷槍

「一會兩局」方案面世後，羅德丞馬不停蹄約

見各大傳媒老闆及主編，分疏理念，名義是回收各方友好的寶貴意見，實際上是請吃飯博好感，打好招呼，建立與傳媒的良好關係。

政論界中第一健筆《信報》的老闆林山木（筆名林行止）當然是首批要打交道的傳媒對象。八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林行止在《信報》「政經短評」首先發炮攻擊羅德丞，羅先生急急約好林行止於九月八日在中環上海總會午膳，叫我作伴。

九月八日的那一天，林行止在《信報》「政經短評」上再次用更強的火力炮轟羅德丞，文章罵羅「機關算盡」、「拖慢政改步伐，幫了北京一個大忙」，又歪曲羅在電台訪問的說話，指羅是「真小人」。

羅先生早上看了，出奇的不慍不躁，沉思半晌後，說：「這篇文章是故意寫來堵著我的口，叫我小費唇舌。沒關係，吃飯時你看我如何質問他。」羅叫我把上海總會訂位由廂房改為散座，由於改得遲，散座已滿，只能臨時在牆邊加張勉強容得下三個座位的小桌，羅先生說這樣更好，讓大家都不舒服。

我們提早到達上海總會，桌子是全場最小的，

部長連忙過來向羅先生致歉，說客滿沒辦法，羅先生說沒關係，很好。他先吩咐部長，羅太已點好了菜，待客人一到便上菜，菜愈快上齊愈好。

幾分鐘後，林行止準時赴約，見到坐的是一張小桌，表情不太自然。羅先生是初會林行止，第一次見面自然要客套一些，先禮後兵，所以先「久仰」他的辦報魄力和寫作之勤，說自己經常讀他的政論，跟秘書高先生和副總編輯陳景祥時有來往。

把林行止質問得無言以對

林顯得很慎重，聽的多，說的少。羅先生殷勤的替林倒茶，一邊為林夾菜，一邊談「一會兩局」方案。由六四事件如何啟發他構思新模式的政制方案，到「一會兩局」制誕生，時間如何急逼，在諮詢期最後階段才匆匆推出的苦衷。林行止只聽而不回應，顯然是不同意羅的觀點。

羅先生語調愈說愈亢奮，他見林行止默不作聲，便單刀直入，對他說：「林先生，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假如有一個人在諮詢期最後階段（不管

還剩下多少天）想到一個對香港有利的新方案，真小人的做法是不管如何仍要把它公諸於世，那麼，真君子的做法又如何？是否把它藏起來讓它湮沒無聞呢？我只不過是堅持要把方案公開讓人有機會去討論，為甚麼要罵我呢？為甚麼要罵我呢？」羅的聲線提得更高，旁桌的好事者也不期然望向我們這邊。

林行止感到非常尷尬，一時之間答不上話，只說：「我回去再想想。」我也趁勢揭竿起義，說幾天前以聯盟名義就《信報》的「政經短評」寫了回應文章，交《信報》刊登，但一直不見刊出，我故意問他《信報》是否在這方面有既定政策。林行止說：「你交給了誰？陳景祥？」我未及回應，羅先生馬上插口說：「討論要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才有意義……」林行止見話不投契，推說報館有事便提早離開。

雖然不歡而散，林行止還是一個有自省能力的人，翌日刊出的政經短評，在語調和用詞方面都平和得多了，文章只批評羅德丞的方案擾亂了多年諮詢的工作，給草委會帶來麻煩，而再沒有訴諸情緒的人身攻擊。

林行止所持理由雖然並不充分，總算是體會出讀書人的一點理性和良知。

未忘身段，坐失一統風派之良機

羅先生一直沒有做黨內公關、統戰工作，對一些邊緣盟員採取放任政策，沒有積極地拉攏，還是一派唯我獨尊，願者投誠的姿態，一部分盟員因為得不到重視，對聯盟的嫌隙漸生。游說、統戰工作，旁人永遠是代替不了的，加上，「一會兩局」受港英政府連同傳媒的猛烈攻擊，形勢險惡，玩票性質的盟員自然萌生去意。

從「一會兩局」的記者會上盟員爭先站台的現象觀察，我相信，假如羅先生當日可以放下尊貴身段，事前事後親自與各盟員作好溝通，做好公關工作，新香港聯盟應該是一個大有可為的政治組織。

新香港聯盟組成的初期，的確沒有參選的考慮和部署。以當時的政治情勢而言，政治的實權仍然只屬於中、英兩國政府，雖然中、英《聯合聲明》已經規定九七後香港實行港人自治模式，議

會代表由香港本土通過選舉產生，但久受英廷統治，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仍半信半疑的香港人，政治的反應實在遠遠跟不上時代的節奏和步伐。

《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四年簽訂，銳意參選的政黨要到六四事件後才相繼組軍。新香港聯盟和稍後成立的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啟聯資源中心（後來蛻變成自由黨）、自由民主聯會、工商專業聯會、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都是這類「後知後覺」的政團。

聯盟的大部分成員都不是過往港英時代的政客，更不曾在議會中佔過重要位置，籠統地說，都是機會主義者，希望藉著參與有實力的政治團體與未來的宗主國——中國，建立政治或商業的關係。羅德丞是會內唯一一位資深的政壇老將——前港英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所以與其他盟員相比，在地位上就顯得分外超然。這種無可比擬的魅力，協助羅德丞可以從容駕馭聯盟的發展方向，也在不覺間培養了他「政治貴族」的傲慢作風。

羅德丞視新香港聯盟為個人窺視特區行政長官的前哨站和氣象台，所以會內組織架構極之簡陋，

根本就不是一個政黨的規模。聯盟中所有會員均為理事，不設中央委員會、紀律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聯盟不設主席，每次會議由理事輪流當會議主席。在第一次會議上，羅德丞自動請纓當義務秘書長，黃宜弘任司庫，算是聯盟內僅有的兩個固定職位。這種安排，大家都知道是羅先生為駕馭聯盟之便而設，秘書長猶如國內部門的黨委書記，操縱會務發展和政治取態。

沙理士捐出寡婦僅有的兩個銅錢

莫以為聯盟成員是工商界翹楚，或是專業界精英，在財政上一定健全，誰知大家在為聯盟籌款時都表現得非常克制和禮讓，羅德丞和利榮康分別捐出二十萬，已經算是最大手筆；其餘郭志權捐十萬；黃匡源、黃宜弘、郭炳江各捐五萬；阮北耀、梁振英、鄔維庸、楊孝華、簡福飴……等各捐一至兩萬。沙理士捐出二千元，意思意思，還引用《聖經》自嘲為「寡婦僅有的兩個銅錢」，文采不凡。聯盟就是靠創會期間這筆為數約八十萬的捐款開展活動。

聯盟名義上由黃宜弘當司庫，日常開銷實際上由羅太主理。由於會址不需繳付租金，省了一大筆支出，羅太又是個精打細算的人，派出羅家菲傭來協助日常清潔及雜務，初期還替我們三人預備午餐，所以聯盟的籌款雖然不多，也夠用上好一段時間。

羅德丞狠批喬宗淮生活作風

聯盟的成立初期並沒有受到北京政府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俗稱為「新記」）的特殊禮待，當時在許家屯社長領導下的新華社，統戰工作的思維模式仍然極之封建保守，重點針對香港的大商家，以為成功統戰香港的富商就可以控制言論，順利回歸。從《許家屯的回憶錄》中大量統戰富商的資料，不難發現這種錯誤並非出於偶然。

羅德丞組織新香港聯盟初期並沒有得到新記的祝福，我認為背後有很複雜的原因。一是非根正苗紅的新進政治團體，不是新記主要的統戰重點；二是中、英關係尚未緊張，新記對政團的統戰工作維持低調；三是羅德丞是港英的棄將，政治態

度摸不清；四是傳聞當時新記副秘書長何銘思（六四後登報退黨，後為霍英東聘為顧問）曾經在許多場合評論羅德丞退出政壇的真正原因，質疑羅的誠信；五是羅對新記副社長喬宗淮（前外交部長喬冠華之子）浮滑的海派作風屢有微言，造成新記上下普遍對羅起了戒心。

六四事件之後，許家屯出走美國，周南走馬上任，喬宗淮最後被調到芬蘭，羅德丞推出為中方所接受的一會兩局方案，獲李鵬總理的接見，成為六四後第一個與李鵬握手的香港人，至此，羅和新香港聯盟才真正受到新記的另眼相看。

張晴雲匆匆過訪秘書處

記得「一會兩局」制方案推出後不久，《文匯報》副總編輯張晴雲突然打電話來，說想到聯盟秘書處一訪。《文匯報》是官報，古星輝（張的筆名）是香港政論界的一枝健筆，而且張的夫人是新記處長，張的主動造訪在姿態上就顯得十分鮮明了。

之前，我並不認識張晴雲，只知道他是《文匯

報》的主筆，社論大都由他操刀，但不知道他也兼負統戰親北京政團的任務。

張在下午三時三十分抵達聯盟在麥當奴道的秘書處，他身穿短袖襯衣，沒有結領帶，說話態度親切平和。聯盟沒有會客室，我也不想把他領到我桌前如面試般對坐，我也不知道他準備逗留多久，於是我隨手拉兩張椅，大家就在一堆印刷好的書刊前坐著談話。

張是個健談的人，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由香港政治談到中國現況，以至世界局勢，無論哪個題目都瞭若指掌，的確不愧為《文匯報》的主筆。兩個多小時裡，我大部分時間是做一個忠實的聽眾，間或提些問題代替彼此爭辯觀點，以調劑一下「授課」的氣氛。直至我的兩個同事分別下班，張才看一下手表，說時間不早，便揚長而去。走前沒有一句客套的說話，也沒有說些甚麼以後要加強連繫之類的陳腔。

之後，我在工作上直接找張晴雲的機會不多，但我撰寫的政論或由我執筆以新港盟秘書處名義發表的文稿投到《文匯報》眾聲版，都通行無阻，重要的評論甚至以特稿形式刊於當眼的版面上。

與背景相近的報章比較，《文匯報》比《大公報》和《香港商報》在支援愛國組織和親北京的言論上更為主動積極，更能發揮出在過渡期內團結友好抗衡親英言論的作用。新港盟日後發表的一系列政論及批彭定康的文章，主要的發放基地就是《文匯報》。

第四章
羅自述如何衝破政制小組缺口

羅德丞在香港回歸歷史中最受爭議的舉動，應該是在基本法諮詢期接近尾聲時，獨挽狂瀾提出的「一會兩局」方案── 立法機關分組投票機制。這個方案現在已經正式納入為《基本法》的一部分，成為特區立法會的運作模式，永存史冊。

當「一會兩局」方案推出之時，大家都指為中方授意羅德丞推銷的方案，觸動港英政府的神經線，遂發動傳媒展開大圍剿，務使羅德丞與北京政府人馬齊翻。

毛鈞年對羅德丞施行激將法

羅先生於死前兩年，以英文詳細記下當年提出「一會兩局」政制方案的心路歷程，交牛津大學歷史檔案館存錄（聽說資料要若干年後才予公開），要我替他翻譯成中文，茲節錄其中部分重要而鮮為人知的內容，以明事件的經過：

「我知道，個人公職生涯已經結束—— 從沒有人可以辭去英國殖民地行政局職位而不用付出代價的。但我要知道香港的未來對我和我的家族有何影響，於是，我嘗試到北京去找那些日後有可能處理香港問題的高級官員，了解一下他們的想法，才作出是否繼續以香港為家的決定。結果，除了一九八三年前已經退休的官員外，幾乎所有和香港事務有關的官員，我都有幸面晤，當時不覺得如何，現在回想起來，可算幸運。接觸之下，看到他們為國家人民服務的誠意，不沾染半點腐敗習氣，令我對留港更有信心。

不久，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先生與我聯絡，問我是否願意參加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由於我剛脫離港英政府，處境尷尬，但毛先生堅持邀請，並說如果我不參加，就沒有機會表達意見，日後基本法有任何不善之處，就不許我抱怨了。就這樣，我答應了毛先生的邀請。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時，我被推選為常委會委員，更詫異地以最高票數當選為副主任。副主任不止我一人，主任是安子介博士，他是個學者，卻未能掌握香港日常事務的脈搏。

往後的日子，我不斷為當前情勢反覆思量。

設立安全機制防止政制劇變

《基本法》大致上是依據《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而起草的，雖然我不大認同那些把香港推向西方式民主發展的條文，但可以改變的空間似乎不多。

香港從沒有自治的經驗，也缺乏具組織、有民望的政黨，寄望一個由民選產生的領袖出來治理好香港，真是談何容易。當然，中國政府有此能力，但在維持香港自由貿易經濟體系、「積極不干預」的既有政策、以及公務員系統和司法制度，她似乎缺乏應有的觸覺、膽量和信心。

無可否認，大部分的香港人（尤其是從中共政權中逃出來的香港人）仍具有恐共的情意結。

那麼，香港的前景如何，就要看法律上和政制上是否有一套安全的保障，以防止既有的體制受到突然和巨大的改變了。換言之，香港需要有一些時間去作出適應。

我這樣想：假如香港在將來的法制上授予中央

政府的權力與目前授予英國政府的權力看齊，就可以減低中國內地官僚對香港的干預。草擬中的基本法似乎也提供了法制上的類似保障。所以後來，當預委會成立，法律小組需要通過及建議專為香港平穩過渡而設的法律，身為小組召集人之一，我嘗試盡最大的努力，確保中央政府擁有英國政府在政權移交前，對香港行使的一切法律上的權力。

當自由主義風起雲湧，令人目眩的時刻，在中央政府內部也出現一股不願意援引更嚴厲英國法律（例如叛國或煽動暴亂）的聲音。

在政治上，應該要維護既有建制，保障既得利益者，直至人們有足夠時間去適應新制度為止。鄧小平不是說過『五十年不變』嗎？但如果容許香港立即開放選舉，非既得利益者就會在一夜之間成為大多數。如果是這樣，改變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是急劇和災難性的，可以預見一個新制度必然要在香港度過一段艱辛歲月後才可重建。如此的改變並非好事，但怎樣才可避免？我可以做些甚麼呢？是否太遲呢？

我並非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我只是諮詢

委員會的委員，只能在基本法草案完稿的最後階段，才介入草案文稿的討論。我深知，這是由於英方多番抹黑，令中方對我的信任不足。

不過從正面看，儘管我們的工作只是徵集香港人對基本法草案的意見，向草委會反映，它卻讓我有機會可以與中國內地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會晤交談。

姬鵬飛頓悟立法會選舉的潛在危機

我記得曾對姬鵬飛說，在香港，不管是諮詢架構或是政府議會，大都傾向採用簡單大多數的議決方式。姬禮貌卻不耐煩地說：『是！是！』我看看李後和魯平，兩人的臉上都木無表情。李後這時說：『大多數人都是講道理的啊！』

我於是恍然大悟。大多數人都不是極端分子，都是講道理的，結果，代表大多數的都會在所有的民主選舉中勝出，因為他們佔多數。這就是英方傾銷立法制度到基本法的立場了。

我正眼看著姬鵬飛，說：『在香港，在關鍵的議題上，在議事堂上或選舉中，51%=100%，49%=0%。

中間派沒有發言權。』

為了強調問題的嚴重性，我指出傳媒已被西方勢力所操控，必定會把所有的議題都看成關鍵的議題，這樣，非既得利益者必然大勝。再者，如果非既得利益者在新制度中不能自肥，他們寧可與港人兩敗俱傷。我再次望著姬鵬飛，說：『51%=100%，49%=0%。』

姬望向魯平，問：『他說得對嗎？』魯看看李後，兩人同時點頭說：『是的，是的！』

昂藏六呎的姬鵬飛緊張得跳起來，說：『這怎麼行？』

我表示，要扭轉這個現象，相信也是有辦法的。如果行「一會兩局」制，把立法會分成兩局，一局為功能組別的民選代表（大多為既得利益者），一局為地區選舉的代表（大多為非既得利益者），這就可以減慢民主的步伐。因為英國議會也行此模式，所以也不應有太大的反對聲音。

姬疑慮暫釋，卻很想知道方案細節讓副手跟進。他用了『我們吃飯時再談！』這句官場老話來邀請我們到著名的釣魚台18號樓晚宴，又對魯平說：『你要聽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

晚宴時，魯平跟我說，我的方案要落實，需要得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通過，程序是先由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屬下的政制小組把方案提交到大會，大會才有機會審閱。而政制小組所提交的方案必須是一群香港人的意見，經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上達政制小組，小組內也必須得到兩名港方委員提議和和議，方案才可以拿到會議桌上討論。中國政府本身不能提出方案，也沒有人可以獨自提出方案，草委會政制小組成員，或是諮委會副主任也不例外。方案必須來自一班香港人，經諮委會提交草委會政制小組。

我很奇怪，一個被指為極權的國家竟設計出如此迂迴曲折的民主路徑。而我卻成為第一個上路的人。

魯平設計出的一步接一步，一個委員會到另一個委員會的提交修訂案的必要程序，聽來異常複雜。不過，我估計中國政府所委任的每一個起草委員，理應贊成一個已取得中方屬意的方案，特別是這方案有利於建港，對保持香港回歸初期的穩定性舉足輕重。

在內憂外患中推「一會兩局」方案

我第一步的工作是把這個想法透過本地的政治團體推介到社會各界。困難重重早已是意料之內，因為傳媒聽命於英方的宣傳機器，把公眾追求全民投票的慾望升溫，兩局制因為會減慢其步伐，怎可能不遇上四面楚歌？

我與邵善波和高繼標一起構思兩局制方案，最後把方案稿本呈交新香港聯盟，並取得聯盟的同意。

當時，公開發表支持兩局制言論的聯盟成員包括：羅德丞、韋基舜、黃宜弘、黃霑、楊孝華、曹宏威、鄒燦基、何鍾泰、烈顯倫。大部分成員都堅守崗位。梁振英雖然沒有公開表態，但為秘書處提供發炮資料指「八十九人」工商諮委在政制立場上搖擺不定，為聯盟新方案開路。方案推出後，惡評如潮早在預計之內，秘書處馬不停蹄安排成員到不同團體舉行簡報會推介方案，聯盟又傾巢而出參加排山倒海的論壇，為方案辯解，其間受盡惡言中傷、白眼奚落，苦不堪言。稍感意外的我們卻得到新界社團聯會李連生和羅叔清

的主動表態支持。

那時，港英政府操控一切宣傳機器，他們不想看到政權移交後，香港的管治工作一帆風順。他們希望看見香港有一個反中的立法會，成為中國身旁的一條芒刺。他們苦心孤詣培植根深葉茂的反中媒體—— 包括港英政府控制的香港電台。不旋踵，小部分兩局制的原來支持者轉軚了，我們一點不覺得突然。

我認為這也無傷大雅，我的任務是在香港找出支持者，在政制小組找到兩名委員，方案就可以提交草委會，要諮詢委員會提交方案只是例行公事，能把方案交到草委會，責任就完了。能不能通過，不是我們著緊的事。

這段期間又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魯平從北京打電話來，說聯盟內部有成員計劃在會內發起倒戈行動，準備倒戈成功，就公開宣佈收回方案，令方案胎死腹中。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我們只好先發制人，在一次特別會議中預先接納一批新成員，讓計劃倒戈的一班人寡不敵眾。會議當日，鄔維庸表現得最激動，郭志權帶來諮委會另一副

秘書長馬力的修訂方案，準備提上會議桌上，可是見情勢如此，也就免提修訂建議了。倒戈失敗，會議後退會的包括：陳永棋、伍小貞、田北俊、郭志權、黃匡源、何鍾泰、鄔維庸、徐是雄、馮國綸、浦炳榮、梁定邦、梁愛詩、沙理士、郭炳光、吳偉基、李耀光。

而在會議上重申支持「一會兩局」制的成員包括：簡福飴、李仲賢、烈顯倫、羅德丞、宋衍禮、曹宏威、韋基舜、黃宜弘、楊羅觀翠、阮北耀、李志華、梁振英、李國章、岑才生、陶學祁、莊紹樑、黃霑、王敏超、王敏剛、楊孝華、張慧燊、蕭景詔*、吳艷梅*、陳文昌*、釋永惺*、林棣權*、黃敏嘉*、林孝信*、黃建強*、鄒燦基*。

（*為新會員）

驚濤駭浪中把方案提到草委大會

「一會兩局」方案在聯盟內部是保住了，但要提到草委會才算功德圓滿。問題是託誰去完成這個任務呢？草委會政制小組委員是魯平選的，可向魯平請教可以找哪位委員提方案，魯平提議找

廖瑤珠，廖是個人主義者，而且一向對港英舊部有嫌隙，所以她拒絕了。譚惠珠雖然是立法局的舊同僚，也曾一起赴英請願，但譚看不通形勢，所以不敢貿然落水，也拒絕了。小組中政治理念相近的只有李福善，本來準備請他當和議人，情勢如此惟有促其披甲上陣，充當提案人。

小組絕大部分人都已表態反對「一會兩局」方案，除了忠厚老實的黃保欣，實在再難找其他人了。黃保欣表示對方案有懷疑，但經不起巧言游說，終於接受我的看法：『寧可提交給小組否定，不應讓方案湮滅無聞。』但黃表明只當和議人，不會投票支持。誰知這已中了圈套。方案提交小組，除了中方的委員外，還得至少有兩名港方委員贊成，方能通過。李福善是提案人，佔一票，黃保欣表示中立，只管和議，準備投棄權票，魯平於是出面干預，表示既是和議人，必須支持，不能投棄權票。方案就在黃保欣那關鍵性一票中，驚濤駭浪下由政制小組呈交大會了。

折衷方案落地還錢，保住分組投票機制

在大會上，除了李福善外，接近全數（共21位）的港方委員反對方案，中國政府不可能施展霸王硬上弓令反對派就範，魯平靦腆地跑到釣魚台告訴我這個壞消息。

我大感震驚。在北京的一致支持下，港方委員可以否決一個想法周全的方案。這怎可能發生？我呷下幾口茅台，把整個事情從重新思量一遍。我猛然醒悟，反對派反對的不是兩局制，反對的是我。

那天下午，我致電魯平，告訴他我有一個解決辦法。我建議他跟委員們說，兩局制的確會令政府癱瘓，他們反對方案是無可厚非的。我也建議他跟委員們說，羅先生為中國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不能全部否定他的想法。如果政府議案只需要簡單多數票通過，羅先生的方案不會令政府癱瘓，也就沒有壞處了。

為了照顧反對派的顏面，我的點票機制可以收窄範圍，修訂為只對議員私人提交的法案有效，「兩局制」的名目也可以捐棄，方案只須保留點票

機制便可。

為了加強說服力，我建議魯平提醒反對派，在過往港英統治下，議員私人提案為數極少，此外，由於方案只是一種立法機關的點票機制，它可以寫成為基本法後面的一個附件，甚或載入任何附件之中。當一切取得共識後，分組點票的機制須修訂為適用於議員私人提案，及議員修訂政府的提案。

當天下午，魯平回到大會上。附件二終於通過了。

據說一位反對派的委員在北京會議廳的側翼伺候消息。當消息傳來，他高興得立即致電香港向張鑑泉報喜，說：『一切順利，TS（羅德丞）完蛋了！』張鑑泉要看完整的文本，當他看過文件後，驚叫說：『你上當了，他贏了！所有富爭議性的法案都會用兩局分組點票的方法處理啊！』這個委員連忙跑去見魯平，說要推翻決定，魯平說已經通過了，不能改變。」

羅德丞的自述如何設巧計推銷「一會兩局」，說得戲味盎然。

平情而論，「一會兩局」假如是中方提出或授

意的方案，在草委會提案時就不會出現這般的困難。更有趣的是，羅德丞當年惹來恩恩怨怨的兩局制方案，今時今日，前英遺老鍾逸傑爵士竟然以「兩院制」名目重彈舊調，而支持「兩院制」的政客中不乏當年反對兩局制最激烈的人士，這是何等的諷刺！

第五章
羅德丞與北京的蜜月期

在基本法草委會通過政制方案的前夕，羅德丞在姬鵬飛的引線下，在八九年十一月獲總理李鵬的會見。由於性質敏感，所以羅先生沒有告訴我和聯盟的其他成員。直至《人民日報》發出羅、李會見的新聞稿，我們才知道羅先生的行蹤。

那時，香港市民仍未能忘記六四，對李鵬的印象相當負面，羅德丞與他握手，普遍引起港人對羅的反感，反對派則視為羅德丞自掘墳墓，領受死亡之吻，自毀長城的愚蠢行為。

羅先生回港後，表現得很高興，跟我們說此行收穫甚豐，和李鵬談得很投契。李鵬談話很和氣，與鏡頭前惡形惡相不可同日而語。羅太又當眾大讚李鵬夫人朱琳平易近人，女兒李小琳（中國電力的副董事長，穿梭京港）很有教養，兩個家庭混得很熟。羅先生說李鵬很能掌握香港事務，很同意他提出的政制方案。

羅德丞以為李鵬對他的破格禮待，可能是肯定

他在政制方案中所作的貢獻；也可能是藉以在香港政制問題上展示中方的態度；甚或是李鵬利用他作為重建個人形象、測試港人反應的敲門磚。但羅先生只看客觀效果，抓緊獲得李鵬接見的聲勢，回港後多次接受傳媒的專訪，大談對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的良好印象，借勢確立在親中陣營中的一哥地位。

說到拉關係，羅太比羅先生更加擅長。妯娌之交令羅太從李鵬夫人朱琳處打聽得李鵬患心血管病剛動過手術的消息（國家領導人的健康狀況是國家機密，不能外洩），羅太馬上叫秘書準備了靈芝等名貴保健藥物，送到北京去。

九二年暑假，羅先生同樣也因為血管栓塞，到美國做心臟搭橋手術，李鵬送來一箱長白山原枝人蔘給羅先生作病後調養之用，物重情深，可見兩家人的深厚交誼。

以國賓之禮待羅德丞

中共起家全靠統戰工作，羅德丞的「一會兩局」方案雖然到最後階段只能保住議員提案分組投票

的機制，而未能完全成功，但在防止民主抗共力量坐大的意義上，已經幫了北京政府一個大忙，這批敢於與港英政府劃清界線，衝鋒陷陣的「馬前卒」，中共自然要加倍籠絡，除了表示惜才之意，亦借以宣揚嘉惠遠人的信息。當時，由《人民日報》發文不點名稱讚羅德丞與新港盟為「有識之士」，客觀上已經認同了羅德丞所推的政制方案。

九〇年二月，國家主席江澤民急不及待邀請羅德丞一行訪京慰勞和安撫羅的驍勇忠誠。來回京港機票由國家支付，留京期間住釣魚台國賓館八號樓，不設留京日數限制，訪京團人數不超過十人，回港日期由我們自訂，換言之，我們想住多久都可以，真是大手筆。

這次，羅先生的一行選定了羅夫人張慧瑜、韋基舜、黃宜弘、簡福飴、阮北耀、張慧燊、王敏超和我，合共九人。飛機於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時抵京，來接機的是港澳辦一司副司長陳佐洱。

訪京團甫下飛機即被接去首都賓館，魯平與李後在賓館迎候，原來姬鵬飛訂了廂房要宴請羅先生。姬老與夫人許寒冰在下午六時許抵達賓館，姬老見到羅德丞如故劍重逢，談笑甚歡，那邊廂

羅太早已拉住許寒冰輕談淺笑，旁若無人。大夥兒依姓名牌入座，上的都是很有特色的菜，從言談中知道姬老很愛吃，年屆八十仍然有很好的酒量，當晚與羅先生豪飲茅台，酒是由釣魚台國賓館帶來的極品，酒味特別馥郁，商標招紙是紫色的，我從未見過紫色招紙的茅台，真是開了眼界。

羅先生自小留學英國，除了本身具備望族的紳士風度外，也深懂英國人餐桌上的談話藝術，在政治舞台以外的時刻，他其實是一個很幽默風趣的人，很懂得搞氣氛，開玩笑，很有個人的魅力。整個筵席上，羅先生只談風月，甚少涉及嚴肅的話題。觥籌交錯的官場文化他掌握得很自如，最難得的是他能夠照顧席上的每一個人，以大方得體的調謔語調介紹訪京團的每位成員，一席酒筵，絕無冷場。

我們飯後被送到釣魚台國賓館八號樓。偌大的一幢樓，全用來招待我們幾個人，別無其他住客，也夠闊綽的了。樓內隨處掛滿國畫，由清代到近代的名家作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問總經理王長政，他說這些全都是真跡。

在晨光中聽羅論盡港澳辦清官

見江澤民那天的早上，我六時左右便起床，天上飄起白雪，散落在院中挺拔的雪松枝椏上，美得令人心醉，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下雪呢！我到大客廳看報，剛坐下便見羅先生由豪華套間緩步而至，他也早起了，夫人和其他盟友仍高臥未起。羅太平時是夜鬼，每天非三點不露（睡到下午三點才露面），要她早起，實在有點難為了她。

羅先生向服務員要了壺咖啡（是用咖啡粉即沖的，羅笑稱為 so-called 咖啡），倒了兩杯，一起對飲。羅先生是個很會找話題的人，他笑嘻嘻地把一張用英文寫的客房單張遞給我看，幾十個字的短文竟然給他畫出十幾個錯誤，他說國賓館招待的是外國元首使節，鬧這種笑話是有辱國體的，國家應該請他回去教英文……

話題轉到他對國內官員的觀感，他感慨地對我說，國內高幹都被香港人醜化為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的蠹蟲。他承認國家大，敗類一定有，但他接觸的都是廉潔奉法的清官，官階愈高，紀律性

愈嚴謹，看江澤民、李鵬、朱鎔基見客，從不蹺起一條腿坐，可見一斑。反之，來自自由社會的北京訪客，太半在會見時因為貪舒服，蹺起腿說話，拍出來的照片輕佻浮躁，有欠莊重。羅先生的觀察力的確入微，果然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說港澳辦公室所遇見的都是清官：姬老（姬鵬飛）身為中共元老，早便可以告老還鄉，安享晚年，但黨性強，年屆八十仍兼任港澳辦主任，為國家統一盡最後一分力。

副主任魯平在羅眼中是個讀書人，政治觸覺敏銳，但書生頭巾氣重，做事不夠斬釘截鐵，他消閒的娛樂是聽古典音樂和上網。

說到李後，羅先生說他的政治觸覺較為遲緩，生活卻樸素得很。港澳辦每年分配西裝一套，他長年累月不論場合都穿著同一套西裝。羅先生曾到他家裡探望長年臥病在床的李夫人，他們的家居怎樣看也不像是副部級官員的住所。李後家裡養了一頭貓，下班後唯一娛樂便是回家餵貓，生活是老老實實的。

陳佐洱出身書香世家，父親是兒童文學家，一門數傑，各領風騷。平時勤修英語，學以致用；

散文寫得很漂亮，筆耕不輟，從不向人開口提物質上的要求，羅先生見他桌上的電話檔次低，常失靈，要送他一台新的，他還要多番請示，才敢接受。

羅先生就是喜歡利用點點滴滴的時間，替我授課。

謁見江澤民前先到中南海理髮

我們從早上六時半談到八時許，其他人都陸續起床梳洗，準備在十一時會見江澤民主席。一行九人提早於十時正到達中共的行政樞紐——中南海，李後和陳佐洱已經在紫光閣的正門迎接，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早在門外等候羅太，兩個女人一見面就手拉手，噓寒問暖，像是多年知交。工作人員先領我們到休息室等候，李小琳則領羅德丞夫婦到中南海高幹理髮室，一嚐國家領導人的理髮服務。中南海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所有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所需物品一應俱全，甚至連外國名牌的時髦貨品都供應充足，住在這個小紫禁城裡，足不出戶，衣食無憂。

時間到了，工作人員先請我們到紫光閣依次排開，江澤民準時從大門步入，先後和我們握手。江澤民眼睛很會看人，我站得最後，年紀最輕，當羅德丞介紹我是新港盟的總幹事，江還未真正握到我的手，碰一碰便連身帶臉急急挪開，以手勢示意我們入座。

江澤民是一個健談的人，他首先關心我們在京的住宿和飲食，問我們在釣魚台是否住得慣，說這幾天正下雪，是好兆頭，北京不常下雪，下的都是瑞雪，對紓緩乾燥的天氣很有幫助。

江總立場鮮明，涉及主權一步不讓

開場白後，江隨即讚揚羅德丞和新香港聯盟在基本法的諮詢工作上做得很好，希望愛國愛港的力量可以不斷凝聚。他說：「時代不同了，中國人受外國欺負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中國政府不能再做李鴻章，向外國人卑躬屈膝，逆來順受，在外交事務上我們可以讓步妥協，但一旦涉及主權，我們一步都不會讓。」

他說：「最近細讀西藏的歷史檔案，更加清楚

藏獨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但中央政府不會容許西藏搞獨立、搞分裂，現在，中央每年花在西藏的資源比許多其他省市都要多，可見中央維護國家主權完整的決心。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總愛耍花樣，把地方弄成一個爛攤子才撤走，我們要讓英國政府知道，中國有決心有能力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

江澤民接見羅德丞，談話的內容是零散的，似乎沒有既定的主題和目的，也沒有諮詢羅先生對某些事情的意見，慰勞和犒賞的意味就更明顯了。會面的大部分時間都由江總發言，我們雖然事前準備了一些問題，由於會見的氣氛比較嚴肅，各人都沒有機會開腔，只有羅德丞說了些同意江總「河水不犯井水」的言論，說香港有人正利用香港作為反共、拒共的基地。

江說：「國家的政治制度和香港不同，所以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也不犯河水。」

他舉例說：「我是黨的總書記，按中國政治制度，黨領導軍，我雖然不是軍人出身，但卻是軍委會的當然主席。外邊的人不了解，指摘中共中央寡頭政治，一個人獨攬大權，這都是因為無知

而起的誤解。一國兩制要成功，河水不能犯井水，井水也不能犯河水……」

會見的時間大約四十五分鐘，江總在隨從的簇擁中離開紫光閣。一次由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犒賞式的會見至此結束。我們徐徐步出大門，大家都表現得很興奮，白雪皚皚的中南海景致特別迷人，盟友都開心得紛紛拿出相機，以中南海的飄雪做背景，留下歷史性的剪影。

黃宜弘拉郭豐民吃羊肉泡膜

晚上，李鵬設宴於釣魚台十號樓，單獨宴請羅氏夫婦。去年初見李鵬，羅德丞不敢張揚自己的家族背景，這次是再會，兩家人都熟絡了，便放膽從香港帶來錦盒裝家族相集巨冊，作為見面手信，順帶不經意的顯露一下家族的顯赫歷史。

其他人知道無緣受邀，心裡都是酸溜溜的，只好兵分兩路，各自尋食。

黃宜弘做嚮導，帶我們去北京飯店對面的胡同吃羊肉泡膜，還約好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郭豐民一起晚膳。

大部分人都是頭一次吃泡膜，有老鼠拉龜不知如何入手之慨。還是黃宜弘有經驗，他教我們把泡膜的膜（如印度烤薄餅）絞碎，絞得越小越好，用店裡機器絞也可以，但不趕時間的話，最好親手掰碎，碎如繩頭，以便蘸肉湯時更加入味。湯底有牛肉和羊肉兩種選擇，湯裡有粉絲，羊肉沒有羶味，配紅的辣椒醬，綠的香菜，黃的甜蒜。黃宜弘還叫我們食時切忌攪拌，講究從一邊「蠶食」，以保持鮮味。我們依法行事，覺得食法雖然很有特色，但味道卻如越南牛肉河，不外如是。食後飲用「高湯」一碗，雖然濃香溢口，但湯後進湯，架床疊屋，洩露了泡膜來自遊牧民族原始飲食習慣的底細。

郭豐民大使服飾樸素，說話隨和，不帶官腔，不時認真地向我們請教一些問題，真想像不到在鏡頭前以涼薄口吻揶揄英國窺視金鐘地王建領事館之惡漢，竟是如此的平易近人。郭豐民是個酒客，鍾情杯中物，雖然泡膜並非佐酒佳餚，郭大使還是喝得酣暢盡情，怪不得他有「醉貓」的外號。郭豐民長期出任中、英聯絡小組中方代表，熟識政情的人士普遍對他的能力評價一般。

吃過泡膜，黃宜弘的興致更高，提議去逛秀水街，夜遊平民夜總會，但是有盟員要乘翌日早上七時的早機返港，所以一行人還是回釣魚台竹戰。雀友之中，以韋基舜章法最好，他是羅府雀局的常客，打牌時喜歡別人圍觀，謂愈多人看牌打得愈好。八少的耐力強，可以通宵達旦而毫無倦意。眾人一邊打牌一邊細味江澤民說話中的玄機。

北京勝景多，羅獨愛天壇

隨羅訪京的盟友都是商界大忙人，所以見過江澤民之後，韋基舜、王敏超、黃宜弘、簡福飴訂了翌日早上的飛機返港。羅先生夫婦、阮北耀、張慧燊（後來的阮太）則繼續留在釣魚台，享受江主席的豐厚犒賞。

港澳辦預備了專車接送我們這幾天的活動，羅先生已經多次來京，該去的景點都到過，他特別喜歡天壇，所以相約大夥兒於午膳後再到天壇走一趟，港澳辦陳佐洱一路陪同，既作嚮導，又沿途與羅先生密斟，聆聽羅對香港政情的分析。港澳辦很重視這類的接待活動，每次都派出不同的

官員陪同訪客參觀，藉以接收風聲，建立關係，所以打後的幾天活動，一時是徐澤，一時是張良棟，一時是張榮順，一時是陳山玲，爭相作伴，盛意拳拳。

遊罷天壇，羅夫人原來已約好姬老來八號樓打麻雀，於是匆匆折返釣魚台賓館。外間盛傳羅先生擅用「麻雀外交」，好在麻雀枱上鬆章，籠絡國內官員。但我服務羅先生的日子淺，尚未見過羅與國內官員竹戰，聽到羅太約好姬老打麻雀，心裡想，這回可大開眼界了。

釣魚台親睹「麻雀外交」

姬老伉儷於四時抵達，在麻雀枱前與羅氏夫婦分隔成兩組對家，我分好四份籌碼後，兩對夫婦就在羅先生的豪華套房的廳中搓起麻雀來。他們搓的是廣東麻雀，有別於羅先生平時慣搓的台灣牌，而開局之先沒有重申牌例，也沒有說好注碼大小，好像一切依照舊規矩而行。羅先生吩咐我在旁侍候，不需避席，必要時要我湊腳。我惟有坐到旁邊的大班書桌整理江澤民會見時的談話內容。

姬老打麻雀的反應頗敏捷，節奏不算太慢，一邊搓一邊談天，大家都拼命做牌，卻心不在牌，到有人胡牌的時候才有一聲歡叫，幾聲挖苦戲謔的笑語。

不旋踵，魯平翩然而至。羅先生示意我來湊腳，他跟姬老打了一聲招呼，便和魯平到偏廳密談。我對搓麻雀雖然有一定的認識，但不知牌例，不明注碼，也難輕舉妄動，反正是替老闆打牌，輸贏都不必上身，於是就放心起來。我發覺大家都在做大牌，不胡小牌，我只好隨俗奉陪。和大人物打牌最不好過，有一回我清一色叫牌了，姬老出銃，我又那敢胡牌呢？惟有啞忍，後來索性亂打，有胡也不叫，求的是大家摸王終局。到晚飯前最後一局，姬老做清一色條子，我做萬子。條子牌多已浮面，看得出姬老還未叫胡，我摸得一張八條，重章先行，即時打出準沒事，但我故意留下，先打萬子，待到姬老有跡象叫胡的時候，我才放出八條，還故意說這張牌是絕的，姬老果然吃這張牌，胡牌時高興地說：「怎樣會是絕的呢！」我湊腳的任務總算不辱使命。

竹戰完畢，大家在點算籌碼，我正好奇他們的

注碼有多大，姬老撥弄籌碼，高興地說：「我贏了！」說完隨即把籌碼散落在麻雀枱上，引我們到一樓餐廳吃晚飯。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搓麻雀純粹是取樂，不涉及金錢和賭博，既然如此，羅德丞麻雀枱上鬆章賄賂的傳聞，就不可能是事實了。在回港的飛機上，我問羅先生有關鬆章的傳言，他感慨地說：「放謠言的人其實愚蠢得很。國家領導人生活豐足，甚麼都不乏，試問他們怎會貪你幾個銅錢！可惜這類幼稚的謠言竟然也有人相信。我和他們打麻雀，絕不鬆章，只會誅章，讓他們知道我的厲害。」

晚餐的菜式是總經理王長政親自安排的，盡顯釣魚台廚師烹調國宴的精湛廚藝。計有八小碟、炖老鴨湯、清炒蝦仁、松鼠魚、香酥鷄、紅燒海蔘，還有姬老最喜歡吃的法式奶油焗蝸牛，和釣魚台名菜清湯狗肉。品嚐美食當然少不了紫色招紙的茅台。

吃過晚飯，魯平先走，羅太拉住姬老繼續竹戰。

羅說：「誰可以有我這種待遇？」

往後幾天，我為羅先生安排與相熟的香港記者茶聚或飯局，私下放料讓他們可以更正面地報道羅先生訪京的消息。當時在王府飯店與《文匯報》的陳建平（當時為《文匯報》駐京記者，後來紮職為前特首董建華的特別助理）、何慰慈（陳的太太），《大公報》陳培笙午膳，兼做專訪；又在北京飯店見《明報》李慧玲。港澳辦徐澤、魯平兒子魯恭、新華社協調部的丘東和一批批在京工作的香港朋友都分別來釣魚台拜訪羅先生，有時羅還留下他們吃飯，私人宴會的賬單是否也歸入犒賞團的報銷項目，不得而知。羅會見完江總之後，人氣驟升，更備受香港報章記者的追訪。

夜闌人靜的時刻，羅先生或會找我喝咖啡，談談當天的人與事，檢討形勢和吩咐我做一些準備工作。我曾經私下問他，這次訪問是否適宜多留？因為我從常理去推斷，雖然訪問團的性質是慰勞領獎，江主席沒有催著我們走，但是在留京日子中卻沒有替我們安排具體參觀訪問的程序，賴著不走會否有損風度，予人口實，得不償失？這是

我的疑問。

羅先生頗不以為然，他對我說：「有些事情是需要姿態上的配合，不少人只會看表面，如果能省去許多功夫，露露姿態有利無害。」羅反問我：「誰可以有我這種待遇？」政治上的務實，有時與務虛難分難解，羅德丞善觀形勢、盡得風流，徹頭徹尾是一個務實的精算師，與我書生式的謙卑想法，大相逕庭，開了我的政治眼界。

夥拍列顯倫轟人權法再建一功

九〇年五月，港英政府抓住香港人在六四事件後的恐共心理，推出人權法案條例，在民主派的推波助瀾下，人人爭相高唱人權法案，甚至中了港英的魔咒，迷信可以用人權法為利劍，抵擋北京政府的干預。

御用大律師列顯倫是新港盟的常委，也是羅德丞的表哥，他不常來新港盟開會，卻經常出現在羅先生的寓所。有一天，羅先生召我到府開會，原來是與列顯倫一起談港英推出的人權法案。列顯倫是一個非常聰明而充滿自信的人，他早前已

草擬文章投英文《南華早報》攻擊人權法案，招來四面楚歌。香港大學法律系法寧斯和政治科學系的克拉克聯名撰文，逐段逐句駁斥列顯倫的觀點。大律師公會主席鄧國楨一向低調，也受到壓力加入剿列行動。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都即時表態支持人權法，形勢嚴峻，似乎翻起了打沉列顯倫的浪潮。

大概列顯倫觸動了港英陣營的神經線，引起了法律界的「律動」，所以羅德丞把他叫來共謀對策。列顯倫語調平和地向羅德丞表述他反對人權法案的觀點，認為是生硬插進香港的舶來品，裡面充滿了難以理解的觀念，認為「可能」會影響香港的法治。

羅德丞教列顯倫看問題

羅先生的反應比列顯倫更加敏銳，他擅長從政治的角度去看港英的一切動作，羅是陰謀理論家，他對列顯倫說：「為甚麼法律界聯手反對你？為甚麼一向低調不願得罪人的行家都出來砌你，就是因為你揪穿了港英政府的陰謀，同業受港英壓

力，不得不表態向你扔石頭，以示效忠。他們也是很可憐的。」

羅德丞繼續說：「這是政治事件，不要跟他們談學術理論，談政治就可以了。北京政府對港英的人權法案很有戒心，就算通過也不會承認，因此可以放心去質疑港英政府的動機不良，讓北京的法律專家去作進一步研究，不要看輕國內的學者，他們對法律的認識絕對不比我們差。」

列顯倫若有所悟，很快便寫就另一篇文章，對四方的冷箭作出還擊。內容真的不再糾纏在法律的觀點上，反而透過很重的政治意味直接質疑港英政府制定人權法案別有用心。他說，過去一百五十年香港透過普通法保護人權非常足夠，從未有業界人士提出質疑，為甚麼偏要在政權交接前夕改變多年行之有效的法制模式；他甚至用德國獨裁領袖希特拉的心態來形容港府。

我把列顯倫反對人權法案的主要意見組織起來，結合羅先生的看法，寫成《人權法案如何牴觸基本法》講稿，讓羅先生到鄉議局舉辦的一個論壇中宣讀，果然引起北京政府的高度關注。羅的觀點確立了，親中團體也紛紛組織起來舉辦人權法

講座，邀請羅德丞周遊說法。羅德丞與列顯倫聯手狙擊港英行動，取得輝煌的成績，北京政府對羅德丞更加另眼相看，在人權法案爭論的洪流中置身度外的其他政客見羅德丞獨領風騷，只有看得酸溜溜的。

識破港英新機場計劃陰謀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羅德丞在基本法政制一役成功建立了親中抗英的闖將形象，已深受北京領導人的欣賞。九〇年中，幸運之神再度眷顧他，讓他有接二連三發揮政治才華、展露身手的大好機會。

人權法案一役之後，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園計劃，宣佈以一千二百億元的建造費興建大嶼山新機場，這個千億元的大白象是英國撤走之前的最後一擊，羅德丞太熟識英廷的詭計了，一口咬定英國人不會發慈悲心，在撤走之前費氣力擦亮這顆東方之珠，擅用陰謀理論而屢試不爽的羅德丞再次為英方的殺著尋找破解招數。

羅先生和我把港英在四月份通過的「臨時機場

管理局法案」詳細審閱了一遍，發現了若干玄機：(1) 局方全權釐定員工薪酬福利，可以不必參照公務員薪級標準；(2) 如無港督授權，審計署無權審查機管局賬目，局方年賬由自聘會計師查核；(3) 並無規定機管局成員在出現利益衝突時，不得參與工程合約的決策；(4) 機管局未及應用的龐大資金可以轉入其它投資市場，擾亂正常的商品市場；(5) 工程合約可以用外幣結算，滲入外匯升跌令建費波動的不穩定因素。

我按照羅先生的吩咐，就這幾方面的不尋常現象起草一系列「評新機場計劃」評論稿（共五篇），並故意誇張其詞，指機管局在政治上是港英在特區中製造的特區，在政府外另設的政府，權力過大必然會發展成為獨立王國，令特區政府無法監管；在財政上，這個千億計劃稍失預算，必然掏空庫房的儲備，甚或給剛成立的特區政府做成財政上的沉重包袱。

這些聳聽的危言正合羅先生的口胃，羅先生看了高興得很，叫我傳真給港澳辦，然後送《文匯報》發表。文章刊出後，引起了很大的反應，江澤民主席開腔批評玫瑰園計劃，「你請客，我付

鈔」的名句，至今仍然膾炙人口。

連發五彈轟新機場，喚起北京注意

羅先生對文字非常敏感，他寫中文不太靈光，但看文字卻反應敏銳，一些無關重要的字眼，在文章訂稿後仍然會屢易其詞，這可能是律師的通病。有些時候，他對文字的敏感程度不啻走火入魔。例如有一次，他要我把「市民」改為「人民」，我告訴他，香港人習慣叫「市民」，比較隨俗隨和，羅先生不耐煩地說：「是寫給北京看的，不寫『人民』他們怎麼明白？」，我只好聽命。類似的文句和字眼上的斟酌，我看來無傷大雅，但他總有不同的見解。

羅德丞很喜歡看我寫的煽情文章，寫得愈誇張他看得愈高興，他說，不這樣寫，北京不會明白事情的嚴重性。

當英方推出新機場計劃（千億元玫瑰園方案）後，擅長陰謀理論，深懂「以志逆意」思辯術的羅德丞即時對方案起了戒心，他一口咬定老狐狸不會為小紅帽送餐，英國人在撤走之前，不會真

心誠意地大發慈悲為香港的未來謀福祉，反之，過往英國撤離殖民地前總會埋下定時炸彈，做盡損人利己的事。羅德丞苦思了兩天，把我叫到家裡，把他的初步想法提出來和我反覆推敲，他叫我盡早草擬一系列的文稿投到報章上，引起公眾的討論和中方的注意。

我花了兩個晚上，以聯盟秘書處的名義一口氣寫成了五篇評新機場計劃的文章，傳真給他看。沒想到交稿後翌日的大清早，他已經站在秘書處的門外等我上班，我因為晝夜趕工，所以晚了起床，回到秘書處只見羅先生已經在門外久候多時，一邊等一邊翻看五篇文章。對於我的遲到，他沒發一語，只報以一笑。我們急忙坐到會議桌前，把五篇文章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淘沙礫石，整理出一個多層次、多角度的評論系列，這就是後來發表在《文匯報》的《玫瑰園計劃的考慮》、《臨時機管局缺乏監察》、《過渡時期港英治權的限制》、《機管局是一池混水》、《新機場計劃五聽》五篇文章。

羅德丞很喜歡我寫的這五篇文章，因為刊出後的確能喚起北京的重視，也著實觸動了港英的神

經線，羅先生曾為此而奔走港京兩地，向領導人和港澳辦解畫，我終於明白投稿到報館比上書到中央的威力更大。

揭港英底牌，羅德丞光芒四射

長達一年多的新機場論戰於是揭開序幕，在往後的幾個月裡，羅先生知道機不可失，於是不停地接受邀請到處演講，或接受報章專訪，狠批新機場計劃的種種問題，逼港府公開四類文件及數據，令港府非常尷尬。

我們又以新港盟的名義於十二月一日假沙田新城市廣場音樂噴泉舉辦了一次論壇，邀請布政司出席討論。按以往情況，港府根本不會參加親中團體的論壇，但當前形勢不妙，政府急於救亡，最後派出副工務司許仕仁披甲上陣，代表布政司出席舌戰群雄。論壇由韋基舜主持（韋當時仍任「城市論壇」主持），頗有城市論壇的意味，新港盟請來香港大學教授黃良會、人大代表薛鳳旋和簡福飴，迎戰布政司代表許仕仁。三位反對新機場計劃的講者理據充足、義正詞嚴，都是平情之

論，惟獨黃良會老氣橫秋，聲聲「許大人」(諷刺政府官僚作風），句句「教導無方」(諷刺許仕仁為港大不肖生），但都被許仕仁伶俐的口才連消帶打地一一化解。當時大家都不大認識許仕仁，但對這位副司長卻印象深刻，不敢輕視。

羅先生以新機場關乎民生，逼港英公開資料，說得語酣氣足，在親中陣營裡贏得不少喝采聲。羅得勢不饒人，進一步提出港英在過渡期的管治權力受中英聯合聲明的限制，不能在未取得中方共識之前獨斷獨行。新機場計劃若得不到中方祝福，它不可能向國際財團融資，表面上籲請港英盡快與北京磋商，實際上是警告英方不可偏離合作的軌道，胡作妄為。

羅德丞的「呼籲」果然奏效，英方經過一輪冷戰之後，終於按捺不住，派出外相韓達德訪華表示願意重開談判。羅德丞對英方的警告，最終發揮效用。中、英就新機場談判最終達成協議，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這份文件的重要性被視為中、英第二次聯合聲明，而羅德丞就新機場管理局的建議都一一納入備忘錄之內。

可以說，新機場一役，羅德丞光芒四射，表現

尤勝「一會兩局」，而早前交惡之工商界諮委眼見羅德丞屢立功勳，不禁暗生妒嫉，嫌隙更深。

派我上京學習，志在打好關係

羅先生很懂得體恤和行賞之道，看到我自從出任新港盟秘書處工作以來，為他和聯盟的事務日夜奔跑，鞠躬盡瘁，幾場硬仗都主僕一心，夷險化危，創造佳績，對我的工作表現和熱誠漸予肯定。羅太更當著羅先生面稱讚我的工作做得出色，還把羅母放著不用的一部日產舊車借我（其實是送我）代步，作為犒賞。

因為任職新港盟一年多，幾乎沒請過一天的年假（工作繁忙得根本不可能請假），羅先生也覺得「砌」港英新機場計劃，我們已經燃起火頭，以後就是北京政府的事，我可以請假休息一下。於是九〇年底有一次我陪同羅先生去北京，一晚與陳佐洱吃飯時，當著我的面問陳佐洱可否安排我攜同夫人訪問港澳辦，交流學習，羅先生對我的器重和照顧令我喜出望外。陳佐洱即時表示沒問題，叫我把日程和要求傳真給他，好作安排。

我回港後連忙告訴太太，畢竟是第一次以個人身分受邀訪問北京，大家的心情都非常興奮。太太是中學老師，最快只有聖誕及元旦假期可以訪京，所以我徵得羅先生同意後，給陳佐洱去了一個傳真，表示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月一日，我和夫人來京活動，一月二日至一月八日，我繼續個人訪問活動。留京期間除了希望訪問港澳辦之外，還要求到北京大學聽課，夫婦一嘗做北大學生的滋味。

在京訪問活動由港澳辦接待，機票和酒店則是自費的（當然可以向新港盟報銷），我知道羅太是個精打細算的人，我在京的支出，她一定會留意。我決定不住五星級的王府飯店，請段燕芳處長替我訂三星級的西苑賓館，還告訴她我在京的支銷能省的都省，不要浪費。果然，回港後我沒有把省錢的安排告訴羅太，羅太早已經從段燕芳的口中知悉一切，還對羅先生說很欣賞我的踏實作風。羅先生有時真的很單純，直接就讚我說：「你的 Loyalty 是 Perfect 的。」

陳佐洱譚家菜宴請愚夫婦

留京的頭六天，港澳辦每日有專車接送，安排我們夫婦參觀了北京圖書館、圓明園、長城、十三陵、雍和宮、白雲觀、中國歷史博物館，還到北大聽基本法草委、法律專家蕭蔚雲教授的課，比參加旅行團，行程豐富得多。三十一日中午，陳佐洱本設宴東來順，後來改在北京飯店宴請我們夫婦，品嚐譚家菜。陳佐洱既熱情又細心，還預備一張賀年咭送給我們夫婦，物輕情濃，確有讀書人氣質。我大學是唸文學的，也熱愛音樂，和陳佐洱談起兒童文學的重要性（陳伯父是兒童文學家陳伯吹）和他弟弟陳佐煌（中國第一個指揮學博士）的指揮魅力，立刻就有了政治之外的共同語言。陳佐洱告訴我，馬力、邵善波來京，也是這樣的安排，我不禁受寵若驚。

我太太回港後，我單獨留京活動，那幾天港澳辦為我安排了到北大聽陳寶音的中國憲法課和劉開平的法理課，到人民大學聽江偉的破產法，一月五日參觀訪問港澳辦一天，上午與一司會談，下午與二司會談。一月七日到港澳辦研究所座談。

還利用間隙帶我參觀工藝美術館、琉璃廠和天壇，日程豐富得不得了。陳佐洱知道我心臟出毛病，還特意介紹我到阜外醫院做心臟檢查，讓我見識到北京心臟專科醫院的服務。幾天裡分別陪同我活動的有王小龍、段燕芳、黃金中、鄭宇華和金萍，都是年紀輕輕的小伙子，應該是港澳辦明日的接班人。

我相信羅先生要我來京學習，不僅借意讓我休假，更希望我和港澳辦的官員打好關係，方便日後的工作，羅先生的確想得很周到。

姬老南下例必找羅德丞一敍

九〇年底，魯平正式接替姬鵬飛任港澳辦公室主任。

同年十二月，姬老南下主持澳門基本法大會閉幕禮，約羅先生夫婦於會後同遊肇慶七星岩，被新聞記者攝下同坐一輛麵包車的照片。魯平行事一向謹慎，又是新紮初升，所以處事的敏感度特別高，他擔心與羅德丞同遊肇慶的新聞一旦被炒作，會招惹閒言閒語，所以故意繞小道離開酒店

與旅遊車會合，但魯平的行蹤愈神秘，神通廣大的香港記者就愈有興趣追訪，結果羅德丞陪同兩任港澳辦主任遊山玩水的新聞和相片被廣泛渲染，欲蓋彌彰，固非魯平始料可及。

羅先生與姬、魯遊罷肇慶歸來，心情大好，告訴我姬老將以中顧委身分於九一年三月來港訪問，並會見香港各界人士和政治團體，聽取意見。羅認為機會難得，準備安排一次家宴，借用同居惠苑李兆基的頂樓私人宴會廳，招待姬老一行，並廣發英雄帖，邀請多國駐港領事、新記有關官員、羅家友好和商界合作伙伴出席，共話春禧。

約政府高官是苦差，因為他們永遠定不出自己的行程，尤其是私人宴會，隨時要為遷就公事而一改再改，但姬老這次很快就鐵定撥出三月十日（星期日）晚上「黃金檔期」給羅先生，可見兩人的關係如何密切。

有了明確的日子，秘書處就好辦事了，因為是家宴，由羅先生先以口頭邀請，再發請柬，工作就能更加省時便捷，受邀者如不是早有活動安排都一口答應出席，反而新華社高層恰遇本地社團春茗高峰期，分身不暇，但姬老的政治飯又不能

缺席，最後除了毛鈞年長年患柏金遜症不便酬酢外，七位副社長都出席了羅德丞的家宴，隨從而來的還有多個部的部長、副部長，包括對羅德丞頗有意見的副秘書長黃智超。

邀姬老家宴，新記傾巢而出

當天晚上筵開七席，不知是誰的主意找來老牌筵席專家「雙喜樓」上門「到會」，當碗碟勺筷、桌板餐椅搬進惠苑頂樓的宴會廳後，我們才發覺殘舊不堪，桌板凹凸不平，餐椅鏽蝕處處，碗碟都是印有萬壽無疆彩繪的膠製劣品，而且沕損累累，舊得難登大雅之堂。我們馬上報告羅先生，羅先生光火了，「雙喜樓」老闆也知情識趣，馬上打電話叫公司送來一批新的碗碟，但倉猝之間，只能勉強張羅二、三十套較新的食具，撐住兩三桌主要嘉賓席，不忍目睹的是餘席仍然要忍受殘舊的碗筷。

在上流社會中，家宴要有家廚方顯得出主人家的氣派，就算到會包餐，還是選用酒店餐飲部最有信心，七席酒花不了多少錢。羅德丞的家宴險

些弄出寒酸的笑話，實在是毫無必要的。

小疵不掩大純，羅先生的家宴成功地展示了他與兩任港澳辦主任的交情，他還叫我替他起草了一篇歡迎詞：

「姬主任、姬夫人、各位來賓、各位前輩、各位朋友：今天我很高興能夠有一個這麼難得的機會，跟在座各位在新春期間歡聚一堂。最為難得的是姬鵬飛主任和姬夫人能夠在百忙之中抽空光臨，實在是萬分的榮幸。姬主任是香港人的老朋友，多年以來在香港的前途問題和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上費盡心力，比我們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更關心香港的事。今天，我們實在很高興可以把握這個機會，向姬主任表示衷心的謝意——感謝他多年來為香港所作出的歷史性的重要貢獻。今天晚上，蒞臨歡宴姬主任的在座諸君中，有來自北京的貴賓，有香港新華社的朋友，還有我家族幾代的世交。我們雖然來自東西南北、五湖四海，但是我們卻有一個共通的想法，就是我們都希望香港的前景會更加繁榮穩定，同時也願意為香港的未來作好努力的準備。故此，七十多位朋友可以歡聚一堂，開懷暢飲，無所不談。在這個熱鬧

的時刻，我與內子衷心的祝福姬鵬飛主任身體健康，姬夫人青春常駐。也祝福在座各位朋友如意吉祥，歲歲平安！乾杯！」

落區助選，羅德丞一試直選水溫

新港盟連番報捷，羅德丞愈來愈受北京重視，聯盟成員都不期然摩拳擦掌，準備大展掌腳。

會內最有興趣參加九一年第一次地區直選的是王敏超，他是市政局議員，年青有為，也是奧運游泳健將，有全港知名度，是理想的人選，羅德丞對王敏超參選很表支持。可是，因為港府採用雙議席雙票制，王敏超之外還要多派一人與王敏超組成選舉拍檔，方可代表新港盟出戰。我們把會員名單翻來覆去，也找不到第二位合適的人選，羅太的孖生胞妹張慧燊突然福至心靈，表態說：「讓我來試試吧，誰說有選舉經驗才行！」於是王張配參加九一直選，選區定香港島南區。羅先生派我做他們的選舉經理人，專責協助他們的選舉工程。

聯盟開了幾次選舉會議，王敏超和張慧燊分別

找來助選人員，都是「講話天下無敵，做事有心無力」的食飯神仙，飽餐醉飲，一哄而散，留下來的還是一大堆懸而未決的問題。中西區女童軍會主席游育德是個厚道長者，他介紹了一位做實際工作的何兆森博士給張慧燊助選。何博士是位中學教師，課餘熱衷社區事務，在南區薄有名聲，何夫人也是南區婦女會中堅分子，難得夫婦同心，都對助選有興趣。在有了一個對南區熟識的人士加盟之後，選舉工程才得以按序開展。

我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在香港仔添置了一個新港盟南區辦事處，作為王敏超、張慧燊的選舉總部，接著馬不停蹄地拜訪南區的「地頭蟲」（各分區區議員和社團領袖），打好關係，最重要的還是結識各屋村的互助委員會主席，爭取支持，方便日後進行家訪工作。工程之繁複和煩瑣，罄竹難書，足以寫成一本現代版的《警世通言》。

助選的過程中，除了令我充分體會到利益主導的選票關係外，我還發現了一個現象。倚賴山頭領袖包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以為取得社團領導支持等如勝券在握也是痴人說夢。為甚麼保守政團和親中政黨在地區直選中多嘗敗績，就是迷信

思想作祟，過分相信地區團體、商會、體育會、婦女會、福利會、合作社的力量，以致賠了夫人又折兵。

我初次助選，經驗不足，羅德丞作為聯盟魁首，又被親中團體錯誤牽引，迷失方向。「王張配」最終落敗，時也命也，非戰之罪。在競選過程中，羅德丞也不惜粉墨登場，穿起宣傳運動裝，怪模怪樣地落區派傳單拉票，一嘗直選水溫，王敏超說這是他參選特首的預習和試練。投票當日，下起大雨，羅夫婦更巡迴各票站，冒著風雨為王、張拉票。

魯平盡數彭定康背信棄諾，欺人太甚

九一年底，中、英關係降至新低點，彭定康政改方案出台，加上新機場談判曠日持久，港澳辦主任魯平經常穿梭北京、香港、倫敦三地。

九二年一月，魯主任來港出席聯絡小組會議，新港盟把握機會於一月九日晚上宴請魯平，席上魯平與新港盟成員的對話充分反映了他對彭定康政制方案的憤慨。以下是席上部分對話的內容：

韋基舜：預委會和臨時立法會，這兩個組織是基本法沒有的。成員應該由中方在九五年委任的，非由香港人自己組成，現時組成則違反基本法。預委會是影子籌委會，它必然影響正式的籌委會，而影響必定是壞的。

魯　平：英方如此下去，後果如何？香港人應該提意見，讓我們去考慮。

韋基舜：立法局要發起靜坐，港同盟要籌備上街支持彭定康政制。

黃宜弘：這個可能性是有的。六四上街說是一百萬，實際只有二十萬。

魯　平：發動不是一個人，香港非大亂不可，香港危險了。

羅德丞：彭的方案會拖慢香港的經濟，印度人應該最清楚。

魯　平：中方不能坐視不管。

王敏超：處理要小心，否則愈搞愈亂，有甚麼方法可以令香港的街頭行動受到控制，不會擴大。

韋基舜：司徒華用現金買樓，單位近新華社，目的在支援示威人士。

魯　平：香港愈少變動愈好，現在仍希望可以做到。不跟基本法銜接就做不到，和公務員談也希望他們能留下，但不是我們單方面想做便做得成，要英方逐步跟基本法銜接。

彭定康反對銜接，反對平穩過渡，對公務員最不利。現在問題是要不要銜接。彭定康施政報告的基調是不銜接的，怎能拿作談判的基礎？英方必先承認過往雙方的協議，否則再簽協議又可以被推翻，國際外交史上是個大笑話、大騙局。

基本法是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寫成的，現在寫好了，公佈了，又不承認，真是欺人太甚。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有條件接受直通車，不符合的要下車。車不能直通，因為英方首先把車軌拆了。唯一辦法保持香港穩定，是另起爐灶。

基本法公佈後，英外交部還發表聲明表示稱讚，是香港前途的里程碑，體現了聯合聲明。直選的步伐和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在錢其琛給英方的信件中寫得很清楚，是

雙方達成諒解的，但彭定康卻可以一手推翻。中國人遇到外侮必定同仇敵愾，全國一心。

彭定康在錯誤的時間和地方打錯了算盤，我們奉陪的方式是後發制人，你走一步，我跟一步。李鵬總理不是說嗎，魯平、錢其琛的話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

新機場是個大包袱，太浪費了。英方不跟我們磋商就上馬的工程，就是破壞諒解備忘錄，我們不會支持。將來香港一定會建新機場，但不一定建在大嶼山，故現在的工程可能是浪費。當時會上提出預留二百五十億，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們也不能單靠這二百五十億，希望土地基金能積存一千億。現在要警告英方和立法局議員，誰通過撥款，誰要向市民負責。

羅德丞：政改是英國的提議，非彭定康個人的提議。

魯　平：也有彭定康的個人因素，拿香港作賭注，表現個人的力量。我們最壞的打算是作亂的準備去爭取不亂。

羅德丞：早亂比遲亂好，早亂則錢拿不走。

魯　平：我跟彭定康說，香港的問題希望不要滲入個人因素，我希望雙方都能為香港做點好事，彭定康說：對不起，我做不到。

新機場問題立功再會李鵬

新機場爭論中，羅德丞再次用盡火力攻港英要害，逼令英國政府要與北京重開中斷多時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並公開促請港英公開四類工程資料；說明「或有負債」的含義；更不客氣地指出英國在過渡期內管理香港的權力受中、英聯合聲明的約束；指出中方有權不承認新機場工程合約，令融資無法進行，把英方嚇得乖乖就範。

經過九個月馬拉松談判，中、英終於在九一年九月達成協議，而羅德丞與新港盟的建議大部分都納入備忘錄中，羅先生的努力又一次取得漂亮的成績。

九二年七月，羅德丞獲得國務院的支持，創辦英文周刊《WINDOW》(中文譯名：《香港之窗》)，進一步展示他如何受李鵬總理的器重，所欠的是

江澤民的門一直闖不開。

羅德丞於九二年十一月接受邀請，上京再度會見李鵬總理。訪京仍以羅德丞一行的名義邀請，獲羅邀請同行的都是自己人，部分是第二批加入的新會員，名單是：韋基舜、黃宜弘、梁鳳儀、羅文鈺、李志華、伍秉堅、曹宏威、王敏超、林棣權、鄧安東、張慧燊等連同配偶一行十七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訪京團於下午四時三十分與李鵬總理在中南海會晤，羅與李已經多次見面了，兩人表現得很熟絡。會面過程中，魯平一直陪同。甫一坐下，羅德丞竟然比李鵬先講話，而互問互答，與見江澤民時只聽長官訓話不同。羅首先開口恭賀李鵬當選新一屆總理：

羅：恭喜總理當選。

李：十四大開得不錯，保護了群眾的積極性，會上也有建設性的措施。香港的情況怎樣，很多人說要加快選舉的速度，但必須是有效益的，否則我們不會贊成。

羅：這是受彭定康的影響。

李：香港股市大跌，是泡沫經濟的現象，當然也與彭定康的言論有關。

羅：香港將來的選舉問題不知如何安排，怎樣分工合作，怎樣作出協調，消除內部矛盾？

李：下次選舉是九五年，對嗎？中方已向彭定康表明態度，魯平、錢其琛也講得很清楚。朱鎔基訪英是年初安排的，重申中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是堅定的，必須根據聯合聲明和兩國外交函件。若我們讓步則對不起香港人，對不起民族。《明報》有一篇評論不是說嗎，殖民地哪會有民主，有民主就不會是殖民地。香港的民主發展要大家想辦法，爭取大多數人的團結。

羅：完全同意。

李：在聯絡小組會議上，我們問英方是否不要銜接？英國歷來如此，自誇日不落帝國，香港是一塊肥肉，所以一定會搞小動作，如新機場計劃，英國得大部分利益，英資企業包攬工程。將來香港很難搞，天天示威、遊行。政治穩定是發展的前提。現在，英國在玩火，要中國軟化，我們是不會軟化的。

羅：英國有美國作後台，他們的看法是：第一，拖慢中國經濟發展；第二是搞亂香港，因為

中國的發展比其它國家都要快。

李：克林頓雖然競選時的講話不利中國，但上台後還要看實際。在中美紡織品貿易上，美國是順差，中國是逆差，美國想透過MFN搞亂香港，若透過民主政制（彭定康方案），也許較容易得逞。彭定康現在用香港人的錢去做宣傳，如何可以對付彭定康的國際牌？

羅：應該指出彭定康的方案並非民主，是違反兩國協定，不守外交信諾的行為，反宣傳要在這個角度下手。

李：我們不能就他的方案提出反建議，一提就中圈套。

羅：跟不守信諾的人談是沒意思的。《WINDOW》現在針對的就是英、美政商界高層，反宣傳要對這班人做才有意義。本週我們銷美的數字已經突破一萬冊，也銷日本、台灣、新加坡、泰國等亞洲國家，與《紫荊》一萬二千本發行量很接近。美國對中國很有興趣，國內能給我們提供素材，由我們的記者以西方人接受的語調再寫，效果就顯著。外國記者常說我的觀點和他們的很不相同。

李：相同就沒人看了。

之後橫七豎八的就彭定康的政改、新機場的工程、香港民主派的動向拉雜而談。魯平在新機場問題上指出：「香港不建赤鱲角，對太古洋行的經濟影響最大，他說深圳機場上月已通航，年底載客量達1500萬人次。黃田只用了九億人民幣興建，第二期擴建可以讓香港人參與投資。以前工程建設是國家的，現在都容許中外合營，讓人知道投資中國是有利的，十四大會議之後訊息更加清楚。」

整個晤談中，李鵬沒有正面回應羅先生最關心的問題——香港的選舉怎樣分工合作？愛國陣營中如何協調候選人參選，以避免力量內耗。這是一個相當露骨的問題，即等如問李鵬可否為新港盟劃出選區，如何協調親中陣營為新港盟安排議席，你叫思辯敏銳的總理先生怎樣回答。

當天晚上，李鵬設家宴招待羅氏伉儷及千金羅孔君，羅先生特別帶了家族圖錄送給李鵬，據羅太宴罷回來說，當晚與李家上下談笑甚歡，李鵬的女兒、女婿、孫女都出席，賓主共歡。能夠進入李鵬總理在中南海的府邸吃家常便飯的香港人，

相信只有羅德丞一人。

組織班底，重建形象結善緣

北京的路已經打通，回港後，羅德丞更加積極，他先召集核心班底開了一次閉門會議，聽聽兄弟盡述心中情，表明心跡，部署他日如何組班。與會者有列顯倫、簡福飴、韋基舜、黃宜弘、王敏超、梁振英、阮北耀、曹宏威。會後羅德丞向我透露，班底還是很弱，黃宜弘有意當財政司，王敏超傾向做文化康體事務，文康處或市政局都有興趣，列顯倫則對律政和終審庭首席稍有興趣，其餘都心無所屬。

我跟羅先生說，組班靠一次會議難有結果，不如定期開核心小組會議，磨出一個班底來，羅先生聽後也覺得有道理，於是定每星期五晚上為小組例會。可惜，由於個個都是大忙人，定好的時間一拖再拖，早到的盟友等得不耐煩而先走，會議由羅先生主導，既無議程，又無方向，多半聽羅先生分析形勢和縷述在京遭遇，勉強開過兩次會之後，就改為雙週會、月會，最後核心小組會

議無疾而終。這是可預期的結果。

羅德丞上京會見江、李歸來之後，因為鋒芒太露，引起很多人的妒忌和排斥。羅德丞也自覺要修補形象，爭取多數人的接受，減少批評和敵意，重建和諧的關係，為長遠的合作鋪設軌道。

姬鵬飛和魯平也苦口婆心勸他收斂鋒芒，在香港廣結善緣，擴大人際關係，部署日後更大的發展。支持羅德丞辦《香港之窗》其用意也是讓他暫時撤離政治的是非圈，藉清談時政以韜光養晦，李鵬、姬老、魯平諸人其實是想保護羅德丞，不欲他未到九七已經被毆得遍體鱗傷，真正算得上用心良苦。

問題是羅先生是否看透江澤民傾向平穩過渡的原則，能否善用機遇，以五年的時間改變形象，成為中、英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這要看羅德丞的造化和能耐了。

與廖瑤珠一笑泯恩仇

在基本法政制爭論期間，因為政見不同，個人主義令黨派之間壁壘分明，羅先生的確和不少基

本法諮委會的朋友傷了和氣，其中公開表示對羅德丞有意見的首推廖瑤珠。

廖瑤珠由一九九零年開始，每年六月底均舉辦「邁向一國兩制研討會」，過其武林盟主癮。這類研討會羅德丞一向不會參加，免傷和氣，枉作嫁衣，而且該次研討會舉行的日期，剛碰上羅先生赴美做心臟搭橋手術，故未暇出席。廖瑤珠不問原由，逢人責難羅德丞，說羅不支持她搞的活動。羅德丞也真沉得住氣，叫我寫一份報告，詳列他臥病期間新港盟如何安排會員出任研討會講者，如何購票支持，如何透過新華社表示本會職員可以協助籌備工作，送交廖瑤珠。羅先生從來不做息事寧人的事，這次算是例外了。

翌年，廖瑤珠的研討會如常舉行，羅德丞照例不出席，但在會前特意到場與廖瑤珠握手道賀，預祝成功。我還事前約好《信報》記者文灼非到場把兩人親切握手的照片拍下，翌日《信報》「政經短評」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來報道廖、羅之會。

羅德丞在修補人際關係上也真的下過決心，做到厭惡性的工作。

羅德丞最怕出席酒會

羅德丞的公關工作有一部分要在酒會完成。別以為羅德丞出身名門，飽受英式教育薰陶，從政二十年，見慣大場面，性格又幽默健談，對於酒會酬酢，應該駕輕就熟，樂此不疲，想不到羅德丞最怕參加酒會。

港英政府的官式酒會他已一概謝絕，但外國領事的酒會或宴聚，他尚選擇性地參加。友好社團和商會的週年會慶，新華社和各區各界的國慶酒會，他一定會出席，但很不願意去。

其實我很明白羅先生的心情，這類酒會都是敵友參半、龍蛇混雜之所，大家點頭握手，虛掛笑容，言不及義，真的費時失事；尤其是有頭有面的大人物，焦點所聚，更加不易在酒會的場合中釋然自處。主動向人打招呼，惟恐別人不回應，損威儀；不主動請纓，又被視為眼高氣傲，目中無人，招閒言，捱咒語。兩邊不討好，左右做人難。

羅先生每次酒會都要我作伴，並不是我長相軒昂，襯得起他；也不是想擴大我的人際關係，方

便工作；而是找我當他的扶手杖，撐著他度過尷尬的每一秒。

每次酒會，羅先生都不會太早到場，希望縮短時間，完成出席亮相的任務就走。由步入會場開始，羅先生已經吩咐我時刻留在他身邊，不要走開。當友好趨前和羅先生寒暄，我便退到後排，讓出位置；當一批散去，我又會站回羅先生的身邊，聽他說某個在場人士的佻皮笑話，我也故意擺出燦爛的笑容，和他一起扮成「無入而不自得」的君子。

廣結善緣，另起爐灶尋班底

廣結善緣，團結友好是羅德丞的當前急務，但他所理解的友好對象也許和北京的大相逕庭。

以我的理解，北京希望羅德丞做的是團結香港政商陣營中的大多數，方便將來安排羅上位時能夠順理成章，不會遇到太大的反對聲音，完成江總「穩定壓倒一切」的設想。但是羅德丞卻認定政商界中的浮面人物大部分不可信、不可靠。政界方面，鍾士元、陳方安生的黨羽充斥，不會接

受這個港英叛將伸出的友誼之手；商界巨富以利益掛帥，難以指望他們可以抵抗港英的利誘和壓力，堅持愛國愛港的立場。道不同不相為謀，何況嫌隙既深，要化解恩怨真是談何容易，羅德丞決定放棄團結北京心目中所指的「大多數」。

羅德丞明白有需要做團結工作，不僅重新為自己建立支持度，也好向北京交代，已經按指示辦事。羅德丞選擇另起爐灶，趁著王敏超、張慧燊九一直選中所建立的人際網絡，展開他的「統戰」工程。

羅太頭腦動得很快，她馬上想到利用與北京的關係作招徠，組織國內旅行團，吸引友好人士參加，當然羅氏夫婦每次均隨團出發，遍遊名勝，指點江山。

由九二年二月到九三年六月，短短十四個月內共組織了五次旅行團，目的地分別是北京、長江三峽、西安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民俗村。每次成團都接近四十人，多半是南區知名度不高的友好，也有羅先生和新港盟輾轉介紹的朋友。

遊三峽李兆基出錢出面拉人捧場

最有分量的一團當數九二年復活節的長江三峽遊，因為羅德丞邀得鄭華夫婦（新華社副社長）、李後夫婦（港澳辦副主任）、李啟新（前新華社副社長）、孔浩洲（新華社協調部副部長）、馮紀林（新華社協調部）、王林（張浚生副社長秘書）和恒基主席李兆基聯袂同行，湖北省領導全程陪同，號召力當然強勁，報名參加者為數多達一百一十四人，坐滿半隻飛機，包起了整艘「神女號」。每到一地，上岸時早有地方政府張起歡迎橫額，工作人員前呼後擁，四輛簇新的日本旅遊車如貫排列，對我們這個團算是重視了，當然，和邵逸夫的考察團相比，待遇還是有很大的距離。

報名參加者也頗有來頭，包括：太古董事姚剛一家三口、城大楊羅觀翠博士、張發奎將軍的子嗣張卓立、威立兄弟、兆安地產的李兆麟夫婦、榮興證券的胡壽榮夫婦、安永會計師樓胡展雲夫婦、李兆基胞妹李煥瓊夫婦、李志華律師夫婦、馬主明嘉福夫婦、梁廷鏘律師夫婦、鉅業董事黃鏗夫婦、永新企業曹其鏞夫婦、嘉利證券何廷錫

一家五口、郭得勝胞弟郭得標、建築師李景勳夫婦、正德企業蔡德河夫婦等等，其中大部分都是李兆基的朋友，這個團如果沒有四叔的號召，當不會有如此聲勢。四叔甚至連女傭和按摩師都攜來全程侍候，真有富豪氣派。

雖然部分行程和宴請由湖北省人民政府贊助，旅行團的團費仍遠比一般收費高，精打細算的羅太又趁機為新港盟籌得可觀的經費。

後來的西安北京團和上海杭州團雖然仍由原班好友做班底，也出現一些新面孔，參加者有中英聯絡小組胡厚誠、恒生銀行董事何添夫婦、許冠文夫婦、匯業集團史習平夫婦、趙聿修公子趙公輔、廣安銀行董事張作鑫、通用電子董事經理方勳、合成實業余偉明、萬順昌董事姚祖輝、太平洋亞洲銀行余家寶、羅德丞胞姊羅佩堅、風水師傅王中岳和好友黃霑。陳方安生竟不反對兒子陳鴻偉、胞妹方寧生偕女陸介琳來捧場，的確令人有點意外。

遊山玩水結善緣初見成效，可惜《香港之窗》貸款一到，羅德丞便天天忙於雜誌社的事，把「團結大多數」的工作又放下了。

第六章

辦WINDOW周刊，政治行情急滑

由「一會兩局」政制爭論開始，經歷人權法案、玫瑰園陰謀、彭定康政改等連番惡戰，羅德丞已經被視為中方心目中的一員捍將，甚至晉身為中方著意培育的治港人才。

一九九二年一月九日，新港盟假惠苑頂樓宴請魯平主任和港澳辦隨行官員，徐澤、陳佐洱、張良棟、張榮順都應邀出席，還邀請了新華社副社長鄭華、張浚生、秦文俊和統戰部部長鄒哲開等人。這還是新港盟在魯平晉升港澳辦主任後的首次宴請。

魯平回京後，很快就傳來消息，香港中國銀行已獲中央授權貸款八百萬美元予羅德丞辦《WINDOW》英文周刊。羅德丞接到消息後，高興得不得了，連忙拉住宋衍禮和韋基舜，宋衍禮是羅先生的業務伙伴，也是橋牌的親密戰友，曾任《英文虎報》編輯多年，是資深的傳媒人；韋基舜在家族辦的《天天日報》當過社長，對經營報業很有心得。此

外，羅先生也找邵善波諮詢意見，因為邵曾編過時事雜誌，對媒體運作有認識。

羅先生也聘用過洪清田協助策劃，後來因洪清田找人吃飯的時間多，應酬費用大，甚麼都沒有做，羅先生最後付了一筆顧問費打發了他。

北京又來了一位馮錫良先生，據說是前《中國日報》英文版總編輯，協助籌劃組班工作，羅先生還為他安排了一個位於灣仔的套房作為宿舍。

羅先生家住麥當勞道，屬意於港島選擇社址，香港仔、鰂魚涌和柴灣都有工業大廈，最後他選擇了柴灣利眾街20號柴灣工業中心大廈22樓一個八千尺的單位作為社址。

羅先生的生活模式本是晝伏夜出，辦《香港之窗》之後竟然大白天就起床，在雜誌社換了一件滿身是袋的布背心（攝影記者常穿的那款背心），整天穿上，開始每天的例行工作——在辦公室與編輯開會和撰寫每週一篇的《香港日記》。他說，這樣穿才像個傳媒人。羅德丞的思維方式有時真的令人無從理解，無法捉摸。

很多時候羅先生還留在雜誌社吃司機阿浩送來的午膳（例必是三文魚刺身、日本壽司和家傭煮

的湯）。膳後仍留在辦公室裡，很少出來和我們閒談。

不惜工本禮聘資深編輯加盟

羅先生不懂得怎樣辦雜誌，為確保運作順利，只有重金禮聘資深編採人員加盟，外籍編採一般叫價比華人高，知道羅先生辦的雜誌，更加獅子大開口。總編輯找到從政府新聞處退休出來的沈邁士，月薪接近十萬，另羅先生讓出西貢匡湖居的臨海大屋作為沈的宿舍。寸功未立，先承恩寵，真的羨煞（怨煞）旁人。

中國評論編輯是前《南華早報》資深政治評論員陳達維，也是已屆退休之年；外籍編輯有好幾位，月薪都在四、五萬之間；首席攝影記者是久休復出的名記者陳橋，月薪絕對不低。奇怪的是電腦技術員一週上班三幾天，月薪也有五萬。相比於放洋歸來的幾個優秀的內地撰稿員和羅先生在雜誌社的私人秘書張一凡，待遇相差太遠了。

管業務的職員，羅先生找來孫明揚的岳丈鍾伯（鍾錦泉）當製作顧問，每週一晚通宵押送菲林片

到大埔監管印刷程序。財務會計由韋基舜的胞姊韋碧嫻負責。廣告本是雜誌社的命脈，應高薪禮聘廣告界精英出任，以穩住收入，可惜羅先生竟然隨隨便便找來一位名不見經傳、江湖地位不高的余先生充任，大概羅德丞明知無論如何雜誌都會虧本收場，所以不擬投放無謂的資源。

九三年初，《香港之窗》辦了大約半年，資金還算充裕；那邊廂新港盟的財政卻捉襟見肘，羅先生通知我和秘書處的陳小梅和陳青霞要調到雜誌社支薪，兼負雜誌社中文撮要的翻譯工作，但仍要跟進新港盟的會務以及王敏超、張慧燊在港島區繁重的選舉工程，聯盟秘書處只留黃兆熊一人坐鎮。眼見雜誌社的同事薪金個個比自己「多得」，而自己的工作則愈趨「多勞」，心裡不免有酸溜溜的感覺。

三易總編，誤事傷財

沈邁士作風保守，觀點和識見跟不上當前形勢，對北京政策認識不足，但是不學有術，經常遏抑同事的意見和建議，以保住自己的位置不受挑戰。

真不知道羅先生為甚麼會重用這個澳洲人。不旋踵，沈邁士庸碌的表現屢被屬下編採人員所彈劾，羅先生在明白情況之後提出與他解約，當然要賠上一筆可觀的補償金。

羅先生把兩位英籍副總編提升上來任總編，這兩個老番思路敏捷，文筆流麗，但是主觀頗強，一看便知是難駕馭的才子，羅先生經常要花冗長的時間去說服兩人改變看法，修改文章的字眼。這與華人媒體的編採作風大相逕庭，老闆說要改，誰敢不改，編採獨立是自欺欺人的謊言。終於不出幾個月，兩人在雜誌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把 Chairman Mao 毛主席寫成 Chairman Mou，羅先生看到之後勃然大怒，他認定這是故意影射 Mao 是 mouse，侮辱國家領袖人是不可原諒的過失，因此他不接受是校對上的疏忽，即時把兩人解僱了，當然也要依足勞工法例，補償可觀的代通知金。伴君如伴虎，我們旁觀者也看得怵惕難安，大有兔死狐悲之慨。

羅先生繼續以內部調升的方式解決總編出缺的問題，選中新西蘭籍的助編大衛波特走馬上任，波特雖然年輕，但做事賣力，在雜誌社的人緣不

錯，也能緊跟羅先生的口徑釐定編採方針，再者博達的月薪與市場貼近，可以減省支出，紓緩出血的速度。雖然在人事上兜兜轉轉，羅先生對他這個決定還是感到滿意的。至此，雜誌社的辦公室風波總算暫停下來。

本以為重賞必有勇夫，用老鬼可以即時穩定軍心，大展拳腳，想不到遇人不淑，賠了夫人又折兵，三易其帥，中間不知浪費了多少時間和金錢！

江澤民對兩度撥款頗有意見

辦雜誌從來就是燒銀紙的玩意，嚴肅的雜誌情況更是如此。多少人可以學得查良鏞、林山木和黎智英，用印報紙機印出花綠綠的鈔票。

《香港之窗》辦到九五年，前後不足三年，中國銀行八百萬美元的貸款已經花得七七八八了，但距離九七尚遠，雜誌至少要出版到特區政府成立，方算完成歷史的使命，有個漂亮的理由光榮結業。所以羅先生叫我草擬函件給李鵬總理，請他再次撥款支持。信中他特別強調，要我把他照顧家小，維持生計的責任寫出來，因為國內官員

生活上的支銷全是國家的，不會明白香港人生意虧損還要照顧家庭的實況。羅先生還對我說：「我不知道甚麼時候中國銀行要我還錢，我是義務勞動，無一分一毫的利益，我不會負借債的責任，我還要養妻活兒。」羅先生口裡常說，自己是義工，沒有沾國家的便宜。

覆函兩個月後下達，中國銀行再次貸款六百萬美元，但聲明這是最後一次貸款，希望雜誌社盡快收支平衡，財政獨立。第二次撥款下來了，但羅先生的反應遠遠沒有第一次撥款時那麼興奮。

要求第二次撥款之前，羅先生早就定好七月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香港之窗》成立三週年慶祝酒會，北上參加的包括羅氏夫婦、馮錫良夫婦、宋衍禮、李志華、羅文鈺、大衛波特、陳達維、張一凡、楊曉平。獲邀出席者主要是中宣部和港澳辦的官員和國內新聞界的朋友。李鵬總理未有在酒會上露面，後來聽得北京政圈傳聞，江澤民對李鵬第二次批款給羅德丞頗有意見，認為在香港特首人選未定之前，中央不宜製造有誤導性質的舉動和訊息。後來，江澤民屬意的果然不是羅德丞，可以反映中央高層的權力鬥

爭如何詭譎。

吃力不討好，辦《香港之窗》得少失多

羅先生從來沒有辦雜誌的興趣，但衡量情勢，如果要在政治上早著先鞭，九七之前應該有一些具體工作表現和個人的歷練，寓戰於操。我們替羅先生分析過形勢，既然羅先生在後過渡期有蠢動之意，最理想的是在籌委會成立時獲委為副主任（主任必由中方官員出任），登上策劃特區政府的第一線，帶領委員做實際工作，從中發揮政治才華，建立個人的領袖威信。

但是距離籌委會成立，時間尚遠，而基諮會副主任的身分已成明日黃花，難派用場，在九七前這幾年必須找一份不招惹是非，又能獨善其身、盡顯所長的工作。大概是因為魯平和陳佐洱都是從新聞界晉身仕途的，而羅先生也提過，魯平曾問他有沒有興趣搞傳媒工作，所以才興起搞雜誌的念頭。羅先生畢竟是少爺脾氣，放肆起來原是口沒遮攔的，曾有一次在他的專欄《香港日記》中批評港澳辦在某事情上未盡全力，惹得魯平光火，魯

平見到羅德丞時當面質問他：「你為甚麼罵我？」場面尷尬得很。從此，魯平與羅德丞的關係亦大不如前，大概魯平收到風聲，江澤民屬意的行政長官是董建華而不是他。

董建華於九六年一月成為「江握手」之後，羅德丞已經意興闌珊，雜誌的訂戶每期低至二千，發行二萬冊多半花錢請速遞公司四處贈閱，少了魯平的照應，雜誌內容欠缺深度，更談不上有甚麼一手大陸內幕消息，除了羅德丞偶爾動筆的《香港日記》較有瞄頭之外，其餘的評論和專題，大都是老生常談，缺善足陳。《香港之窗》最終在彈盡糧絕的困境下，於九六年十一月（在董建華當選特區行政長官前一個月）倉猝停刊，還差七個月等不到九七回歸，始亂終棄，未免有點可惜。羅德丞雖然不必負債，卻要為《香港之窗》的經營失敗負上政治的責任。

現在看來，假如羅先生能夠沉得住氣，退隱五年，韜光養晦，廣結善緣，候風而飛，應該要比倚靠國家資源，辦雜誌做吃力不討好的事要聰明和實際得多。

雜誌停刊，遣散費從優

《香港之窗》停刊，高級的編採人員都獲得三至六個月的優惠遣散費，我被安排重回羅文錦律師樓當羅先生的私人秘書（因為新港盟已經解散，聯盟秘書長的職銜一去不復返），只獲發一個月代通知金，頗不甘心。羅先生暗示我要另謀發展，他準備退出江湖，不問世事，不需要我留在他身邊。我明白了羅先生的意思，雖然八年努力付諸流水，內心卻無一言半語的怨懟，因為我深切明白從事政治工作的前途和際遇就是如何顛簸，只好收拾筐囊，辭別羅氏夫婦。在新港盟工作所應得的遣散費因為政團已解散，也就無從追討了，只嘆自己倒楣。

之後，羅先生仍然找我做一些文字工作，或起草文章或翻譯他的英文著作，都給予不錯的筆潤。有一次，我索性不提筆金，大膽請他送我一個馬會全費會席，他竟欣然答應。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求他推薦入馬會，輪候名單很長，我已離職，無任何價值可言，竟然可以插隊成功，可見羅先生對人還是很重感情的。

離開羅先生，曹宏威的夫人曹王敏賢馬上與我接觸，知道我中年待業，就介紹我到她所屬的香港協進聯盟當總幹事，開展另一段的政黨生涯。

第七章

推李官披甲，圖垂簾聽政

由加入基諮會任副主任開始，羅德丞有意問鼎第一屆行政長官寶座的傳聞便高唱入雲，任何人都看得出羅先生每一個動作、每一番言論，無不是為部署爭逐特首而發的。儘管在公眾場合被記者問起時，都不予正面答覆，只託辭：「用不上我吧！」但政界幾乎一致視他為大熱門人選。

憑著與李鵬的交情，羅德丞在仕途上應該可以捷足先登，事半功倍，結果忽略了江澤民這一線。江澤民具有勵精圖治的決心，上台後實行堅壁清野，整頓黨內派系，集大權於一身，並藉詞李鵬心臟毛病不宜操勞，部署提升上海幫的朱鎔基替代他的位置，把李鵬轉到人大當委員長，明升實降。李鵬離別了權力核心，影響力當然大不如前，尤其是選拔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決定是一件政治決策，江澤民當然不會交到李鵬的手上，何況江澤民早知道李鵬跟羅德丞關係密切。

依我個人的看法，羅先生最理想的走線是先爭

取成為籌委會副主任，然後逐步向特區行政長官的寶座進軍。但羅先生不怎看重副主任這個位置，他認為有能力北京自會欣賞，直接問鼎特首也很自然，所以無必要太早招搖，做出頭的鳥。之後，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怎樣爭取，也許他知道李鵬勢不如前，而且與魯平交情轉淡，明知有口難言，索性金口欠開，少爺性格如此，徒嘆奈何。反正結果他只當上籌委會法律小組召集人，當不上副主任。

九六年一月，江澤民在北京會見剛成立的香港特區籌委會時，刻意尋找董建華主動與他握手，藉此傳遞欽點訊息。董建華變成「江握手」之後，羅德丞初期並未有很大的反應，因為他尚未了解大陸官場流行的一套身體語言，既已「一握定音」，明眼人早已看出，要推翻江澤民的這個決定真是談何容易。中共怎會接受自由選舉、民意依歸的一套，這次甚至連「上帝之手」的小動作都出台了，訊息還會不清楚嗎？明白這套語言，就算你是有心有力的政治奇才，得不到江澤民的祝福，也不得不偃旗息鼓，跪安引退。羅先生一直忽視董建華的實力，在盤算形勢和對手時從沒有視董

為假想敵，這次才真正知道董是一頭會潛水的黑馬。

先機既失惟有赤膊上陣探風聲

明知大敵當前，問他有沒有退而思其次的打算，羅先生說不屑當行政局議員，居董之下；也不願意做一個庸碌特首的智囊、顧問。他說：「首屆特首的責任重大，要處理很多前朝留下來的棘手問題，拆除很多定時炸彈，假手於一個做生意的商人，難見成效，費時失事的工作沒意思，我不會做。」羅德丞這番見解在日後董建華治港的日子，真正得到了印證。

羅德丞本來就有好勝不認輸的逞強個性，也不甘心多年努力一朝盡喪，所以一息尚存，堅持作戰到最後一刻。一向對參選特首隱匿其詞，四顧言他的羅德丞，終於決定在董建華仍未正式表態之前搶灘登陸，爭取主動。

在五月份他決定利用「九七倒數研討會」的發言機會發表十四項主張，名為《我的政綱——如果我當選行政長官，我將如何管理香港》，明確

地一表心跡，他坦白地說：「假如無人肯做（特首），我願意做。」政綱涵蓋面廣，前瞻性強，其中不乏討好市民的豪語；減稅、大幅增加公務員薪酬、照顧中產住屋等主張，被傳媒指為有意派糖，博取好印象。

以香港人的標準，主動表態參選，並無不妥，但這不符合大陸的政治文化。羅德丞也知道兵行險著，早晚會闖禍。但羅先生寧願「賊佬試沙煲」，「死馬當活馬醫」，也不願坐以待斃。他天真地對我說：「我參選，是幫中央一個忙，說明中央沒有欽點那一回事。」

羅德丞的冒進，會否被視為倒捻江澤民的龍鬚，跟中央政府打民意牌，對著幹？我們也曾經徹夜爭論。尚幸中方放出風聲，鼓勵任何有志之士參選特首，而新華社也游說楊鐵樑加入戰陣，吳光正也插旗起義，我們的顧慮才稍感釋然。不過，北京未嘗一刻停止為董建華造勢，從中央官員的口吻、國內媒體的大幅報道和香港傳媒的爭相訪問，都令人明確地知道中央的選擇。

搜集董建華與楊鐵樑的「黑材料」

羅德丞實行釜底抽薪，組織了董建華和楊鐵樑的「黑材料」，準備送上中央，希望背城借一，扭轉形勢。有關董建華的包括：（1）董為上海人，因生意關係移居香港，故未能符合「港人治港」的意義；（2）董與外國政府關係密切，在外國亦有龐大投資。若他要保住自己的生意利益，關鍵時刻可能要聽命於外國政府；（3）美國國際策略研究中心成立香港小組，委任董為「駐外幹事」，他作為美國的智囊或會為美國設計有利於美國的政策，而罔顧香港及中國的利益；（4）董的船公司有一艘世界級遊輪取名為「愛美號」（Love America），親美之情表露無遺。有關楊鐵樑的包括：（1）缺乏行政能力，導致香港大學聘任新校長鬧劇及司法部管理工作一團糟；（2）審理民主黨成員在公眾地方非法使用揚聲器的上訴時，表現出容易向政治壓力屈服的傾向；還有，誣指楊為人忌才、崇洋、口是心非、專橫霸道等等。

這些「黑材料」是羅德丞的各方摯友主動向他提供的，特別是楊鐵樑，據說當時司法部內部對

他的怨氣最大；至於董建華的「罪證」則似乎有點牽強，殺傷力不足。不過，整體而言，這些「黑材料」也真富娛樂性。

上書江、李、喬，數臭「董陳配」

為了進一步封殺董建華，羅先生說服同為籌委會副主任的李福善上書江澤民主席、李鵬總理和喬石人大委員長。李福善與羅先生交情最篤，李官本人對政治沒有野心，信件當然也是由羅先生為他準備的。羅先生不知找誰替他起草了這樣的一封信：

「敬請新華社香港分社周南社長

轉呈

江澤民主席閣下：

香港特區政府籌組工作剛剛開始，香港傳媒已經紛紛報道特區首任行政長官最佳人選為董建華，並竭力為董建華和陳方安生組成的所謂「董陳配」造勢。為此，本人深感不安。此類報道決非反映香港的真正民意，而是香港傳媒有組織、有步驟、有配合的大規模的造勢活動。據初步統

計，僅由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一個月內這類造勢報道達三十一篇之多。推選首屆特區首長事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前途，謹請最高領導明察。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
副主任委員　李福善敬啟

羅德丞焉知為「董陳配」造勢的不是江澤民，在形勢已成，大局既定的時刻，向江澤民上一封這麼的信，有何實際效用？相信任何人都會知道答案。極其量中央會收斂一下「挺董」的力度，但是以江澤民處事的硬朗作風，不可能因為一封信就在特首的人選上推翻自己原來的決定。何況，陳方安生民望較高，是一個很有利用價值的過渡性人物，「董陳配」為大眾所受落，平穩過渡就多了一分成功的機會，為甚麼不是一個圓滿的安排。「請最高領導明察」何異於「請大人申冤」，在江澤民的眼中，這封信可能會淪為不識大體，以私心發公論的冷箭，徒損投信者的權望和名譽，禍福未辯。

背城借一，哄李福善上馬

羅德丞幾經查探，都無法求證董建華是否已受欽定為特首人選，自己卻從五月份公開表態參選之後，從沒有中方官員或新華社的要員找他教路，更遑論支持他出選，羅先生多方查探，知道他不是北京屬意的特首人選，於是在十月十七日以傳真方式把棄選的宣佈傳到報館，以「參選者眾，應有適合的特首人選」為理由，決定放棄角逐。

以羅德丞的賭徒性格，當然不會甘心敗陣，未戰先降，原來他決定退出之前，早已定好良策，他終於明白籌委會副主任地位的重要性了，失之東隅，惟有收之桑榆，於是他游說同為籌委會副主任的李福善披甲登場，參加角逐，對撼董建華。若李官爆冷勝出，羅德丞就可以用國師的身分，垂簾聽政，延續個人的政治生命。羅先生鬥志頑強，如百足之蟲，堅持作戰到最後一刻。

羅先生在宣佈退選的同時，叫我全力跟進李福善的選舉工作。為貼近李官步伐，李官在中區富麗華酒店租了一個與他的長房同層的一個大房，當作臨時競選總部，叫我全天候在上址工作，暫

時不必理會雜誌社和新港盟的事務。我看看時間無多，距離特首十一月十五日預選只餘不足一個月，競選特首這麼繁重的工程，卻連一項準備工作都未開展，我的確佩服羅先生和李官的膽識和成竹在胸的信心。

羅德丞十月十七日宣佈棄選，十九日上午十時召我到羅家與李福善首次開會，研究參選策略和起草政綱，商訂一系列治港政策立場的文件，準備正式宣佈李福善參選時向外發放。從早上十時開始，羅家斷斷續續出現一批又一批的「競選顧問」，一批來，一批走，絡繹不絕，羅先生的手電響個不停，應接不暇。每迎一批新訪客，羅先生都興致勃勃地從頭向人說一遍李官參選的原因和定位，樂此不疲。過訪者包括：孫明揚、李祖澤（聯合出版集團）、許冠文伉儷、黃霑、黃宜弘、阮北耀、羅文鈺、張妙清、大衛波特（《香港之窗》總編輯）和一些不知名的人士。大家談起選舉策略，都變成理論專家，策略多多，莫衷一是。許冠文引列根當年以軟性的手法、誠懇的口吻接受電視訪問，成功打動選民的心，以壓倒性票數擊敗對手蒙岱爾的故事，叫李官參詳。李祖

澤官癮最大，答應在印刷政綱、宣傳刊物和政策單張上全力協助。黃霑雖無競選經驗，卻答應負責公關宣傳，但沒有說明要收取專業顧問費。

李祖澤義助李官趕印參選政綱

我利用迎送訪客的間隙，翻閱李官帶來的個人資料，引導他勾劃自己的強項，理清個人的履歷，避重就輕，準備為他起草個人簡介、參選宣言和政綱抱負。我又忙於記錄各人說話的重點，用錄音機錄下回家整理，再結合羅先生的指示，兩天之內把政綱、簡介和相關的一系列宣傳單張的草稿都寫出來了。羅先生仔細地和我逐字逐句的推敲，並且找韋基舜審稿，定稿時《香港之窗》攝影記者為李官拍的一輯照片及時送到，於是我把相片和文稿攜回《香港之窗》，請專業的排版師通宵趕工，把分頁排出來。翌日，羅先生看過後非常滿意，我馬上和張太（崔秀英女士）開車到大埔工業邨李祖澤的「聯合出版集團」付印，李祖澤在我們到達印刷廠之前早已下達軍令，吩咐妥當，用最好的紙材、最快的時間完成李福善的

政綱。

菲林片做好了，是付印前的最後審稿，羅先生看著封面三項宣言所用的星號突然靈機一動，說要改用身分證上的三粒星，候選人當中只有李官是三粒星人士（香港出生）。美工遍尋電腦圖片庫而不獲，只有用電腦繪圖方法徒手模描。在這個無關重要的小事上，我們又多花了時間。羅先生某些堅持著實令人費解。

我們前後用了不到三天的時間，把李官的政綱、簡介以接近完美的效果印出來，趕及他在十月二十三日的「李福善參選特首午敘聯歡」（韋基舜認為叫「午敘聯歡」好些，故不叫新聞發佈會或記者招待會）上派發。

接著下來的三個星期，我都長駐富麗華酒店為李官安排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訪問、拜訪、論壇、宴會，並撰寫講稿和政策文件。李官畢竟年事已高，七十多歲的老人家捱不起鐵腳馬眼地獄式的競選活動，回到富麗華酒店時常會疲態畢露，我們看見他日晚奔跑，身不由己，如扯線木偶任人擺佈，心裡也感不安。

李官是個心腸很好的長者，對我們工作人員非

常客氣，一點架子都沒有，而且出手闊綽，叫我們餓了便叫酒店餐廳送餐入房，簽單入他的賬。他還放下好幾萬元給競選總部隨意運用，不必拿單據報銷。

張立登門自薦，賣弄政治見識

差不多天天都有人找上美麗華酒店要見李官，其中以做新聞的記者最多。有一次，《信報》名專欄作者張立一個人跑上酒店找李福善，但李官剛好去了新界社團聯會拜訪，張立找不到李官，逕自找上羅文錦律師樓，說要見羅德丞。羅先生不認識張立，不知是何許人，竟魯莽亂闖，所以叫我出去應酬他。

我推說羅先生正有會議，不便見客，招呼他到會議室坐下，置了咖啡，問他何事到訪，張立知道我是羅先生的秘書，向我說了一番參選特首的理論和策略，又分析李福善的形勢，說得五滋六味，口沫橫飛，大有老夫助選，天下無敵之慨。我在政界打滾多年，見過不少這類的登徒客，想不到眼前所見的張立比起《國是商心》（張在《信

報》的專欄）的張立，更加現實。

黃霑有一次替李官約傳媒老總和名嘴健筆到大坑白建時道李府飯局，意在與傳媒打好關係，正所謂「握手三分親，筆下好留情」，這是政圈慣見的酬酢活動。與會者有韓中旋、韋基舜、陶傑、阿樂、黃霑和張立，好像還有黃毓民，請他是因為黃霑與他熟絡，黃霑說：「黃毓民，人很現實，可以傾，能和他建立交情，吠都吠少點。」奇怪的是，一班時事評論家圍坐一桌，談話的內容不在政治，而是食經、明清歷史、金庸小說、洪成疇與袁崇煥的功過、董小宛的傳奇。這類話題本來是風月之談，取樂之方，據悉當時座中的張立竟權充專家，大放厥詞，被通識達學的才子陶傑和韓中旋不留情面地噴個狗血淋頭，張立黔驢技窮，仍然詖滛連番，負隅頑抗，自暴其短，令人不忍卒睹。

張立就是憑著這種過人的膽識，橫衝直闖，東西跳樑，取得入主亞視的封小平的信任，擔任亞洲電視節目「西北開發之旅」的製作顧問和「張立平常談」的主持，當時風頭之勁遠超當日在飯局上嘲笑他的韓中旋和陶傑。

黃霑胡亂出招，索李官一百萬

羅家常客有三個藝壇中人，一個是徐小鳳，一個是許冠文，一個是黃霑。黃霑是羅德丞的多年好友，交情最深（黃霑說他一九六一年認識羅）。八九年元旦，霑叔在金庸的宴席上向林燕妮求婚的藝壇佳話，即席為他們做見證的律師便是羅德丞。

黃霑為人率性豪爽，不拘小節，但是在政治上缺乏歷練，立場不定，六四上街，他可以在台上紮起頭巾，帶領群眾叫口號，在燭光晚會唱聖誕歌諷刺李鵬，但回到羅德丞的飯桌上，卻如小學生般聽話受教，很認真地垂聽羅德丞對時局政情的分析，並對羅先生的看法佩服得五體投地，在台上叫得聲嘶力竭的反共言論，來到羅家可以一字不提，與同座的親中人士一氣同聲。

黃霑並不是油滑之輩，只是政治思想幼稚，不適宜置身政治的漩渦中。羅德丞清楚他是一個性情中人，所以不介意他的失魂言論，也看中他的知名度和人際網絡，把他拉進新港盟當創會理事。

李福善出選，羅德丞以為黃霑在娛樂圈有良好

關係，又開過廣告公司，一定可以為李官包裝形象，所以聘請他做形象和宣傳顧問。我們幾個做後援工作的秘書知道黃霑助拳，初期以為救星駕到，心頭壓力大減。誰料，黃霑根本不懂得政治形象和選舉宣傳，只請了一個形象顧問為李官挑了幾套西服、幾條領帶，拍了一輯相片，便算完成工作，其餘辯論技巧、說話技巧、論壇及專訪預習、答問預習、團體拜會、打通媒界等等政治公關工作，他一點都幫不上忙。

因為黃霑是受人錢財，不能不與人消災，知道我更了解政情實況，晚上攜同他的年輕妻子，約我和羅文鈺（中大教授，接替羅德丞出任新港盟秘書長）到富麗華酒店對面的四川樓吃飯，說是慰勞，實在想聽聽我們的意見。我們也熟不拘禮，傾囊相授，把應該做的和必須做的選舉工程一一奉告，知無不言。也許說得太白，黃霑面有難色，以為是我們有意為難他，掀他的弱項，對我們的建議也就沒有甚麼回應。

一頓飯吃完了，李福善的公關工作還是依然故我。李福善按黃霑的形象設計師的建議，結起銀灰色的領帶，穿起三粒鈕扣的西裝上衣、暗灰色

西褲，在「午敘聯歡」中以趨時形象亮相，回來後告訴我，他不慣這種服飾，渾身不舒服，以後還是穿回副庭長時的裝束較自然。

更外行的是黃霑在李官宣佈參選的所謂「午敘聯歡」中，以每位酬金數萬元不等邀請了薛家燕（演電視劇「好姨」角色深入民心）、莫文蔚等一批藝員歌星到場助興，把公告決志參選的嚴肅場面搞成「歡樂今宵」式的嘉年華會，奇怪的是羅德丞、韋基舜還大讚場面熱鬧，宣傳成功，真令我們摸不著頭腦。由於黃霑事前並沒有提醒藝員不可洩露收費助興的事，翌日，報章集中報道的並不是李官的政綱、抱負，而是好姨收了多少酬金。

一場不容有失的硬仗，竟然出柵失蹄，簡直是向我們幕後這班摩拳擦掌的助選人員撥下一盤冷水。

李官落敗，黃霑開來的付款通知是港幣一百萬，跑兩個星期的龍套竟然可以索取天文數字，不禁令人頓悟名氣的市場價值。《香港之窗》總編大衛波特寫了幾篇英文宣言和立場書，總共不到一萬字，索價十萬。其餘由羅先生叫來，曾經參與

選舉工作的，知道李官有求必應，都分別提出索酬。李官知道是羅先生的人，不便多講，看著單據，皺一皺眼眉說：「哦！這麼貴！」，隨即吩咐秘書照單出票。李官知道我們長駐酒店的幾個人出力最多，特別送來十萬元以示慰勞。粗略估計，李官三星期的選舉工程，至少花了三、四百萬。

初選落敗，李官謝天謝地

李官在公佈參選後，不少政商界的團體來電約會李官，約會的名目眾多，有座談會、聯誼會、茶話會、簡介會、答問會等等，不一而足，多半是單獨與邀請團體會見，有時則與其他三位知名度較高的候選人（董建華、楊鐵樑、吳光正）同席座談。總的來言，氣氛平和，只有握手言歡，未見有候選人兵戎相見的場面。

除了接受團體的邀請外，我們也主動聯絡「票倉」（如人大、政協、親中政黨、新界社團聯會、鄉議局等），為李官安排拉票機會。每次拜訪團體回來，雖然李官已差不多筋疲力盡，但總是興

致勃勃地跟我說：「很多人說會支持我，我很有信心可以進入第二輪投票。」我對李官說：「別早開心，有些人很可能是想討好你，賣口乖，不想得罪你，他們還是要看北京的態度，不一定會投票給你，要繼續箍票。」李官是純厚天真的老好人，聽了半信半疑。

民意調查一直以楊鐵樑領先，董建華只居次位，吳光正與李福善同列三、四之間，互有上落。四位參選者受歡迎的程度也比較接近，但民調的對象是一般市民，並不是四百位推選委員會成員，所以很容易受民調數字的誤導。李福善以為自己雖然居於落後位置，但因為數字接近，所以一直對於進入第二輪選舉充滿希望。他也擔心連五十票都拿不到，就比較難看了。

按選舉制度，候選人要在初選中獲得至少五十票方有資格晉身第二輪投票，羅德丞和我一起數算李官的支持票，四百個推選委員之中，他列出八十多位，說是支持李官的鐵票，我看過名單後對其中許多人名頗有保留，我逐一向羅德丞分析，並舉例說明我為甚麼懷疑某些人口惠而實不至，因為羅先生圈出的人名中，大部分是聽命於北京

的，他們最終會按「指示」投票，取得他們的口頭承諾是毫無意義的，最可靠的票只有新港盟、鄉事派和東亞銀行李家那二十幾張關係票。羅先生聽了不很高興，但沒有說不同意，只說：「形勢很接近，投完了票才知道。」我心想，就算羅先生計得準，八十多票也只能讓李官晉身第二圈，不足以問鼎特首，結果還不是一樣。羅先生仍然喜歡見步行步的打法，也許他估計進得了第二圈，李官形勢或會峰迴路轉，真不知道他內心盤算些甚麼。

十一月十五日是初選日，我們預先發了記者招待會的採訪通知，不管李福善成功晉級抑或不幸落敗，都要向外界有個交代。十五日的下午，我們齊集在羅德丞的寓所觀看現場直播特首初選的投票實況。三時二十分開始投票，四時五分開始唱票，直到五時零五分，整整一個小時完成唱票程序。由始至終，李官的得票均零星落索，最後只能獲得三十幾票而出局。

記者招待會訂五時三十分假富麗華酒店舉行，只得我和羅文鈺陪同李官出席。李官雖然落敗，心情卻頗為輕鬆，有記者問他的落選的心情，他

坦言如釋重負，整個人也輕鬆了；又說根本不想參選，不過好友相勸，盛情難卻；還說報名的第一天已經開始後悔云云，雜七雜八說了一番不算得體的肺腑之言。李福善就是一個這樣坦直和善良的老好人，讓他落選其實是上天善待他。

記者會後，李官馬上接到董建華的電話慰問，說敬重他的參選勇氣和服務精神，稱讚他的競選工作做得出色，並肯定他對特區政府的貢獻。李官聽罷電話，也大讚董建華很懂得人情世故。

李官落敗也不忘慰勞一班幕後助選的骨幹，十日後他在大坑白建時道的獨立大屋設宴一席，預備了四頭鮑魚款待我們，與會者除了羅德丞夫婦，還有韋基舜夫婦、羅文鈺、李志華夫婦、阮北耀夫婦和我。席上的話題都離不開下月十日特首第二輪投票的形勢，談興不因李官的落敗而減退，只李官迷而未悟，仍未明白得票如此少的根本原因。

不吃人間煙火的人是不適宜玩政治的！

羅德丞退隱江湖，怕人翻舊賬斷米路

羅德丞本以為游說李福善選特首，部署最後一擊，可惜事與願違，李官落敗意味著經營十載的努力終於付諸流水。經過幾天的思索，羅先生召我到府，跟我說：「高生，形勢如此，我地無得玩嘞，你暫時坐我律師樓，找到工作就離開嘞，我唔玩政治㗎嘞。」語氣顯得很無奈。

我看得出他心情很低落，嘗試替他想想特首以外的其他出路，例如行政會議、基本法委員會、機管局、策發會以至政府設立的幾百個諮詢架構，假如他有興趣，以他的江湖地位，應該不難繼續立足於政界。羅先生說：「董建華與英國政府有默契，留鍾士元做立法會召集人，我不想再跟前朝遺老共事，有鍾士元在政府架構的一日，我不會玩政治。」羅先生似乎與鍾士元勢不兩立。

玩政治最容易結仇家，羅德丞引南韓總理翻上一任的舊賬為例，說：「玩政治要有準備別人隨時會翻你舊賬，甚至平白入你罪名，抄家滅族。做生意的人多少會有點把柄為政府所掌握，如果政府要整死你，是輕而易舉的事，一介平民怎有

能力和政府抗衡。」羅先生這番說話其實頗為矛盾，既知脫離政圈會惹人翻自己的舊賬，那麼留在政界一定比降為庶民有利，但羅先生卻說今後脫離政界，不問政事，自貶為庶民，即是說他想別人淡忘他，不對人產生殺害力，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仇家認為你不再構成威脅，就會放你一馬。羅先生聰敏過人，政治此路不通，馬上會拿出求生的本能。怪不得，他宣佈避戰特首時，有記者問他是否怕輸，他勉強地冷笑一聲，接著答：「怕輸？我現在怕無飯吃才真哩！」記者還以為他在說笑，殊不知他正講出落魄政客內心的疑慮。

香港回歸以後，羅德丞逢人讚董，說董建華做得很好，「董陳配」合作很順暢，香港政局很穩定……諸如此類一些「言不由衷」的說話，甚至「沙士」期間，樓市大跌，香港頹如死城，羅德丞仍然三緘其口，不對董建華有任何惡意批評，不打落水狗，一反羅德丞在野時好清談朝政，逞強賣弄的公子性格。羅德丞的絕頂聰明還得配合逆境運際才有機會充分發揮。

第八章

小白宮軼事——羅府內外管窺

羅德丞府第在麥當奴道36號惠苑(Eva Court)，與李兆基、陳方安生和多國領事同住一幢每單位面積近四千平方呎的巨宅，兩梯一伙，氣派尊貴，設備尤勝董建華的老牌名廈嘉慧園。惠苑是恒基的物業，李兆基以大廈命名紀念其分居妻子劉惠娟(Eva)。羅先生是恒基的副主席，故可以月租不過十萬的筍價租住。惠苑地處半山黃金地段，居高臨下，維多利亞港景色一覽無遺，大有君臨天下的氣勢。

羅德丞把家居裝修得像個總統辦事的官邸，客廳與台階式的書房相連，中間裝置了活動間隔，平時中門大開，客人多的時候可以把間隔關上，露出當年華商會送給羅文錦的紫檀屏風，配搭得很有古典味和書卷氣。屏風張開後，正對的是羅先生一張十呎長的巨型書桌，書桌背後是一列黑柚木書架，擺滿法律書籍。因為書房有台階高出，羅先生坐在書桌前辦公，下望客廳的來客，韋基

舜說儼如包青天審案，氣度森嚴。

羅德丞不常到律師樓，多半蝸居在家視事，有需要時召我們到府吩咐工作或商議事務，與美國總統府工宿同處的白宮差可比擬，可以美其名為「小白官」。

在「小白宮」行走的不乏風雲人物，羅家儼如《紅樓夢》中的榮國府，府邸內外談笑往來者如鯽，其中風流韻事或足以為談佐。

羅：「我非有錢佬，最慘仲要扮有錢」

榮國府的大總管當然是第一夫人羅太張慧瑜，羅家內務都由她話事，羅家聘用的菲傭都有個中文名，阿嬋、阿芬，阿琼……，不一而足，羅太說這樣我容易記。羅太是張祝珊的外孫女，因父張玉琪早喪，由母親崔秀英撫育成人。張慧瑜另有孖生妹慧燊，與許君恕醫生離異後適阮北耀律師。羅太是羅德丞的第三任妻子，育有獨女孔君，已完成法律學位，準備接掌父親在羅文錦律師樓的合伙人業務。羅德丞與前任妻子育有三名子女，克平、信優、國倫，均居海外，他們的生活支銷

也得由羅太親自照顧。

羅太說話很直率，從不矯揉造作，雖嫁入豪門，但日常生活頗為節儉。有一次大夥兒吃飯，羅太叫侍應把吃剩的菜包好以便拿走，旁邊的闊太說：「打包拿回去給傭人吃也好，不浪費。」羅太毫不遲疑地說：「誰說給傭人吃，我拿回去自己吃的。」說話爽直而充滿自信，從不怕別人笑她寒酸。羅太有一次不自覺地跟我訴苦，說律師樓賺錢不多，這個家開銷大，真不容易維持。羅太持家不易應該是事實，我也曾聽過羅先生說：「做上流社會的人有苦自己知，人人以為我好有錢，你們不知道，我並非有錢佬，最慘的還要扮有錢！」又慨嘆：「人只看到有錢人風光的一面，卻看不到風光背後一樣要掙扎，也許我們不須掙扎一生，但總要掙扎一段日子。承繼父業絕不是簡單的事情，至少在香港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到。」

志趣相投羅太深得羅德丞寵幸

羅太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奇女子，雖出身於望族，但不屬於大家閨秀一類。她的聲帶沙啞但很愛說

話，也如羅先生一樣很懂得說話藝術，但有時卻過於小心眼，口沒遮攔，常把說話說過了頭，惹得羅德丞暴跳如雷。我親眼見過羅先生被羅太惹怒後，把文件掃落一地的火爆場面；也見過羅太含屈抽泣，嗟怨好人難做的戲劇性情景，當下嚇得我不知所措。幸而每次風暴都會很快平息，夫婦兩人又會成為一對同心合義的「革命鴛鴦」。新港盟成立不久，羅太聯同胞妹張慧燊很快成立「新香港婦女會」，主動做團結名流太太的工作，羅太常說：「你估羅德丞夫人咁易做！」

羅太也如所有的女性一樣，喜歡別人的奉迎和讚賞，有一次，她路經羅文錦律師樓，便跑上來找羅先生，適逢我正和幾位記者安排羅先生的專訪，我見羅太出現，於是向記者們打趣地介紹她，說她就是你們要採訪的成功人士背後的女人了。這番恭維的美詞令羅太心花盛放，對著記者頻說：「我就是那個女人了！我就是那個女人了！」

羅太很有羅德丞的影子，也很懂得獎賞之道，時有小恩小惠。她見我不辭勞苦地日夜為羅先生的事奔跑，在羅先生面前替我說了不少好話。有一次，羅母棄用的名廠舊車要出售，羅太知道我

正想買車，就把舊車的車匙交給我，我問她車價怎樣算，她說：「先用吧！到時才告訴你。」明明是不要錢送給我，她說得得體大方，令人舒服。

借首期買樓口惠而實不至

小恩小惠羅太是毫不吝嗇的，不過要她大幫忙，她還是口爽荷包黐，口惠而實不至。我想改善居住條件，換一個較大的單位，問羅太可否幫忙，她知道我人工不多，一口答應借貸首期讓我可以慢慢供樓。我和太太於是開始看房子，偶然機會給我們找到一個位於堅尼地道面向香港公園的唐樓，叫價三百二十萬，業主急售，必須速下決定，我當晚立即致電羅太，問她可否先借六十萬首期，待我盡快賣出自己的物業後奉還三十萬，即只借三十萬。羅太正在竹戰，無心聽我細說，只在電話中說無問題，我告訴她說我準備當晚落槌簽買賣合約，她唯唯諾諾，不置可否，話筒裡只聽到她與牌友嬉笑的聲音，我只好說把借款的細節傳真給她細閱，鄭重地多謝了她便掛斷電話，不打擾她打牌。

翌日，羅太看到我的傳真，態度開始動搖了，羅先生問她曾否答允高先生借首期一事，羅太也無言以對，因為大家事前沒有說好借額上限，我以為買房子，首期三五十萬總得要，估計數額不算大，羅家也是大戶之家，所以相信羅太一定會鼎力相助，從沒想過羅太會反口不認。

羅太對我說：「我說過可借你首期，但無叫你買這麼貴的樓，你已簽合約，唯一辦法是我替你買了這層樓，你到律師樓叫李志華辦轉賣手續吧。」我說會損失九萬元釐印費，她說可以還給我，算她的買價貴了九萬元，我不好意思再說經紀佣金三萬多元還得要我清付。我見她態度已決，無轉圜餘地，只怪自己過分信任和決定太急所交來的歹運。

我相信羅太是有意幫我的，但做事不經意，輕諾寡信，主觀性強，反而容易失去下屬對她的尊敬。假如她能夠找相熟的銀行給我做最優惠的按揭，她加簽擔保，我還款不濟，樓歸她所有；或乾脆表明可借我多少，餘款我自己想辦法，那就皆大歡喜，主僕雙贏了。

羅太聘大國手長駐應診兼籌經費

羅太並不參與新港盟事務，然而她是掌管聯盟財政的真正司庫。因為新港盟的經費主力由羅德丞負擔，其他理事支援有限，羅太在財政上勞心，自然深受羅先生的欣賞（名流太太的確不易為）。

羅太很懂得利用任何機會為聯盟籌集經費。有一次，她從北京歸來，說申請了一個以拍打全身穴位治療筋骨病患的名醫葛長海來港長駐聯盟應診，叫我們在會址闢一個房間作為葛大夫的診所。不到一個星期，司機阿浩把葛大夫接來，開始他的應診活動。

葛大夫是一個六十多歲不擅詞令的老實人，他的拍打療法是家學，沒有甚麼醫學上的理論根據，只是中南海的高幹都請他拍打治療，口耳相傳，在北京就開了名。

葛大夫留港一個月，每天要應付羅太為他安排得滿滿的日程。星期天有半天休息的時間，還是由我帶他到處走走，看看香港的景點和買些港貨。葛大夫在國內的農村長大，生活很樸素，每晚看完了症，他喜歡弄些餃子下酒，叫我替他買些麵

粉、絞碎豬肉、花椒粉等食材，讓他包餃子，他喜歡喝高粱，我買了幾瓶二窩頭給他，他包的餃子手法純熟，一看便知是老手，弄好了他還請我一起吃，言談中他抱怨這次來港不見得自己是上賓。

慕名而來的人很多，有入境處長梁銘彥一家四口、楊孝華夫人、鄧肇堅夫人、許冠文夫婦、黃宜弘夫婦、簡福飴夫人、徐小鳳、馬力等等，多半是羅家相熟的友好。葛大夫每次按病人數目和療治時間收取三至五百元的診金。羅太叫我們告訴葛大夫，診金由我們收取，最後由羅太一筆過支付葛大夫來港的酬金。但葛大夫仍然自行向來診者索取診金，害得我們要再三向葛大夫轉達羅太的說話，葛大夫才好不願意地把收下的診金上繳，我們才得以向羅太交代。

有聯盟成員問羅太，滲入謀利活動對聯盟形象會否有影響，羅太說：「我請葛大夫來港是造福本地病人，看醫生當然要錢，看病是自願的，覺得無需要可以不來。」有時羅太的理論跟羅德丞的同樣精警。

不久，羅太又夥拍孫明揚夫人鍾小芬開設香港

花店，包攬羅家及孫家友好介紹來的生意，據悉生意滔滔，財源滾滾。環境可以改造一個人，難不得羅太的母親張崔秀英說：「阿瑜做女嘅時候無咁叻㗎！」

孫公、八少是羅府雀局的鐵腳

羅府乃夜店，差不多每晚雀局不缺，在羅府竹戰也真夠享受，麻雀枱就靠近偌大的落地玻璃窗前，一邊打麻雀一邊觀賞維港的璀璨夜景，確是賞心樂事。羅家雀局，意在遣興聯誼，注碼不大，羅氏夫婦很懂得以雀會友，雀友一族絡繹不絕，打牌的氣氛輕輕鬆鬆，談話也無拘無束，比圍坐談笑更融洽自然。

雀友之中，數孫公（孫明揚）和八少（韋基舜）為鐵腳，每逢喜慶節日或熱烈場合，二人多半應召入伍，手談至通宵達旦，永不言倦。孫公與羅德丞交情最深，八十年代，孫公任副運輸處長而羅先生任交諮會主席期間，孫、羅已經熟絡，兩人有超過二十年的交情。韋八少與羅德丞同為世家子弟，八少家族憑二天堂發跡，再創辦《天天

日報》，家族子弟時有往來，八少閒雜書籍讀得最多，精於歷史掌故，羅德丞最佩服他對歷史人物盛衰的分析，論牌術亦以八少最精。

曾幾何時，羅先生告訴我，布政司陳方安生曾「忠告」孫公要與羅德丞保持距離，但孫公為人有節氣，重感情，不理會陳方安生的「忠告」，照樣到羅家打麻雀，也不隱瞞與羅德丞的友好關係。羅先生有意在選上特首之後，找他出任特區首任政務司長。羅先生退隱江湖，在政治前途上畫上句號，孫公仍視他為摯友，雀局依舊，可見孫公並非見利來聚之輩。

八少看名望的興趣比政治大，他是個久經歷練的老江湖，很看不起自以為是的港英政務官。有一次他出席一個有關「居英權」的論壇回來，批評當時任行政署長負責推居英權計劃的曾蔭權，說他氣燄囂張，趾高氣揚，目中無人，人家跟他打招呼，他不瞅不睬，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樣。

八少是運動健將，香港體壇的發展歷史中一定少不了他的名字。他涉足政治完全受羅德丞的影響，如果不是因為羅拉他加入新港盟，八少寧可多搓兩圈麻雀。八少素重江湖義氣，當「一會兩

局」把新港盟打得元氣大傷之際，羅先生要淡出新港盟，韜光養晦，修補形象，八少毅然接聯盟主席的棒，充當黃台之瓜的守將，試問誰有這個義氣和勇氣去啃這塊雞肋！

蟹宴連續旬日，政商川流不息

除雀局常設之外，馬拉松大閘蟹宴應是羅府的另一大特色。

每年秋菊盛放之際，正是大閘蟹當造之時，羅家例必設大閘蟹宴，廣邀政界友好到府把盞持螯，聯誼一番。羅家蟹宴連續旬日，宴如流水，每晚一席，方便款客。蟹都購自銅鑼灣有「昌」字號的老店，羅家是老主顧，每年這個時候訂蟹都以籮為單位，選的都是正宗陽澄湖特大極品，雖已折扣優惠羅家，動輒仍索價三數百元一斤，一斤兩隻，一個人一晚隨時吃掉三、四隻，尚有醇醪美酒、山海佳餚，每年大閘蟹宴，粗略計算也得花上一二十萬。

宴請的對象以政界友好為主，新華社各級部委當然是首輪款待的貴賓，周南、鄭國雄、鄭華、

張浚生、秦文俊、烏蘭木倫、朱育誠、袁鵬雁、孫南生、鄒哲開等要員都分別應邀過府，其餘聯絡較密切的副部及處級官員羅先生都沒有遺忘，每次都把羅府二十人大圓餐桌坐得滿滿的。

新記以外，便是北京政商要人和在港或過港的家眷、人大政協的友好、鄉議局和新界社團聯會的知交。羅先生還安排新港盟的成員和與羅先生關係密切的港府官員同座，加強彼此認識，方便日後的聯絡。我們幾個新港盟的主力因為工作需要，晚晚要陪席聯誼，看到大閘蟹都不寒而慄。

拉何世柱下馬，挺黃宜弘入局

新港盟理事當中以黃宜弘學歷最高，他是美國電子訊息工程系博士，他的博士不是用錢買的那種，也不是榮譽的那種，而是真正唸出來的博士。回港加入聯合交易所後，更把聯交所全面電腦化，才華與成績備受讚賞。因為學府出身，為人頗為平易，待人接物都很客氣。

有一個階段，黃宜弘、梁鳳儀夫婦是羅府的常客，也是羅德丞的內閣戰友。黃宜弘以羅德丞為

馬首是瞻，對羅言聽計從，羅德丞每一個行動，黃宜弘都亦步亦趨，奉他為大阿哥，弗逆半句。加上黃父為老愛國資本家黃克立，政治背景明晰，故深受羅德丞的器重。

黃宜弘九一年參加立法局功能議席選舉，擬從中華總商會功能議席出線，若非羅德丞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游說新華社把何世柱拉下馬，黃宜弘當立法局議員的美夢當不會如此順利。黃宜弘在無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心情大悅，當晚訂下日本餐廳貴賓房舉行慶功宴，十六個人一晚吃掉二萬多元。

黃宜弘對政治充滿興趣，但政治智慧遠不及羅德丞，對政局的觀察力不夠敏銳，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羅德丞叫他在立法局動議促請彭定康收回政改法案，黃宜弘照本宣科，但骨子裡根本不明白羅德丞的用意。我在《香港商報》以「蘇三筆」名寫了一篇分析黃宜弘反彭動機的文章，指黃動議九死一生仍然堅持提出，表面看似愚蠢，實際上是鎖定彭定康「三違反」的立場，叫彭定康能進不能退，要與中方力撐到底，方便中方部署另起爐灶的計劃，黃宜弘的動機是

陰招之最，不是愚蠢反是大聰明。黃宜弘看到文章後，得意洋洋地跟我們說：「就是這個目的，就是這個目的。這個作者是誰，竟然分析得這麼清楚！」他還不知道文章是我寫的，我也不便多言。

羅德丞退隱歸山之後，黃宜弘也慢慢和羅德丞疏遠，昔日出入羅府的常客，突然絕跡惠苑。在七一回歸的典禮中，黃宜弘見到我也視為陌路人。

羅太視官場關係網為私人資產

黃宜弘與羅德丞疏遠，其中一個原因是兩位夫人的不和以至交惡。

羅太性格很像羅先生，在任何場合中永遠喜歡別人視她為焦點，愛做主角，習慣有一大班手袋黨替她前呼後擁，看她的指示和眉額。羅太沒有做一個政界女強人的野心，但聰明好學，在政治婚姻的氛圍下造就了她卓越的社交才華和公關手段，這是名太太不易做的其中一個原因。

羅太喜歡結交達官貴人，尤其是羅德丞轉投北京之後，羅太以香港名門望族的身分，更容易吸

引京官夫人與她打交道。羅太是個愛說話的人，普通話不算好，但已遠較羅德丞流利，而且女人的膽子大，無論任何人，官階有多高，她都能主動引起話題，話匣子打開，天南地北有無數說不完的八卦新聞，她開朗平易的作風和隨口而出的巴人俚語，給人一種暢所欲言、不必避忌的舒服感覺，所以羅太很容易贏取京官（尤其是京官夫人）的友誼，建立超越統戰式的親密關係。我以為在當時活躍政壇的明日之星中，沒有一個夫人可以有羅太這種公關才華，無怪羅德丞對她寵愛有加。

羅太視這些辛苦經營得來的關係為羅家的政治本錢，也視為秘而不宣的私有資產，她樂於藉著這些關係以廣招徠，但最忌別人過橋抽板，打完齋不要和尚，利用她的人脈關係攀上大陸官商政要，然後一手搶過來據為己有。

梁鳳儀與羅太不和內情

梁鳳儀是商界女強人，由聯交所公關到財經暢銷小說作家，把創立之「勤加緣出版社」發展成

多媒體製作的上市公司，其創業精神不得不令人折服。梁鳳儀的事業心和上進心很強，而且精力過人，勤於鑽營，她雖然為勤加緣的業務忙透了，還要抽時間陪伴黃宜弘四處應酬，很多個晚上都在羅府見到她的蹤影。當男士們把酒論政、言不及義的時候，她常常坐到一邊寫稿，也不和太太們胡謅。大夥兒興盡之時，梁鳳儀早已完成幾千字的文稿了。

梁鳳儀最喜歡寫名人傳記，既可提高個人的知名度，又能保證書刊銷路，實在是最有生意眼的念頭。她通過羅氏夫婦的關係，邀得李兆基答應讓她操刀寫傳，梁鳳儀果然不辱使命，把李兆基寫得情義兼重，足智多謀，令李兆基非常滿意。

有一次，羅德丞宴請舅父何世禮將軍，梁鳳儀聞風而至，一見面即拉住老人家恭維久仰一番，然後表明來意，希望何世禮將軍答允讓她寫一本傳記。何世禮將軍為抗日名將，曾任張學良的副官，一生充滿傳奇，也是何東的親子，傳記寫成一定洛陽紙貴，一冊風行。何世禮將軍平日深居簡出，謝絕應酬，所以梁鳳儀不放過這個難得的

機會，鼓動如簧之舌，以女性的柔腔軟調，希望可以說服這位老人家。可惜，何世禮將軍已屆八十六高齡，視力和聽覺已經退化，口齒不靈，眼前是甚麼人他不大分得清，只覺得來者嘮嘮叨叨，顯得不耐煩，羅先生在遠處以開玩笑的口吻嘲弄梁鳳儀：「他最怕女人接近他！」到筵席曲終人散，梁鳳儀終不得要領。

梁鳳儀的出版社正在開拓國內市場，很重視與國內高幹和媒體打關係，知道羅太天地線直通中南海，而《香港之窗》與中宣部關係密切，線路縱橫，而長期居港之李鵬女兒李小琳、王震之子王軍、魯平妻兒，以及本地政要鄭華夫婦、孫明揚夫婦、梁銘彥夫婦，都是羅宅的常客，所以不時攀附，借意叨光。羅太初時也不以為意，正樂得有人拍托，但日子一久，梁鳳儀與這些人混熟後開始繞過羅太，直接來往，並托辦諸般事務。消息傳來，羅太大動肝火，她不喜歡有人借她過橋，未經她的同意便挪用她的秘密武器，動用她的私產，所以對梁鳳儀很有意見。自此，兩人關係開始轉惡，羅德丞退隱後，黃宜弘夫婦就斷絕來往了。

蕭老九開咪，難為了俞琤

忘了從何時開始，新港盟增添了一名會員叫蕭景韶，好像是韋基舜介紹入會的，我翻查資料知道他是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前任副主席。

蕭景韶說話很動聽，指出六四後輿論更趨一面倒，不利中國政府，亦不利基本法的諮詢工作，一定要平衡一下社會上的聲音。香港電台九十年代 phone-in 節目天天開咪，日日替市民洗腦，建議以牙還牙，找一個電台同樣開一個 phone-in 節目，抗衡反共言論。其實類似的建議，王敏超已經在內會上提過，當時沒有人積極附和，因為大家都知道，就算開咪有路，也難找到一個有江湖地位、形象受落、言論得體並且深入民心的主持人，無合適的人選，建議再好也流為書生之見。

蕭景韶的說話硬朗直捷，措詞不夠圓滑，應該是沉不住氣的那種人，黃霑說他不是說之以理，動之以情的好主持；但他的說話正投合羅德丞之所好，而且蕭表示願意做爛頭卒，胸前掛個勇字赤膊上陣。羅德丞於是不假思索，約商業電台總監俞琤到美國會所吃午飯，推薦蕭景韶給商台開

咪論政，飯局連我在內共四人。

當我依時抵達美國會所，突然接到羅的秘書來電，說羅先生不想我在座，叫我折返。我入世未深，初嘗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滋味，心裡納悶，氣得想馬上辭職，但回頭一想，羅先生說俞琤開咪，多一個人在場說話可能不方便，以大局為重，個人的感受就變得次要了。

商台的老闆是羅德丞的舅父何佐芝，俞琤雖然認為蕭景韶寂寂無名，節目缺乏商業價值，但礙於羅德丞的關係，還是勉為其難替蕭景韶開咪。正如黃霑所預測，以蕭景韶的能耐根本疏導不了當時正值澎湃洶湧的反共情緒。連續兩個星期，聽眾從不間斷地打電話上商台臭罵蕭景韶，俞琤眼見激起民怨，蕭景韶又無招架之力，於是決定腰斬節目。

住在羅德丞樓上的李兆基

許多人只知道羅德丞與李兆基是恒基的拍檔、樓上樓下的鄰居，但不知道兩人有誼兄弟的關係，李兆基是羅母何錦姿的契仔。羅府客廳的酒櫃牆

上，掛著一個立體鏡框，鑲嵌了一個巨型的足金壽桃浮雕，上面刻了語帶吉祥的祝壽詞，上款刻上錦姿誼母華誕，下款的署名是李兆基。

李兆基不談政治，較少和新港盟的人來往，我只在羅家見過他幾次，一起吃過飯，一起同團遊三峽，談話的機會不算多。李兆基的性格和羅德丞截然不同，四叔性情沉實內斂，不慍不躁，他和下屬說話都是和和氣氣的，他的說話短小精悍，簡單直捷，不事修飾，不好長篇大論，絕無冗贅嘮叨，當然言談中也有超級巨富的氣宇和口吻，但人不驕不囂，反帶點傻意。我未嘗見過他高聲說話，或者厲聲呼喝下屬，衣著也很平實隨便，以超級富豪來說，他算是低調了。

羅德丞常向人引述四叔「發達」的故事。有一次，有人請李兆基傳授發達心得，四叔不加思索便答說：「想發達很容易，只要每天由起床一刻開始，腦裡不停想著怎樣可以發達，怎樣可以發達，你早晚一定可以發達。」來人續問：「那豈不是很快黐線？」四叔壓低腔調地答：「會啊！你看我便知道了。」羅先生每次跟人說起這個故事，都笑得合不攏嘴。

基諮會的兩顆明星—馬力與邵善波

馬力、邵善波是羅德丞在基諮會認識的親密戰友。馬、邵同樣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毛鈞年副社長找來基諮會當副秘書長的，但兩人在背景和才情上非常不同，所以外界傳他們貌合神離，各懷鬼胎。馬力畢業於左派學校—— 培僑中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後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長鄭棟材推薦入讀中文系。馬力在愛國家庭長大，根正苗紅，連兒子的姓名也表現出愛國愛黨的情懷（馬力與馬列諧音，在國內這是個很「紅」的名字）。邵善波則是番書仔，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繼而到康奈爾大學進修，返港後編過時事評論雜誌《焦點》，後來雜誌因為資金短缺而停刊。

馬力溫文爾雅，有讀書人的氣質和涵養，在學術上也有成就，他是香港少數《紅樓夢》研究專家之一，又寫過不少文學評論，與國內頂尖學者時有往來，予人一派學優則仕的風采，左右兩邊的政客都不敢小覷他。尤其是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對他更刮目相看，寵愛有加。

馬力在基諮會解散之後閒散了一段日子，先派

到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當總幹事，後轉到《香港商報》任總編輯，直至民建聯組黨成功，馬力才升任《香港商報》副社長，不管報社實務，以借調身分出掌民建聯秘書長職務。曾鈺成請辭主席後，馬力接任新主席，帶領民建聯在二〇〇四年立法會選舉中，成為立法會第一大黨。

邵善波是番書仔，性格較粗獷，脾氣剛烈，容易動氣，常以「痴孖筋」三字贈人。外傳他和同為基諮會副秘書長的馬力口和心不和，可能因為我是馬力引薦給羅德丞的，所以對我特別有戒心。我曾因為聽信韋基舜的指示，把「一會兩局」方案的小冊子拿給一間他認為是台資的發行商發行而捱罵。

邵和馬力一樣，同是少數能洞悉香港政治形勢的精英，我常笑言，香港少了馬力和邵善波，英國政府與中方的談判可能會輕鬆許多。邵是典型的「世界仔」，有敏銳的政治觀察力，但是個人主義色彩濃厚，從政多半為個人事業找出路，少了一份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他喜歡別人以專家、智囊視之，更不介意把腦袋變成商品，待賈而沽。

「一會兩局」方案他是始作俑者，他先把構思

提上北京，刺探風聲，打通經脈後，便即時把方案拿回香港，找羅德丞推銷出台。羅是個聰明人，知道此路已通，認為機不可失，急急上馬，成為新香港聯盟的方案。草委會通過「一會兩局」分組投票機制後，羅論功行賞，其中一張支票是給他的。

邵也是一個爽直的人，「一會兩局」期間我和他在合作上的嫌隙，一段時間後就雨過天青，前事不記。基諮會解散後，他得安子介、黃保欣、李國寶、梁振英等人的支持，成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自任總幹事（幾年後嫌職稱過分低調，遂改稱總裁）。我離開羅德丞之後，有次帶外交局港澳辦主任陳滋英的秘書到中心拜訪他，他問我的去向，對我說：「你也可以來這裡（指在中心任事）。」當時港進聯正有意斟我過檔當總幹事，條件未談妥，不便張揚，我隨口應他：「可以嗎？」他也沒有進一步的反應，相信仍是外交辭令居多。其後，我為港進聯秘書處搞學習日營，找他當講者，他一口就答應了，而且不嫌我們人丁單薄，仗義相助，言談中對年輕的工作人員語多鼓勵，一洗從前傲氣，令人刮目相看。

同交華蓋運的羅德丞與劉漢銓

我曾經先後服務過兩個政團，都是總幹事職銜。一個是新香港聯盟，一個是香港協進聯盟。同是親中政團，兩位黨魁的性格和作風卻迥然不同。

政圈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羅德丞和劉漢銓都是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政客，兩人都是憑組黨來囤積個人的政治本錢，兩人所組織的政黨最後都難逃劫數，羅德丞的新香港聯盟在九七前已經人間蒸發，劉漢銓的香港協進聯盟則在缺乏方向的困境下被民建聯所收編，從此秋收冬藏。

猶記得劉漢銓吞併自民聯的時候，劉在常委會上揚言，港進聯在現階段要做的工作是合併、收售，合併、收售……，劉主席怎也想不到剃人頭者人亦剃之。

羅德丞不像劉漢銓，他不是一個善於游說拉籠、組織群眾的政治領袖，他有獨到的眼光，看政治上的矛盾看得準確，看準了便狠下重手，不介意突出個人的鮮明政治立場，賭得很盡，賭注很大，憑藉港英時代的政治背景和家族的顯赫聲望，走中方上層路線事半功倍、駕輕就熟，這是他條件

比人優厚之處。

劉漢銓能言善辯，擅於處理內部矛盾

劉漢銓的聰明才智絕不遜於羅德丞，但是攻於心計，滿肚都是密圈，最擅長處理內部矛盾，調解衝突和紛爭，開會議很有效率，兩三句說話就會把觀點條分理析，避開內爭內耗，善於營造內部祥和氣氛。

論議政能力，劉漢銓是夠班的，但作為政黨領袖，他的領導能力很有問題。他缺乏遠大的眼光，看不出（或者故意不看）港進聯幾年後所面對的困境，只迷醉於合併、收售的小圈子政治，只看個人在大選舉團議席的生存空間，沒有黨團的發展目標和計劃。港進聯收納了一批地區議員，但從沒認真地去想過怎樣把地區事務發展起來。常委會會議大部分時間是匯報政治形勢，或者處理內部矛盾，把即將席捲而至的直選狂潮視若無睹。間或有人提議組織一些姿態強硬的行動，以加強港進聯的公眾形象，提高知名度以部署參選條件，但大都被劉漢銓以港進聯的形象不宜過激為理由，

一一否決了。

劉漢銓的人品比不上羅德丞，羅德丞用人是推心置腹，用人弗疑，所以深得下屬的欣賞；而劉漢銓行事作風表面誠懇，背後盤算。我出任港進聯的總幹事，劉漢銓很少直接找我商議事務，反而常常召一位專責立法局事務的資深職員何小姐到他律師樓匯報秘書處工作情況，又叫何小姐通知我要做些甚麼工作，說甚麼劉主席忙，未暇直接通知云云。港進聯定期與新華社有飯局，前任總幹事吳軍捷必定隨同出席，到我上任，何小姐說劉主席不用我去。我陪同羅德丞東征西討，見盡京官，怎會令港進聯丟臉，況且，與新記官員溝通是我做好總幹事的份內責任，我不相信劉主席不明白這些處事和處世的基本道理，我就不去追問，免傷和氣，決定多待一會，並多方觀察，再作打算。

誠信已失，難以繼續留任港進聯

我與劉漢銓首次見面，談過檔港進聯做總幹事時曾經有過默契，以前在羅德丞處所知道的事，

如果我覺得不方便的，可以不說。可是，有一次，劉漢銓和我談起孫明揚，說不了解他與羅德丞的關係，要我透露，我回應說：「羅先生還在，我不方便背後說人。」劉漢銓急起來，先前的承諾都忘記了，說：「這不是道義的問題，為了個會著想，我們需要掌握更多的資料……。」我默不作聲微笑地看著他，他知道我不願意說，就轉過話題來解窘。

我不習慣這樣的合作模式，於是只服務七個月，就隨便找個理由請辭了。劉漢銓為了叫我留下，說：「短時間離職會對港進聯的聲譽做成影響，讀書人也要顧存道義！」亮出道義相逼，我真的啼笑皆非，不知怎樣回答好了。我表示會低調離開，對外不說半句港進聯的壞話。

羅德丞的說話技巧遠遠及不上劉漢銓，腦袋比嘴巴快，不擅長按部就班、深入淺出地說明問題。有時則反反覆覆、婆婆媽媽，或過分賣弄溫情和幽默感，反而給人一種不認真、欠誠懇的印象。

羅德丞外冷內熱，寓行賞於禮賢

雖然羅德丞外表冷酷，但內裡有溫情的一面，也很懂得惜用人才。他常在大清早召我到府起草文件、講稿、書信或文章，如果他沒有約會，一定叫傭人備午餐，與我一起進膳。最常吃的是每人一大碗燕窩、一條約八両重的石斑、一條德國香腸及素菜一小碟。邊吃邊傳授「實戰政治學」，多半和我的工作有關，我看得出他有意教曉我分析當前政局，要我緊貼他的立場和觀點，用準確而漂亮的文字來表達他的意思。

羅德丞愛炒美國的股票，而且專炒「孖展」，注碼賭得很大。他跟隨一位叫王中岳的先生學得玄空飛星之術，自創以玄空學買股的心法，屢有斬獲。他深明獎賞之道，凡有大斬獲，總會在一天工作後送我一張支票，五萬、七萬不等，是我月薪的幾倍。一面寫支票，還一面說些體貼的話：「我搵錢就叻，寫文章得靠你了！」行賞之術最易流為施捨，嗟來之食適得其反，誰能像紈絝子弟的羅德丞寓行賞於禮待，對下屬說出這樣窩心的話。他也是恒基地產的副主席，當恒基股票價位偏低的時候，常不經意的叫我們「買些少啦」，同事們如獲至寶，說投資貼士更勝年尾出雙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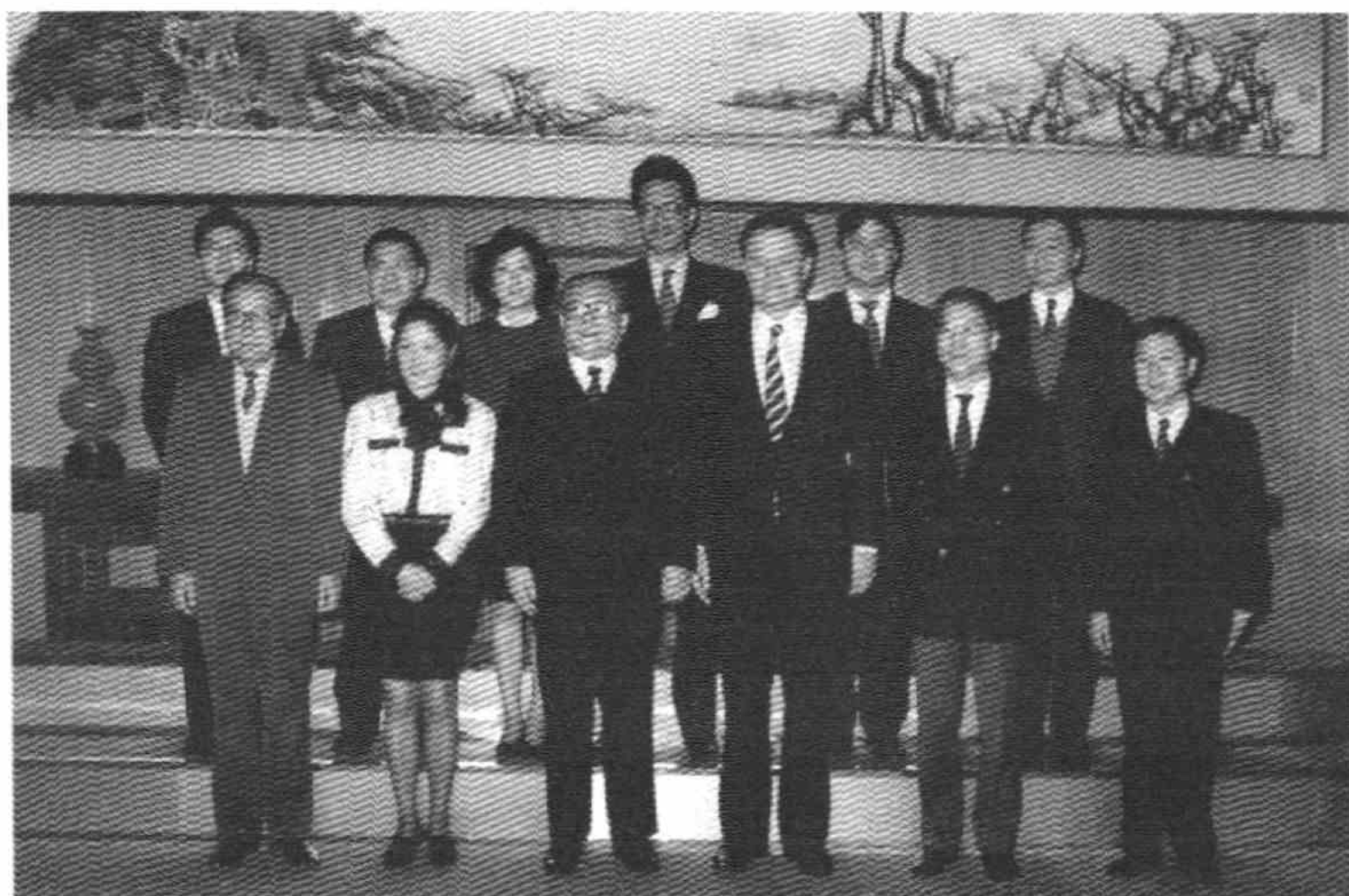
孫明揚在出席羅德丞的喪禮後大膽執言，力讚羅先生的人品高尚，待人真誠。有機會接近羅德丞，認識他的為人，應當相信孫明揚的褒賞，並不是溢美之辭。



羅德丞夫婦與作者一家三口攝於1997年「七一迎回歸」晚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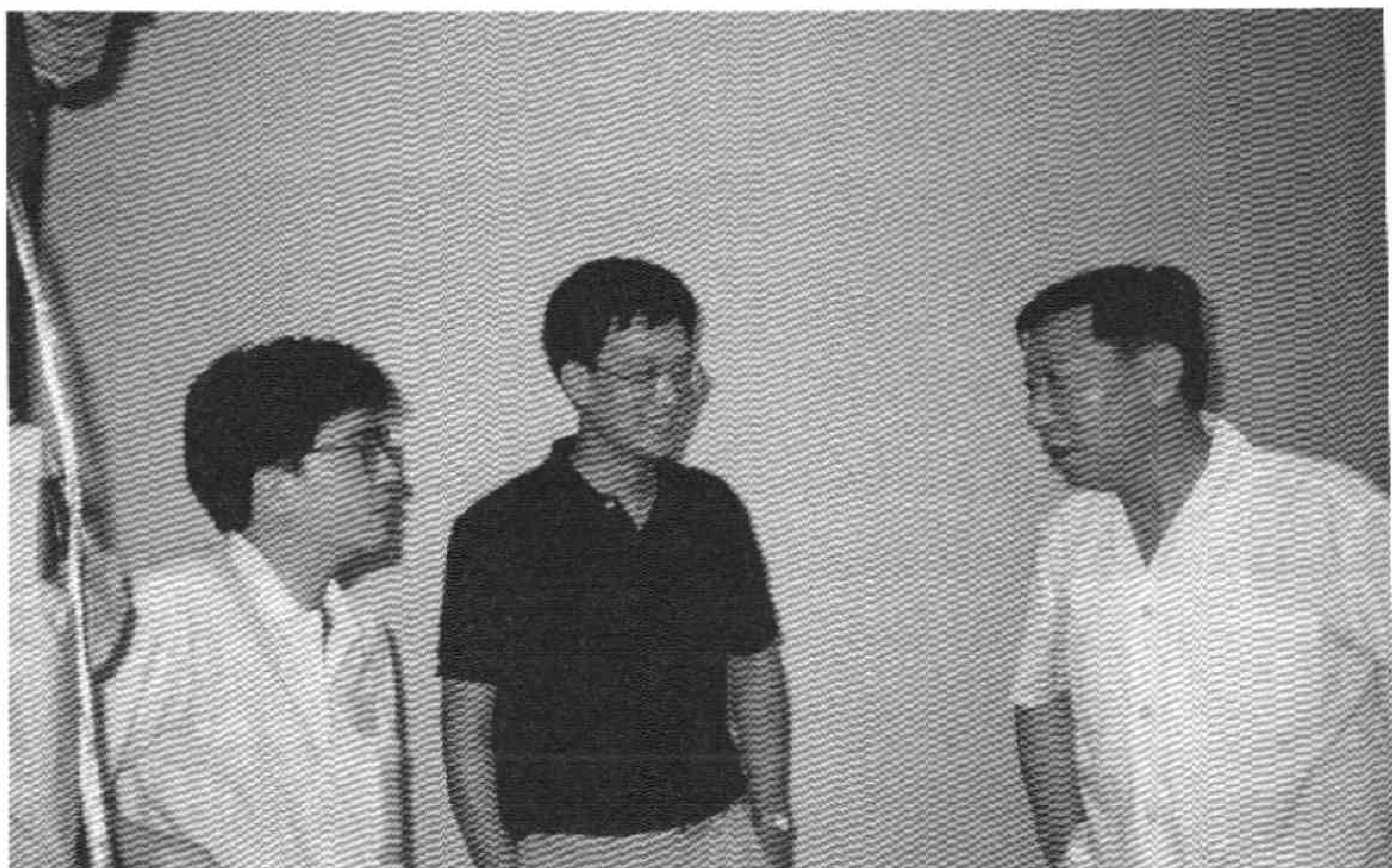
1997年，作者與主禮嘉賓特首董建華攝於香港協進聯盟慶回歸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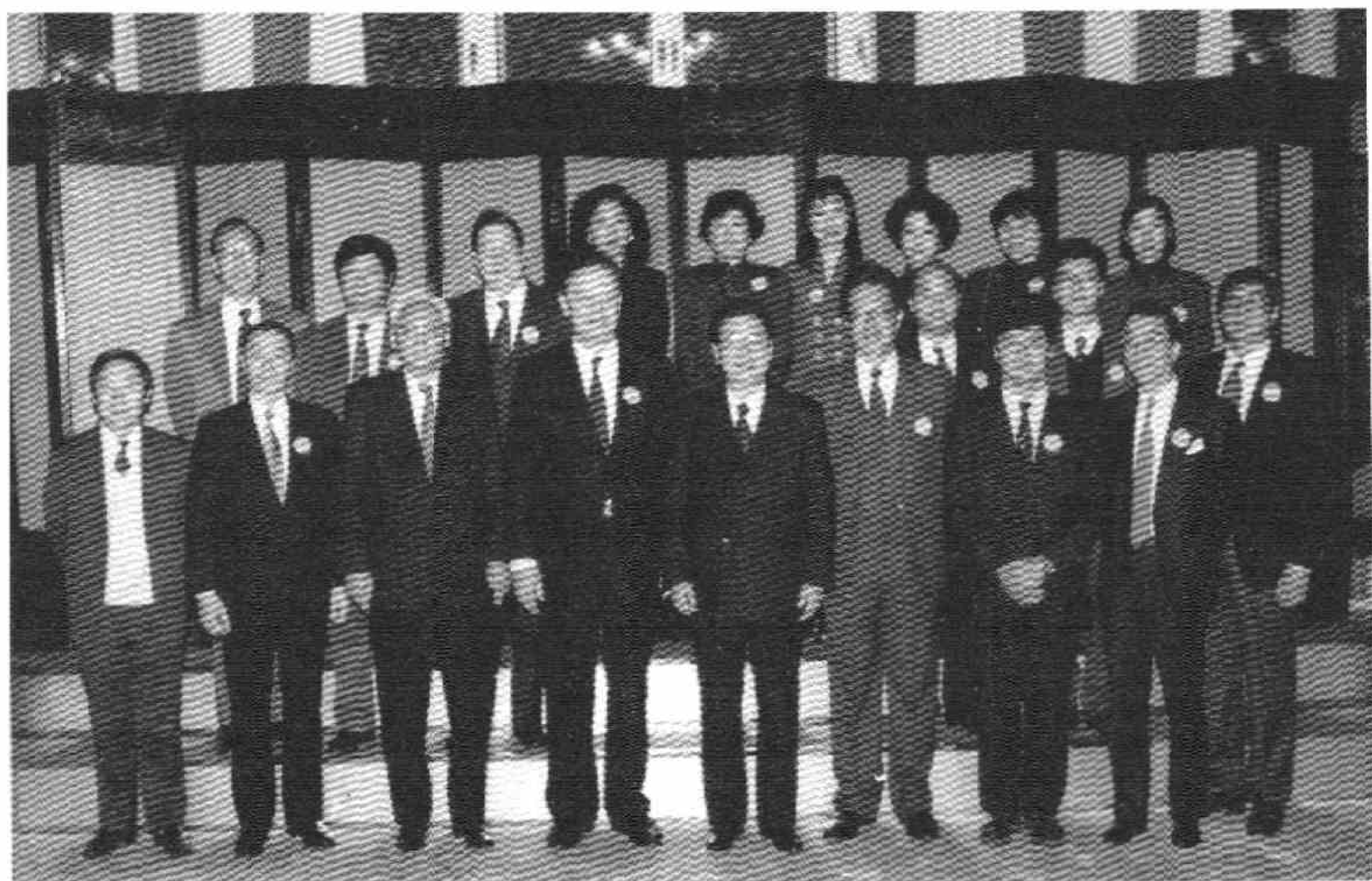
1990年2月新香港聯盟獲邀訪京，與江澤民、李後及陳佐洱在中南海合照。訪京團成員包括羅德丞夫婦、韋基舜、黃宜弘、王敏超及作者(後排一)等合共九人。



1990年12月作者夫婦獲邀在北京進行訪問及學習交流活動，有機會到北京大學聽蕭蔚雲教授(左二)的法律課。



羅德丞夫人聘大國手葛長海(右一)來港駐新香港聯盟應診，馬力(中間者)探訪葛大夫，請教「拍打療法」。



1992年11月新香港聯盟組團赴京，與李鵬、魯平及陳佐洱在中南海合照留念。



曹宏威帶領《WINDOW》周刊攝影人員到大亞灣核電站進行拍攝。



《WINDOW》成立三周年，假北京人民大會堂設宴慶祝。出席者包括羅德丞夫婦、總編輯大衛波特及作者。

香港最後一個政治貴族

羅德丞

政海浮沉錄

作　　者　　高繼標
編　　輯　　博益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　　葉倩文
美術設計　　SHING
出　　版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常盛大廈十五樓
2565-2548
網　　址　　www.hkchinesebooks.com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第四版修訂版）
ISBN　　978-962-17-9350-8

A SCMP Group's Publication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

SCMP集團有限公司出版物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博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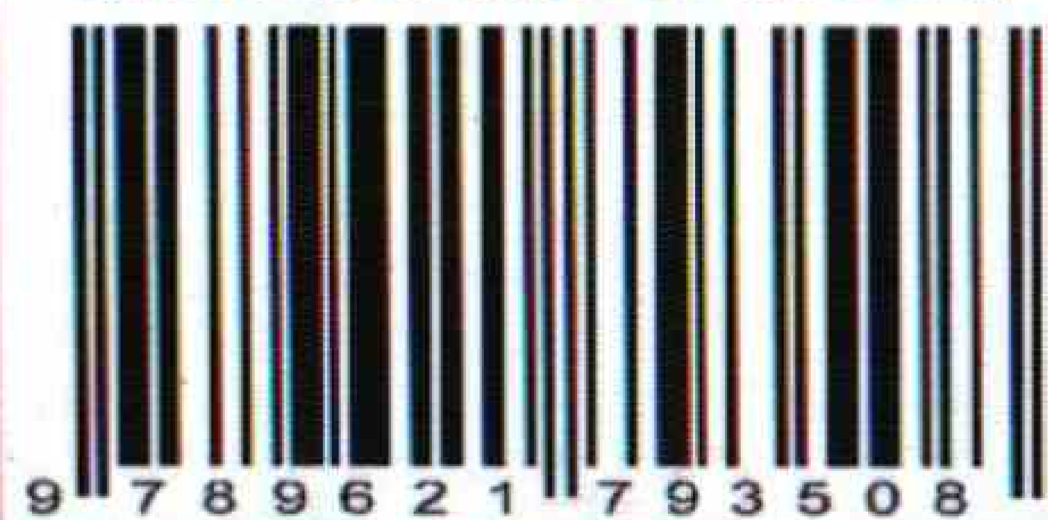
生活叢書

香港回歸祖國剛十年，回望九七中英交接前，政壇風起雲湧，變化莫測，要數當中風雲人物，不得不提去年逝世的羅德丞。

羅德丞是香港政壇中絕頂聰明的傳奇人物，他是殖民地華人首富何東的外孫，也是法律世家羅文錦的么子，在麥理浩時代，他是港英銳意栽培的華人精英，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立法局和行政局委任議員，是港英政府與華人家族協作的最後一點血脈，羅德丞代表了香港殖民地政治的一個典型現象。

在九七前夕的因緣際會下，羅德丞毅然作別港英政權，轉投北京的懷抱，在後過渡時期，專揭港英底牌，處處與港英抬槓，驍勇悍戰，鋒芒畢露，備受北京的賞識，被視為首任特區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但也因此觸動港英政府的神經線，屢遭打壓，後來因為北京屬意平穩過渡，捨爭議性較大的羅德丞而取英方可接受的董建華，羅德丞惟有蕭然引退，從此絕跡香港政壇。

本書作者高繼標一直協助羅德丞組織政黨工作，對羅德丞的行事和為人有細膩的觀察，有興趣了解羅德丞的人可以憑書一睹全豹，另外，當年圍繞在羅德丞身邊的敵和友，有些已成為今日炙手可熱的政界人物，他們當年的一言一行，當然也是可堪細味的政治小品。


ISBN 978-962-17-9350-8
9 789621 793508
定價港幣六十元

博益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博益網址：www.hkchinesebooks.com